

胡蘭成著

爭取解放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放 解 取 爭

著 成 蘭 胡



國民新閱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出版

爭取解放全一冊

實價新幣三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述者 胡蘭成

發行人 黃敬

齋

不准翻印



有著作權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總發行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爭取解放 目次

上編 和平運動諍言

國民新聞發刊詞	一
要做的事	一
中國地位的保證	一
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	三
渝共決裂的序幕	三
從局部撤兵做起	五
從收回越界築路入手	八
經濟統制在中國	十
曾仲鳴先生殉國二週紀念辭	一七
責任與善後	一九
貢獻給全國軍事會議	二一
強化警察	二二
紀念革命節	二七
	二五
	二三
	二一

還都一週年告和運同志

一九

改造上海金融界

三一

到全面和平之路

三三

炸彈屠殺和重慶政權

三六

田中之言

三八

弱者的心理

四〇

渝共分裂與中國前途

四一

中國的處境

四五

渝共衝突及其界限

四七

多做自己的工作

四九

工人運動之流變

五一

糾正十四年來的錯誤

五三

紀念「五四」

五六

紀念「五五」

五八

親善之道

六〇

重心在清鄉工作

六二

我們的抗議與決心

六四

本多大使之言

六七

問題的提出與解答	六九
關美國調停中日戰爭說	七二
建軍的途徑	七四
中日和平的正軌	七七
鞭其後者而進之	八〇
中華民族的氣節	八〇
觀念的澄清	八三
兩重權力	八五
怎樣努力？	八七
東亞的關鍵	八九
清鄉工作的支點	九一
向前邁進	九三
國民政府的國際承認問題	九五
清鄉工作正式開始	九八
應有的風度	一〇三
戰爭的開端與結束	一〇五
外交常識	一〇七
經濟交涉的重點主義	一〇九

再論重點主義	一一二
三論重點主義	一一一
國府與國家	一一六
凍結中日資金	一一八
時代與文人	一一九
作惡者必自損	一一〇
紀念八一三	一一三
進步與落伍	一一三
是進步還是歪曲？	一一五
後死者的責任	一一七
清鄉工作檢討	一一九
第一期清鄉的檢閱	一二一
兒玉謙次失言	一二三
外交與國格	一二四
恢復正常外交	一二六
我對於日本民眾的希望書後	一三四
和平的進度與歸結	一四五
紀念孔子	一四七

下編 國際戰局檢討

蘇俄的地位	五一
巴爾幹戰爭的範疇	五三
美國的行動程序與方向	五五
蘇俄的處境	五七
美國的兩洋政策	五九
日蘇協定以後	六二
歐洲戰敗國的命運	六四
悲壯的法蘭西	六六
德國的戰略被撓動	六八
近東問題的內延與外延	七〇
德國控制大西洋	七二
羅斯福總統的演說	七五
蘇聯的新評價	七七
德蘇戰爭之展開	八〇

日開改組	一八二
日本新閣的外交	一八四
越南問題的發展	一八六
可注意的法國動態	一八九
資金凍結後的局勢	一九一
從何測量日美關係？	一九三
法國政變的動律	一九五
美國參戰的序幕	一九七
勗法國人民	一九九
美國的理想與現實	二〇一
羅斯福演說後的相關事態	二〇三
美國的動態與中立法	二〇五
西方戰局的推移	二〇七
戰爭與解放	二一〇
德軍南下與世界戰局	二一三
文化的厄運	二一六
壽顏文樞先生	二二〇

國民新聞發刊詞

本報從今天起擴大出版，其立場是擁護並督促和平運動，接受 汪主席的領導，對中國人民負責；其本位工作是文化建設，而以此提高中國人民的建國信念。

我們認為，中日和平基業的保證在於中國的統一。要中國統一，不能靠外力，只能靠中國自身的上進來達到。當前的課題，是要建立中心勢力。

建立中心勢力，只有通過民主集權。中國之所以迄未能集權，是因為迄未能民主。這裏需要的是現代產業社會的組織做它的基地。沒有這個，民主或獨裁只是沒有前提的爭論。在先進國政治形態是現代產業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因為是落後國，所以要用政治做槓桿，來推進現代產業社會的建設。歷史的行程是自由主義創造了力量，法西斯則只是強度的運用既成的力量。中國現在更需要的是創造力量採用統制也不過是拿它來推進這創造的機能，不能有更多的意義。

中國現在，民主或獨裁都還是未成形的東西。最切實的做法，應當是強化國民政府，把過渡期的兩重權力解決，只有國民政府的統治，沒有外力的干涉，循此可以做到沒有重慶地方政權的割據。我們的努力就是要認真履行和約，重建現代產業社會的秩序，而以此為建立中心勢力的基地。

我們的對外態度，以贊電為根據。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但不影響對蘇邦交。我們對德義保持好

意，因為德國在華已無特權，義國雖尚有某種特權，亦已逐漸放棄對此種特權之堅持。對美國，我們重視其撤廢列強在華勢力範圍之言論，惟仍不能不警誠其以中國爲其建立遠東霸權的支點的現行政策。對英國，我們要求解脫其對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支配。我們認爲，以中國今日之地位，對外不能存合縱連橫的念頭，更應避免以參加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爭爲解脫帝國主義的束縛的手段。

對日本，我們要有誠意。我們愛中國的誠意也就是我們和日本做朋友的誠意。所以我們是嚴正的。我們辦報，是因爲看到經過戰爭的破壞，中國的文化事業有如潰翻了油的燈光，而中華民族的建國信念卻正寄託於這一點搖搖欲滅的燈光。我們辦這樣一個文化機關，總算是替國家多造了一份產業。並且我們認爲，文化的作用是宣傳，但文化仍然有它的自體，空洞的叫囂與拙劣的說謊乃是文化的毀滅。我們的願望，是以文化人的身份說話，啓發民衆的判斷力，讓民衆自己知道判斷。

經過這場戰爭，中國人民連本國的地方情形都不清楚，我們先要使他們清楚，然後大家來想法子整理。關於國際，渝方的宣傳只是告訴人民這個國家和我們要好，那個國家和我們不要好，我們却是要使人民明白中國人有我們自己的本國，外國人有他們自己的本國，要好不要好，先須瞭解各自的處境。我們對民衆的報告，是要事實多於結論。

因爲本報是中國人的報紙，對國人負責，我們極希望國人對我們提出要求，並且監督我們。因爲本報是文化事業之一，我們極誠希望與內外文化先進取得合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八日

要做的 事

在全面和平到來之前，日本在華軍隊不能撤退，和平區日本軍管理的現狀便不能取消，這句話只有一半真理。我們是要促成全面和平，不是等待全面和平。國民政府在和平區爭取主權的完整，正是影響抗戰區，達到全國統一的工作程序。

日本在和平區的軍管理，比較德國在法國淪陷區的軍管理，算是輕鬆。其分別，就在於德法還只是簽訂了停戰協定，而中日則已簽訂了和約，在法國的是淪陷區，在中國的是和平區。我們所差的。只是還沒有做到全面和平。但和約的某幾部份，是現在就可以着手履行的，例如經濟合作與共同維持地方秩序。

經濟合作，在和約中載明除在特定地點的某種特定物產之外，中日投資比例應為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可是現在我們並沒有做到。是因為日方的堅持嗎？不，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動手。就切近的事實來說，例如華中的水陸交通事業，關於中日合辦的，我們早應當根據和約，着手調整，確定雙方資本比例，把日方資本超過百分之四十九的部份作為借款，並且把公司的主權確定。我們不做，只能怪我們自己，不能怪日本。因為日本正需要中國來合辦，來調整，這樣可以就地吸收資本，使產業本身發展，於日本有益。至於主權歸中國，對於日本在華軍隊的供應，是不妨另訂單行協定使之滿足的。

共同維持地方秩序，原是過渡時期的做法。依據和約，所謂共同，是日方協助我們，不是我們協助日方去維持地方秩序，除軍事據點之外，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就使日本軍隊還同時駐紮，把軍事和政治分開，日方只是協助而不干涉，這是應當現在就可以着手做的，不必等待全面和平，也不必等待建軍完成。

中日關於日常事件之交涉，由雙方外交機關行之，這也是根據和約，就可以履行的。現在還是分頭交涉，個別接洽，成績好壞全看個人間的友誼與諒解程度，這是把外交弄成支離破碎。一定要統一外交纔是道理。

和平區的物資統制，依照當前的情形，是使中國爲難，也於日本有損。日本這樣做，是爲了軍事的理由，這一點我們很明白。可是我們仍然應當自己來統制，又同時能够供應日方的要求。例如我們有了糧食委員會，自己來處理糧食，對於中日雙方，較之以前都已經好得很多。雖然這個委員會的工作還沒有做到普遍。其他物資統制，只要我們肯幹，日本是可以讓我們自己去幹的。這是因爲事實上的需要。就日本國內來說，從對華戰爭開始就施行物資統制，這種統制原來是把它當作暫時的過渡的辦法。到去年下半年，來了一個改變，爲的是要適應世界戰爭，對產業界反而採取比較寬大的態度，這是因爲非如此不能支持長期的備戰體制。過去的統制是太迫促，是打嗎啡針的辦法，現在却是同時要顧到產業界的持續與新生，講到中國，日本在和平區的物資統制是去年下半年纔加緊的。這一加緊，有許多地方便沒有顧到中國產業界的持續與新生，這固然損傷兵燹之餘的中國產業界的元氣，對於日方長期備戰的任務也是有害的。由中國自己來統制，日方不過是協助，循此可以復興中國經濟，並在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

致的前提下供應日方的要求，這種雙方有益的事，我們一定要做，日方一定同意。

以上幾點，調整中日合辦企業，中國自己維持治安，一切交涉通過外交機關，中國自己統制經濟，都應當切實的做，趕快的做，這纔是逐步履行和約，纔能由局部和平逐漸走到全面和平。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

中國地位的保證

這一兩天，重慶在開它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蔣又在那裏演說，用他們的邏輯檢討抗戰自身的力量問題與抗戰的外交形勢問題。這兩點，也正是我們所要對國人說一說我們的見解的。

抗戰的力量，現在所能看得見的只是遊擊隊。游擊隊果然有它的作用，使農村破落，使都市孤立，但也只是等於明末的流寇。明末的流寇也打明朝，也打滿清，現在的游擊隊是也打中國，也打日本。抗戰前夕，這些游擊隊在打中國上頭完成了他們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後來日本兵來了，便打日本兵，正如李自成這一夥從陝西長征到北京，後來滿清兵來了，又打滿清兵一樣。只是游擊隊在打日本兵的時候，仍然不忘記打中國，因為中國還沒有像明朝那樣已經滅亡。新四軍的行動，與這次共產黨代表拒絕出席重慶的會議，就是如此。

明末的流寇果然給了滿清兵許多麻煩，但總沒有人把流寇的力量當作挽救明朝的支點。這裏還使人

想起南宋。南宋時候的所謂大河南北豪傑蜂起，與宋朝的兵馬取得聯絡，豈不是更像現在的游擊隊？但這種豪傑，當時在朱仙鎮以北的淪陷區是「忠義之士」，在後方，他們卻就是太湖強盜楊么那一夥，在岳飛之前有劉琨，他在北方招集了這種同樣的豪傑，在淪陷區當中保存了幾處「面」。但也終於沒有「最後勝利」。

無論如何，把游擊隊看作抗戰的散兵線，並且看作抗戰勝利的支點。是不可能的。歷史上游擊隊成功的例子，拿破崙征俄失敗都不能引證，可以引證的是蘇俄在一九二〇年前後的擊退協約國聯軍。只是一點必須明瞭，即當時蘇俄革命的特殊意義與由此而生的紅軍以及游擊隊的特殊意義，是十分調和的而中國現在，則只是利用流寇。流寇的作用，只能取譬東晉，南宋，明末的故事。

然而除了游擊隊之外，重慶的抗戰又別無可說的地方？

還有外交。是的，英美援助重慶比以前積極了。但是爲什麼不把有利的國際形勢用於議和？若說日本戰勝英美，中國將必亡國，是爲此而非對日本拼命不可嗎？這是愚蠢的想法。第一因爲，重慶的抗戰之於英美對日戰爭，並沒有決定的意義，正如波蘭挪威這一類國家的抗戰，對於英德戰爭並沒有決定的意義一樣。第二因爲，假使日本勝利，那時候遠東也仍將處在另一種國際的均勢之下，正如上次大戰協約國勝利，然而法國有英國牽掣，英國又有美國牽掣，還是不能暢所欲爲的去宰割戰後的世界一樣。中國所能做的，只有現在就來保存力量。然而重慶的抗戰是在繼續消耗力量。

若說中日和平，將來英美勝戰日本，中國會吃大虧，是爲此而非替英美拼命不可嗎？這一樣的是愚蠢的想法。因爲英美假使勝利，她們所考慮的還是要把中國的地位適應她們的遠東均勢。比方法國與德

國停了戰，甚至將來或者還變成德國的軍事同盟；可是，如果英美戰勝了，她們爲要重新佈置歐洲大陸的均勢，還是不能在地圖上拭去德國與法國的，因爲倘若不是這樣，那麼，只好讓歐洲大陸統統變成英國的領土，這個美國決不肯，或者把歐洲大陸分成無數細小國家，這等於把歐洲大陸變成英國的勢力範圍，有如美國的拉丁美洲一樣，這也是美國所決不肯的。自然她們也是用這同一的方式來考慮亞洲大陸上的國家，只是那時候中國的半殖民的程度是否更加深，則要看中國現在能不能對日停戰。如果抗戰下去，中國弄得一身債，那是會無以自拔的。上次大戰之後，英法不得不對美國低聲下氣，就是榜樣。

我們也不能把抗戰對於日本的牽製作用看得過高。因爲即使沒有這一場中日戰爭，日本到了要在南太平洋接受英美的挑戰的時候，也要利用中國的海港，並且在南中國駐屯大量陸軍，因爲這樣，日本在南太平洋作戰纔能完成她的海陸空軍的配備。現在日本對於泰越的要求，就使得我們明白。所以，目前那樣日本在華的駐軍，固然於日本是很大的負擔，但也不如一般人所說那樣的「泥足」，並不全是無謂的消耗。不過重慶如果停戰，作成全面和平，則此種軍隊的數量可有若干減少，配置地點也有變動，而其意義則不過是假道，這於日本固然好得多，於中國也好得多。如果英美的對日戰爭可免，則抗戰使日本「泥足」的意義就根本缺乏前提，能够和平，則撤兵一定可以辦到。

應當趕快停戰，應當趕快做到全面和平。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的保證，不是抗戰，而保存實力，只有和平纔能保存實力。

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

四十年前的今天，日俄奉天大會戰結果，日本戰勝了俄國，這一天是亞洲民族解放的起點；日本戰勝了俄國，就是亞洲人打敗了歐洲人。五十年以前，亞洲沒有一個強盛的獨立國家，亞洲民族一天天的衰弱，歐洲一天天的強盛，亞洲民族以為全亞洲民族沒有抵抗歐洲人的能力，只有做歐洲人永遠的奴隸；日本戰勝了俄國，是亞洲人反抗歐洲人侵略第一次的大勝利，也是東方精神醒覺的第一天。

日俄戰爭以前，亞洲民族長久處於歐洲民族壓迫之下，漸漸喪失了獨立生存的自信。日本戰勝了俄國，亞洲民族明瞭亞洲民族獨立生存，惟有打破歐洲的侵略，才能復興亞洲，於是紛紛起來打破歐洲人的侵略，中國民族也為了要求解除歐洲帝國主義的束縛，不斷對外鬥爭，要求生存獨立自由。

中國民族怎樣獲得獨立生存呢？亞洲民族怎樣才能復興呢？要明白以下兩點：

第一、復興中國與復興東亞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亞洲民族解放的醒覺，是復興亞洲的起點。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亞洲各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然而要求民族解放，必須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國民族獨力要求解放，是不可能的。過去數十年來，中國外交政策要想利用列強間的互相牽制，反而促成了這一次中國民族獨立生存的危機，中國民族在這一次抗戰中，利用列強互相間的利害衝突希望求得一條出路，反而削弱了

中國民族解放的力量，所以中國要求獨立解放是不可能的。和平運動的發展，中國民眾認識了抗戰已不能挽救中國危亡，惟有和平反共才是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因為和平是中日兩國共同負擔復興亞洲的責任，中國復興在亞洲復興中才可以求得出路，日本強盛以後，亞洲民族仍然在歐洲民族壓迫之下，便不能得到永久的保障。中日和平實現，中國有了力量，就可以同日本聯絡亞洲各民族，共同復興亞洲，亞洲民族才可以恢復原來的地位。

第二・中日兩國是復興亞洲的原動力。中國同日本，是亞洲兩個最大的民族。如果循環報復，長久相持，中國不但沒有解放的一天，亞洲民族解放的力量，也要完全毀滅。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中國民族解放思想抬頭；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俄國，中國民族及亞洲其他民族發生了解放運動。十餘年前，總理說過：「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日本，就是這種運動的原動力。中國同日本現在還沒有大聯絡，將來潮流所趨，我們在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是一定要聯絡的。」亞洲全部民族聯絡起來，然後亞洲全部民族的獨立運動才可以成功，和平運動指出中日兩國除了火併以外，還有一條出路就是以中日和平為亞洲民族解放的原動力。日俄戰爭的發生，是歐洲民族侵略亞洲所產生的結果，中國和日本同時受到歐洲民族的侵路；日俄戰爭是日本為了抵抗侵略而起來反抗的結果。

現在的亞洲，西方資本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雖然為維持舊秩序不斷的擾亂，然而舊秩序的崩潰，證明歐洲民族侵略勢力的衰退；新秩序的建設，證明中日兩大民族為驅逐侵略勢力的團結，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東亞聯盟做成了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中日軸心，復興中國復興亞洲是中日和平一條永久的道路；是日俄戰爭以來，總理昭示我們的根本信念。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日

渝共決裂的序幕

因解散新四軍而起的渝共衝突，如今正在繼續發展。中共代表毛澤東等七人拒絕出席參政會，並對參政會重提對蔣的抗議與善後辦法十二條。董必武鄧穎超事後另提臨時解決辦法，也是十二條。後者只是撤消了懲辦何應欽等與逮捕各親日派首領兩項要求，却更明確的主張中共應有兩個集團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以及承認「敵後之民主政權。」

中共顯然是把當前的階段看做對渝方爭取合法地位的鬥爭，原來抗戰之前中共的地位是非法的。抗戰開始之後，中共的地位也只是半合法的。中共認為當時在朝的鬥爭已達到界限，嗣後即利用此半合法的地位展開在野的鬥爭，爭取游擊隊與抗日後援會這一類所謂民衆團體，而把重點放在充實紅軍與樹立紅軍的外圍部隊。現在是，這一工作也已達到了界限。紅軍碰到「中央」軍，所謂民衆團體碰到三青團，統統被罩住了。合法與正統，這樣又成爲鬥爭的焦點。尤其因爲中共與蔣所做的一般都是官僚鬥爭，所以法統問題見得特別尖銳。在野的活動的限界見得特別縮小。

於是又回到在野的鬥爭。中共要求由半合法的地位變爲完全合法的地位。所謂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是每黨每派出席一人，以國民黨代表爲主席，中共代表爲副主席。這一條的目的顯然是要剝奪國民黨的原有地位，而中共則因給予各黨派以分沾政權的機會，可以把重心操在己手。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

主席團的要求，也是一樣的意思。至於要求承認「敵後之民主政權」，是爲了中共可以取信對三青團展開新的鬥爭；要求成立兩個集團軍，是爲了中共可以拿正統的番號來改建新四軍。

蔣是在拒絕，然而至於昭告全國，以此爭取同情，也就可見形勢的嚴重了。結果會是怎樣？還不到決定的關頭。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現在還是議會鬥爭的階段，沒有到武裝奪取政權的階段。論蔣對善後辦法十二條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全不採納，中共代表也終於不出席參政會，若說兩邊就此鬧僵，不再見面，還是不會的。要和解，當然是更不容易，因爲現在正是渝共由摩擦到破裂的開始；但也不過是開始。

什麼纔是決定的關頭呢？就在渝方所期望的日美戰爭來到的時候，日美戰爭如果來到，重慶便被封鎖在裏頭，雖然一再傳說的華軍入緬，似乎蔣已看到國外的交通將成問題，有武裝護路的必要，然而沒有把握。無論英美願意援助，還是要看是否可能援助。重慶一被封鎖在裏頭，和英美失去聯絡，對外，蘇俄的比重便增加，對內，中共的比重便增加。其時蘇俄對英美或者還是保持中立，但仍然可以放任中共或者指揮中共去奪取重慶的。蘇俄曾經分割波蘭，對芬蘭作戰，並且兼併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而對英對德還是不傷感情，分割中國將並不使蘇俄更難應付。

重慶如果是這樣的收場，中國將更難統一，和平建國運動的任務將更艱鉅。對於當前的渝共衝突，我們沒有嘲笑的心境，我們是只有痛惜。繼續抗戰不是路子，蔣是不能明白的了，我們盼福重慶的人民能够明白過來。

從局部撤兵做起

從局部和平做起，就是要從局部撤兵做起。

日本目前在華駐軍，是爲了作戰，也是爲了維持治安與確保物資之供應。就作戰本身的要求來說，非俟全面和平是不能撤兵的。不但在前線，即在和平區也不能撤兵，因爲要保持戰略上的完整，兵站與前線部隊不能不有一個聯絡。只是僅僅爲了這一層，日本在和平區的駐軍是可以不必這樣普遍而衆多。所以要這樣普遍而衆多的緣故，乃是因爲還要肅清游擊隊，還要處理物資的移動。如果是在正常的狀態，這兩種任務本來是政治的，不是軍事的。但現在戰爭行爲尚未終止，又因爲日本沒有在華成立政治的統治機構的要求，所以在過渡期間，有許多事不能不附屬於軍的體系之下。

但是現在必須承認一種事實，即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後，中國已有她自己的政治的統治機構。中日和約簽訂，關於治安有這樣的規定：

「兩國政府相約，在派遣於中華民國之日本軍隊，依據別項所定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對於治安之維持，緊密協力。在必需維持共通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之駐屯地域等各項，議定之。」（中日兩國基本關係條約第四條）

這裏我們要講求的，就是怎樣的緊密協力。和平區內現在有許多地方還散處着游擊隊，

方則成爲無數零碎的軍事據點，由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駐紮。因爲軍事的力量可以打敗游擊隊，但是不能肅清游擊隊，所以這種無數零碎的軍事據點只好經常存在，變成與游擊隊相持的局面。這種相持的局面只是於游擊隊有利。

應當用軍事的力量去打敗游擊隊，再用政治的力量去肅清游擊隊。這兩種力量的配合運用，便歸結到保安隊的任務。我們拿什裏做主體去和駐華日軍緊密協力，維持共通的治安呢？是我們的軍隊與保安隊。只是我們的軍隊還在草創時期，而建軍的工作又比成立保安隊艱鉅得多，況且當前的問題不是打敗游擊隊趕走游擊隊的問題，而是打敗了之後不讓它死灰復燃，趕走了之後不讓它再回來的問題。這裏，保安隊就有它特殊的任務。因爲保安隊在性質上是相當於曾國藩的團練，是政府的武力，也是民衆的武力，所以能够在廣大的「面」上站穩，不比軍隊的運動只限於點與線。曾國藩對付太平軍，是拿湘軍去攻，拿團練去守。他的有名的格言；「紮硬砦，打硬仗，步步推進。」就是指的團練與湘軍的配合。因爲如果只是湘軍，是只能從事運動戰的。後來僧格林沁親王拿他的騎兵的運動戰去對付捻匪的游擊戰，上了大當。是李鴻章倣行曾國藩的辦法，纔敉平捻亂的。蔣介石過去在江西剿共數年，勝而復敗，得而復失，最後也還是倣行曾國藩的辦法，纔使紅軍不得不放棄江西。

像現在那樣子，我們的軍隊和日本的軍隊駐紮在游擊區的邊沿，築了許多堡壘，這乃是和趙充國屯田一樣的辦法。這種辦法，在漢朝對付匈奴是可以，因爲邊塞之地驟脫數千里，本在放棄之列。可是不能拿它來對付游擊隊，因爲我們是要收回游擊區，如果老是相持，只求以此確保點與線的安全，那便是失敗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發展保安隊。我們的軍隊與保安隊在日本派遣軍的緊密協力之下，打敗游擊隊，把他們趕走之後，把這一地方的治安交給保安隊去維持。如此步步推進，連成立保安隊所需要的時間在內，二年之內可以確立和平區全面的治安。根據條約，「在必需維持共通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之駐屯地域等各項，兩國間協議定之。」就在肅清游擊隊，步步推進的期間，已經可以做到日本軍的調開與局部撤退。而在全面間治安確立之後，必需維持共通的治安的期間成爲過去，則爲維持共通治安而駐屯的日軍部份，自然可以完全撤退了。

再就日方所考慮的確保物資的供應問題來說，和約中附屬議定書了解事項第四項有這樣的規定；「中華民國政府有統制對外貿易之必要時，當自行統制之，但不得與第六條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相牴觸；又在事變繼續期間中，上述統制應與日方協議之。」

這個規定明明白白，是由中國自行統制經濟，只須適合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在事變繼續期間，須與日方協議，也決不會超過維持共通治安的性質，即是，在日方的緊密協助之下中國自行統制經濟。照目前的情形，日方的緊密協助是必然的要通過派遣軍，但一地方的治安確立之後，一地方的中日經濟提攜就有正軌可循，雖在事變繼續期間，亦只須考慮中國自身之需要，予日本派遣軍以必須的便利，而毋須通過日本派遣軍來統制，爲確保物資之供應而駐屯的日軍部份，自然也可以撤退了。如此，中國可以輕鬆，日本也可以輕鬆。

國民政府既已改組還都，從局部和平斬致全面和平，就應當切切實實的幹。和約既經簽訂，從現實的條件達到理想的合作，更有了切切實實的幹的根據。我們只有從中日兩利的前提下想出辦法。奢望

是不能有，但最低限度的立國基礎，只要我們肯奮鬥，還是可以得到。要建設中心勢力，強化國民政府，就應當從局部撤兵做起。由局部撤兵到全面撤兵，是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的路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四日

從收回越界築路入手

滬西特警的成立，是收回租界的初步成功。租界制度原是對中國權益的割掠。關於租界制度的條約都是從這種割掠的性質作成的。將近一百年來，法租界當局與公共租界當局無數次的作租界區域的伸展，與在租界區域以外築路。伸展租界的藉口是，租界的人口太擠，弄到外國人住不下，所以要求擴張；附近租界的華界不衛生，影響租界的衛生，所以要求把附近租界的華界也圈作租界。越界築路的藉口是有許多外國人住在租界區域以外，爲了他們來去的便利，所以要求築路。這種藉口說來是可恥的。而越界築路與伸展租界區域，則是一個行動的兩面。

越界築路早先是在股份持有人的手中，通行者是要出買路錢的。靜安寺路當時就是如此。到了後來，公共租界當局纔加以直接管理。再到後來，工部局纔在越界築路攫取警權。這種種，都是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加以條約化的。這裏的問題顯然不在於條約。是否合理，是比較是否合法更重要，而中國是否有力量，則是問題的一切。辛亥革命使租界區域的伸展運動停滯了一下，五四運動使租界區域的伸展

運動終結，而五卅慘案所引起的中國人民的反抗，又把越界築路的繼續發展一刀切斷了。當前我們的和平運動，則是要從收回越界築路警權到收回越界築路，到收回租界。

滬西警權協定我們並不滿意，因為中日事變以來工部局在越界築路的警權事實上已不存在，現在有了這個協定，工部局又可以通過特警恢復其警權的一部。可是我們也做出了相當的成績。特警雖屬混合組織，但由上海市政府任命中國人為總署長，最高主權屬於中國方面。這是一點。特警成立，越界築路由戰時狀態漸入正常狀態，日本方面只是根據其在工部局的資格加入特警工作。這又是一點。根據協定，工部局對於匿居租界區域內的案犯，如搶劫，恐嚇，暗殺，或意圖暗殺，確有相當嫌疑者，有協同滬西特警緝捕並立即引渡的義務。從此渝方恐怖份子將不能再以租界為掩蔽，因為特警可以直接在租界緝捕他們。只須事先通知該管捕房，事後再做一個很簡單的引渡手續。這是第三點。

現在我們要趕快解決的，是越界築路的稅收問題。工部局已往往在越界築路收稅的理由，是說爲了養路，而其收稅的武器則爲對反抗納稅者斷絕水電。今後我們要自己來養路，我們自己來收稅。因為不但是越界築路旁邊的房屋是在華界，就是越界築路也在華界。工部局儘可以把越界築路搬到租界裏去，因爲這些路既然是越出了租界，而在華界地面，主權當然屬於我們。所以，工部局在越界築路收稅的理由不能成立。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建設水電，供給越界築路一帶。但我們仍然可以做到：要現有的水電公司供給水電而不得作爲工部局的收稅武器。因爲警權既在我們手上，工部局便不能保障水電公司制裁用戶對斷絕水電的反抗，水電公司當然不能保障工部局制裁業主收稅的反抗。而且水電公司自身，應當和其公用事業一樣，其在越界築路營業者應向中國政府納稅。我們辦不到嗎？一定可以辦到。因爲大勢所

趨，工部局已不但沒有固執的理由，而且沒有了固執的力量。現在我們有了特警，還只收回了越界築路的一部份權益，我們要收回越界築路的全部權益！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八日

經濟統制在中國

和平區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經濟統制。中國的產業能不能夠復興，國民政府能不能夠站得住，和平運動能不能够成功，就是要看經濟統制這個問題能不能够解决。

照道理說，和平區是應當比抗戰區更好的；國民政府統一重慶，應當是沒有什麼困難的；因為眼前的事實是，在重慶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區域，祇是一些內地，一些山地，是中國經濟落後的區域。但在和平區，包括全中國最大的都市，最繁盛的沿海商埠，是經濟最發展的區域。我們把握了這些區域，也就是說把握了全中國的商業中心，工業中心，金融中心，把握了對外貿易的關鍵，我們應該是可以解消重慶地方政權的。

祇是和平區域被戰爭破壞了，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所以還沒有恢復的原因是有三點：一點是租界制度的阻礙，又一點是游擊隊的繼續破壞，第三點是經濟統制的不得當。關於租界制度與游擊隊，這裏且不說，專說經濟統制。

現在和平區的經濟統制，是與日本的備戰有關。從去年六月以後，華北的經濟統制逐漸強化。去年九月，三國軍事同盟成立之後，華中的經濟統制也逐漸的強化起來了。依據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致的原則，當太平洋戰爭的危機迫近的時候，為保障東亞和平，中日兩國在物資動員上，應有其聯系與合作，這是理論，也是事實。不過如何聯系，如何合作，如何統制，這裏就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依據中日和約，由中國自行統制經濟，但以不抵觸中日經濟合作之精神為前提。在事變繼續期間，除考慮中國自身之需要外；並須考慮日本在華派遣軍的需要。這些原則都是很明白的。問題是在，現在和平區的統制還談不到中日雙方的協力行施。這是我們自己放棄責任。我們應當趕快和日本方面根據上面所說的原則，另訂經濟統制的實施辦法。在這期間，我們實施經濟統制，需要日本的協力；但這意義是說，日本協助我們實施統制經濟，不是我們協助日本統制經濟。這裏的問題是主權的問題。主權應當確立。

另外有一點要注意的是，中國統制經濟既然是和日本的物資動員取得聯系，並且合作，那麼，中日雙方就應當明白，這種經濟統制將是長期的。因為太平洋的危機不是在短期內所能解除；又如果太平洋的戰爭不幸而爆發，這種戰爭也將不是一年半載就能結束的。所以日本的物資動員與中國的經濟統制，在實行上不可以太過蹙。如果太過蹙了，就會毀損經濟的新陳代謝的機能，等於竭澤而漁，將無以為繼。日本的物資動員，起初就有這種毛病。他們把物價統制得太嚴格，因而損害到生產的機能。去年下半年以後，改變辦法，稍稍容許產業界的自由活動，把物價的限制也放鬆了一點。這從長期的備戰來說，是正確的做法。可是中國現在，統制的嚴格，弄到一縣與一縣之間，物資都不能順利流通，就往往弄到

物資的浪費，與產業機能的停滯，而且會由經濟的問題，轉變到政治的問題的。這種現狀應該趕快修正。我們需要的是合理的經濟統制，這就是經濟統制不但要顧到更有效的運用物資，而且要顧到經濟的再生產的機能的培養。

國民政府對此，應有統籌的辦法，和日本作誠懇的協商，這是當前推進和平運動最大課題之一，也是我們分擔東亞的安全的責任。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日

曾仲鳴先生殉國一週紀念辭

前年今日，曾仲鳴先生在河內爲藍衣社暴徒所狙擊殉國。

那時候，汪先生爲了挽救中國於破滅之廢墟，拯援國民於流離之溝壑，毅然脫離重慶，發出號電，呼籲和平。在汪先生尙駐河內，期待蔣介石覺悟之時，曾仲鳴先生已爲國犧牲。曾先生之犧牲，證明了兩件事：

一，蔣介石個人之不能覺悟。

二，和平運動之正大光明，是獨裁者極端妒忌的。

蔣介石於曾仲鳴先生逝世後，續行其暗殺政策，但和平運動仍順應潮流，澎湃的前進。在去年紀念

曾仲鳴先生逝世一週年的時候，和平運動已獲有長足進展。汪先生不計個人之毀譽，毅然決然離開河內，而至滬上，團集國人，並與日本方面，保持接觸。六全大會之召開，復興了國民黨的組織，樹立了議和主體的母體，而與日本作了和平方案，並且當時的各地政權，對汪先生的主張也有了認識。但汪先生仍希望蔣介石對和戰大計能有最後的覺悟而繼續予以告誡。

紀念曾仲鳴先生殉國一週年紀念之時，和平運動的潮流，已由宣傳運動階段，而進入實施，與政治行動的階段了。

現在，紀念曾仲鳴先生殉國二週年，和平運動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汪先生對於蔣介石的期待，已到了最後。爲要挽救中國，拯救人民，汪先生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樹立國民政府，作中國議和的主體。對於日本，更費了幾月的磋商，簽訂了中日和平條約。中國與日本，已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對於滿洲國，也互派使節。在內政方面，戰後的紊亂局面，已逐漸走上統一之途，金融基礎之中央儲備銀行，亦已成立，建軍方面，陸軍與海軍與保安部隊，皆已分別樹立鞏固之根基。迴顧和平運動過去的成績，相信曾先生與繼曾先生而殉國諸烈士死而有知，亦可自慰。

但是和平運動的最後目的，現在尙未完成，全面和平，尙未實現。過去，歐洲諸國因互相火併，而忽視了中國，現在英美爲保障其遠東殖民地，更想利用中國作爲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實現全面和平，使中國遠離世界的戰役，更是和平運動者應有的努力。

在紀念曾仲鳴先生殉國二週年之今日，回憶過去，雖差堪告慰，但瞻望將來，却更有偉大的目標與艱苦的工作，橫在面前。今日今時，願和平陣營諸同志勿以過去成績而自驕，勿以前途艱苦而自餒，毅

然肩負起應盡的責任，勇敢的邁進。

希望在明年，全面和平可以實現，而以此告慰曾先生及爲和平運動而犧牲諸烈士之英靈！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一日

責任與善後

汪先生過去在行政院長任內遇刺，後來對於該案兇手，請求國民政府釋放。記得他是這樣說：「我在行政院長任內所做的工作，是忍辱負重的，因此有的人一時不能瞭解。我只能拿工作的結果，要求他們最後能够瞭解。行刺我的兇手，說不定是愛國份子，只因爲一時還沒有瞭解，犯了罪，我可以原諒他們。」

這件事過去好幾年了。大前年汪先生發表懿電，主張和平，直到現在，還是有許多人不同情汪先生的主張。他們不同情，是因爲他們還沒有瞭解；因此對和平運動者的暗殺案件就常常發生。這在利用羣衆的不瞭解而主持暗殺的渝方，固然是不可原諒的；但是汪先生和他的同志，仍然認爲受渝方指使的兇手，其中也有只是因爲認識錯誤。只要他們一旦明白過來，我們終是原諒他們，決不加以報復。後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我們還當作同志看待，一起做和平運動。

還有許多的人，他們並不是恐怖份子，只是在渝方以及和渝方有關的機關做事。他們都是些普通的

職員，對於政治沒有一定的主張。他們因為環境關係，也反對和平運動。對於這些人，我們是認為只有展開和平運動，拿和平運動的成績要求他們瞭解；並且幫助他們解脫渝方的抑制，以此謀國家之統一。

汪先生與其同志的政治風度是如此。事實也是這樣：除了始終不能覺悟而犯有殺人罪的恐怖份子，我們不得不依照法律予以處分，以及正在進行暗殺之現行犯，我們不得不當場以武器自衛之外；我們決不殺人，兩年多以來，是渝方首先暗殺我們，也是渝方暗殺我們的人最多。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我們忍耐，並不是因為渝方的力量比我們的更大，乃是因為我們不屑和渝方比賽暗殺。從事政治的人，如果只講力量，不問是非，到頭他的力量，也會是靠不住的。如果有力量就可以殺人，那麼，現在渝方殺我們一個人，我們可以殺還他們一百個。但是，我們不這樣做。這次我們拘捕渝方銀行的職員，只是因為我們用言語警告渝方，不能使其覺悟，纔不得不拿事實來警告渝方，但也不過是警告。

現在渝方銀行負責方面也知道這樣說了：「他們不過是銀行中小職員，都是善良的平民，靠薪水維持生活的，絕不作任何政治活動。這次被捕，實屬費解之至。」這就是我們所要求他們的覺悟，因為渝方所暗殺的中央儲備銀行職員，正不過是銀行中小職員，都是善良平民，靠薪水維持生活的。他們也只是做銀行的工作，沒有政治活動，而渝方恐怖份子竟視爲大敵，繼續暗殺他們，現在大家可以明白這是不對的了。我們的目的，只是從今以後，能有一種辦法，使渝方暗殺行爲不再發生，我們別無他求。大家可以想像，如果這次被捕的不是渝方，而是我們，你想他們還能饒過這一百三十人的性命嗎？

渝方不講理，我們還是要講理的，因為渝方是獨裁的勢力，而我們是汪先生的信徒。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三日

貢獻給全國軍事會議

當此中央召開全國軍事會議之際，我們有幾點意見貢獻給當局，是關於整頓現有軍隊與建軍行程中的外交問題的。

人們對於現有軍隊，往往有一種不準確的觀念，以爲只有等重慶的軍隊來歸，否則只有重頭做起，至於現有的軍隊，是够不上做建軍的基礎的。這種觀念之所以不準確，在於不懂得環境。重慶的軍隊來歸，建軍可以完成，但我們不能以期待重慶的軍隊來歸作爲建軍的入手。我們現在只能從現有的軍隊做起。他們的技術與紀律的訓練，編制與武器的配備，固然很欠缺，但只要我們有決心去整頓，人事上形勢上都是沒有問題的。有人以爲現在的情形有似廣州時代，廣州時代有的是烏合之衆，所謂客軍與陳炯明的軍隊，縱之則爲患，激之則爲變，是無從整頓起的，所以只好另行建立國民革命軍的基本部隊；用這基本部隊去領導其他部隊。其實現在的情形並不是這樣。我們現有的軍隊雖然參差，可是都在中央的直接統率之下，這不僅是由於各將領的對國忠誠，並且是由於當前他們的處境，一來，沒有負嵎的可能，二來，散而爲游擊隊將更難存在。中央對這些部隊繩以紀律，施以訓練，他們決不像廣州時代的外圍軍隊那樣頑強至於抗拒命令的。我們只要把現有的軍隊整頓起來，這些軍隊，就是我們的基本部隊。

訓練一定要嚴格。諸葛亮治蜀，教人亂世用嚴刑，對官吏須如此，對軍隊更須如此。唐肅宗時已苦

於驕兵悍將，而李光弼治軍獨稱嚴明。郭子儀之寬容，雖能羈縻諸鎮兵力，定一時之功，但後來藩鎮跋扈不可收拾，未始非肇因於此。現在我們如果治軍不嚴明，只是空口說從頭做起，另行創造基本部隊，不但把現有的軍隊的整頓工作放棄了，而且將來重慶的軍隊來歸，因為匆促之間不能形成一個中心，也會倒退到軍閥割據之局的。

可是，建軍需要鉅大的經費，這經費如何分配纔能適當，是一個頂重要的問題。現在各部隊的經費都感不敷。要使之現代化，軍事人材的訓練與武器配備的經費必須大大的增加。但這應有全盤統籌的辦法。應當由軍事委員會來擴充軍官學校，設立兵工廠，把軍官學校訓練出來的人材分派到各部隊服務，把兵工廠製造出來的軍器分配給各部隊使用，這是發展現有的軍隊最有計劃的做法。

另一個問題，是外交問題。我們只應有國家的軍隊，不能有地方的軍隊。現在華北華中華南的將領齊集一處開會，依照編制，上述各地的軍隊都在軍事委員會直接統率之下的。但軍隊由中央直接統率，必須是軍費也由中央直接發給，不能由地方發給。例如華北的軍費，不應由華北政務委員會發給，而是應由軍事委員會發給，亦因此，華北政務委員會的財政應劃分為國家的與地方的，國家的財政部門應歸中央支配。依據和約，就經濟合作而言，華北蒙疆關於某種特定資源，與華中華南有不同的規定，但關於軍事，只說「日本國為實行兩國共同防衛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議定駐屯所要之軍隊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對於中國中央政府在華北蒙疆之軍令軍制的統一，原來是沒有損及的。只是前臨時政府時代之軍事設施，係按照當時之環境而定者，現在是否都已改正，這是我們所十分關心的。我們必須趕快改正，因為這是實踐和約的重要部份。

還有，現在各地部隊往往是和就地日軍直接辦理交涉，流弊是很大的。爲求軍令之貫徹與外交之統一，關於軍隊之移動等項，在過渡期間，應由軍事委員會與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接洽好，各自命令其部隊，這樣可以減少許多阻礙，也是爭取國家獨立與軍事統一的應有努力。

我們需要建軍來接防，在和平區先來實行日軍的局部撤退。我們應當重視現有的軍隊，因爲這是我們僅有的建軍基礎。要使軍隊國家化，現代化，科學化，這在於我們對軍隊的訓練與配備工作的急起直追，同時在於取得日本的諒解。我們要統一抗戰區首先要統一和平區，統一和平區的軍政與財政。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強化警察！

現在來講復興工作，對外是外交問題，對內是治安問題。外交問題的重心在於要求日本現在就開始局部撤兵，必須由這一點做起，我們纔能逐漸做到主權完整。如果這一點沒有做到，交還產業與經濟合作是無可着手的。因爲和平區如果到處都駐有日本軍隊，大部份產業當然也在日本軍管理之下，我們的行政權與日本的軍權當然難免成爲二重的。所以局部撤兵是復興工作的起點。

局部撤兵有着兩種意義：一種是由中國軍隊局部接收軍事據點，一種是由中國警察局部接收普通防地。所謂普通防地，本來不是什麼軍事據點，祇是因爲這些地方潛伏着游擊隊，日本纔不得不把軍隊駐

在那裏；並且由日本特務機關與憲兵隊這一類機關在那裏幫助正規軍維持地方治安。總要中國自己有軍隊，自己有警察，關於局部撤兵的外交工作，纔能做出實際的成績。所以，外交問題與治安問題其實是相關的；不僅要靠日本的誠意，更要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中國警察接收維持地方治安的職權，開始的時候必須與正規軍配合行動，並與日軍合作，纔能把一地方的游擊隊擊退。擊退之後，這一地方的治安，就交給警察去負責。其時正規軍可以調開，因為正規軍隊本來是負的國防任務，不是地方性的。至於日本軍隊及其連帶的機關，當然可以撤退，因為他們駐在這些地方，原來沒有軍事據點的意義，我們自己能夠維持治安，正是減輕他們的負擔。

成立這樣的警察保安隊，在非常時期能够幫助正規軍作戰，在平時能够獨力維持地方秩序的，乃是當前建軍工作的重要補助手段。假定我們先從蘇浙皖三省做起，每一省成立一保安隊縱隊，每一縱隊有三萬人，開辦費大概只需五百萬元左右，經常維持費每月大概只需九十萬元左右。在蘇浙皖三省成立三個縱隊，合計開辦費不過一千五百萬元左右，經常維持費每月不過二百七十萬元左右，這比較成立正規軍，一師的開辦費就需二千萬元以上，經常維持費每月需三十六萬元以上，是要節省得許多。當前建軍的任務，既然着重在肅清游擊隊，維持地方治安，那末，我們就應當着重在建立保安隊。

關於警察的經費，其中有的部份是應當由中央來負擔的，有的部份應當由地方負擔。但目前地方照規定負擔警察經費的很少，往往完全由中央供給。這種現象必須很快的糾正。至於成立保安隊的經費，是應當與建軍的經費分配併案討論的。

警察本來是消耗的，保安隊的消耗更大，不過照我們目前的處境，強化警察，成立保安隊，卻有生

產的意義；因為我們要復興工商業與增加政府稅收，必以地方治安的確立為前提。有了警察，有了保安隊，我們就可以有工廠，就可以有繁榮的商業，並且可以增加政府稅收，尤其是田賦；因為現在大部份田賦都受游擊隊的擾亂，而不能徵收。

強化警察在當前的環境是最切實的救國工作，而成立保安隊則是強化警察的中心課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八日

紀念革命節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殉難者七十二人，是為黃花崗之役。我們現在來紀念這一天，有兩點意思。一點是，我們跑到淪陷區來做和平運動，和當時黃花崗殉難諸烈士有着共通的心理。從前滿清兵入關，全中國淪陷，到頭把中國救回來的，不是李自成張獻忠的焦土政策，也不是偏安稱雄的三藩，而是孫先生領導的革命。這革命，有其破壞的一面，更有其建設的一面。這次中日戰爭，中國淪陷了半個國土，能把中國救回來的，也決不是毛澤東的游擊隊或偏安稱雄的重慶政權，而是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這裏的分別，在於清末的革命是在亡國之後，而現在的和平運動則在亡國前夕；因為中國的處境不同，以及對手方的要求不同，革命採取的手段也就不同。雖然如此，但在淪陷了的地方，從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的奮鬥精神，兩者還是共通的。

另一點是，黃花崗之役是從地方做起，不是從改革中央政府做起。現在和平運動外面的對象是日本，內面的對象是重慶政權。就後一對象來說，中國不幸，沒有像法國那樣以改組內閣來達到和平，却不能不從局部和平做起。這種情勢，和民元以前之不從改革清廷入手，却不能不訴之地方起義，民元以後之不從改革北洋政府入手，却不能不在廣州組織政府，也是一樣的苦心孤詣。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之際，並沒有料想到就在同年十月又有武昌起義，中華民國以新生的姿態出現；更沒有料想到民國成立之後還有十幾年的軍閥混戰。七十二烈士的後繼者於民十五年發動國民革命，一樣的沒有料想到北伐之後十年還有這一次中日戰爭的浩劫。中國的前程是遼遠的，革命者的任務也確實艱鉅；但革命是在不斷前進中。我們和平運動者，當初也沒有料想到贛電發表之後一年，就做到了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但根據已往歷史的苦痛經驗，我們知道今後全面和年的距離，須用極大的政治努力來做分母，纔能得出約數。

現在我們的處境是比七十二烈士更難。七十二烈士當時和後來的北伐當時，中國受到現代產業革命的刺激，人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成爲時代的高潮；是革命的情緒作成了革命的行動。現在中國受外力的摧殘有過於清季，而世界的革命潮流給予中國的啓發，則不及清季。可是，如果我們只是存着抱殘守缺的心理來做和平運動，是不能有希望的。要和平運動成功，必須有民衆的革命情緒。我們要做的是解放的工作。

只有言論自由纔能培養民衆的情緒，測量革命的進度。民衆會有錯誤，會被利用，但不被利用而犯的錯誤程度，往往被預想得過大，這是不對的。重慶做的是壓迫民衆情緒，統制輿論的工作。我們看到被

壓迫被統制的人們亂說霸道，以爲是民衆沒有理性，過於自由的緣故，其實是正因爲他們被約束得很嚴。如果我們幫助他們擺脫這種箝制，他們的理性就能伸出頭來的。我們必須絕對避免另外也來一種統制。

中國人民可以和平日本做朋友，但決不願意做誰的奴隸，如果人民居然到了願意做奴隸的地步，中國也從此完了。和平運動繼承黃花崗之役的精神，就在於一樣的是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九日

還都一週年告和運同志

今天紀念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一週年，和平運動同志應當反省：我們是不是還保持着贛電發表當時的精神？是不是還保持着還都以前的精神？還都一年以來，和平運動固然有進展，但我們的努力是不是還有所不足？

什麼是贛電發表當時的精神呢？是敢於正視現實，負責任，說老實話。抗戰因爲做不到這一點，已經亡了半個中國，如果和平也做不到這一點，是會把剩下的半個中國一併斷送乾淨的。當時我們說：「抗戰可以亡國，和得不好一樣可以亡國。」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還都以前的精神呢？前年十一月，汪先生說過這樣的話：和平運動同志與日方商討和平方案，爲恐一字一句之失，至於竟夕不寐，焦思苦慮。現在還都已經一年，根據還和平方案的和平條約亦已

簽訂，但有關於國家主權的諸問題，當然不是因為訂了和約就已解決，和平運動同志現在是不是照樣熱心的在尋求對策，照樣焦思苦慮的在求和約之一字一句的實踐呢？

最懶惰的解答是，要日本交還中國主權，只有在全面和平之後，現在說空話是無用的，焦急也是無用的。汪先生爲了糾正同志間這種玩忽的心理，於還都之後曾經發表「罪己精神」一文，勸告同志不應只知責備別人，應當更責備自己。這裏所說的別人，不但指日本而言，還指重慶而言。對日本，我們幹，就得到自由，不幹，就沒有自由。對重慶，我們幹得好他們可以過來，幹得不好，他們就不會過來。

然而人們現在，激烈一點的，把什麼責任都推到日本身上，說日本不够誠意；溫和一點的，又把什麼責任都推到重慶身上，怪重慶硬不肯過來；還有更壞的是，有些人已經不再考慮中日問題，不再考慮國民政府與重慶的問題，而以爲總之是這麼一回事，不想起猶可，想起來只是自尋煩惱。其實這三種想法都是自暴自棄的想法。

我們要求大家，莫只怪別人而自己不求上進。我們並且要求大家重新檢視自己的身份。我們是戰敗國之民，不是亡國之民。我們的處境是不自由的，我們的前途繫於我們還有爭取自由的精神。和平運動同志初時到虹口去，對於向日軍行禮一事，曾經有過嚴肅而認真的檢討，看到這種禮節是相互的，不是屈辱的，這纔覺得沒有關係。現在和平運動同志是否還保持着這同樣的嚴肅與認真在考慮中日爲友的身份？這些地方，是所關非小的。

汪先生的「罪己精神」一文，就是要大家反省：我們是做日本的朋友的材料，還是做日本的奴隸的材料？陳公博同志的論文，講到我們要尊重自己，尊重別人，也是一樣的意思。紀念還都一週年，檢討

勝於歌頌，和平運動同志應當反省，應當警惕，應當知道國家的苦難，做更大的努力與犧牲。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卅日

改造上海金融界

中央儲備銀行已經成立，當前的問題是怎樣使上海金融界來歸？現在上海中小金融事業，大部份已和中央儲備銀行發生關係，但是我們還需要有一種周詳的辦法去扶植這些金融事業。大的金融事業如同中央中國交通中農四行，至今仍與重慶勾結，我們更需要一種周詳的辦法來改造這種現實的形勢。

中、中、交、農四行之所以至今仍與重慶勾結，有着不同的背景。中央銀行是蔣家的私產，中國農銀行是黃埔系藍衣社的私產。他們的財富雖然一樣的是國民的財富，但是除非重慶政權崩潰，是難望他們過來的。這兩家銀行一天支持重慶，我們就一天要制裁他們。至於中國交通是商辦銀行，他們現在支持重慶，只是因為形勢所逼。我們只有盡我們的能力去替他們解除困難，使他們可以無顧慮的來歸。他們的困難在那裏呢？其一是政治的，其二是產業方面的；政治上的困難是，他們多年來受蔣的政治機關的壓迫，勉強接受大量的公債，這種公債現在就成為他們對重慶的抵押品；如果他們脫離重慶，他們就會損失，因為重慶對於他們所接受的公債會不負責任。產業方面的困難是，他們所投資的產業，許多都和重慶有關係，例如戰前的農村合作社，是與蔣的保甲制度相關聯的；戰時的軍火製造業，軍火貿易，

以及一般運輸，都是與蔣的抗戰相關聯的。他們對這些事業投了資，要擺脫重慶的支配，也會受到損失的。

關於公債問題，記者以爲可以參照法幣的問題來處理。我們可以發行新法幣來代替重慶的舊法幣，我們也可以同樣發行新債券來代替重慶的舊債券。重慶的債券仍然有它的自由市場，所以仍然是有價值的，我們可以用新債券，或者直接用新法幣把存在中國交通兩行的公債接受過來，再在市場拋售。這裏的困難在於拋售不能全部，因爲社會對於重慶公債的消化能力有其不可踰越的限度。這不能拋售的部份，只好由國民政府來負擔損失。本來我們所做的事，是接蔣的手的，由蔣轉嫁給我們的損失，我們已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將來重慶政府的消滅，若干部份的公債，我們還是不能不負責去整理的。我們現在就來逐步整理公債，某種程度的損失，我們只好忍受；而在這整理當中，我們就可以處理對上海金融界的關係。

關於產業方面的問題，我們希望上海銀行界明瞭：他們脫離重慶，雖然在蔣抵制下的區域會受到損失，但是在和平運動區域，可以得到利益。和平區域包括中國所有沿海都市，他們儘可以在這裏開闢投資的場地。現在有一點好處，就是上海銀行界的游資過剩，這證明他們所能運用的資本，大部份並沒有落入重慶的掌握。他們如果脫離重慶，仍然可以有足够的資本在和平區創造事業。而且游資過剩，對於上述拋售公債也有一種便利，因爲游資過剩，可以提高社會的公債消化力。

我們要解除上海金融界的困難，使他們可以無顧慮的來歸，同時我們也要有一種制裁，使他們不得不來歸。所謂制裁，一種是政治的手段，一種是經濟的手段，現在上海銀行界與和平區的產業界，還是

保持着相當密切的關係。我們在和平區施行經濟統制，如果處理得好，是可以改變產業界與金融界的既成關係的。這就是政治的手段。至於游資，只要我們能够運用，這些資本就會從渝方的銀行流到中央儲備銀行來的。中央儲備銀行可以提高存款的利息來吸收游資，並且可以把這些資本投於和平區的產業開發，提高利息，就商業的立場來說，是會損失的，但就政治的立場來說，我們應當忍受這種損失。但要把游資投於和平區的產業開發，我們就須把和平區做成可以投資環境。經濟統制是必需的，但和平區經濟統制的現狀應當糾正，這就是經濟的手段。渝方的銀行，被剝奪了游資，他們的活動能力就會大大的減退，他們就會知道只有和中央儲備銀行結成關係纔有出路。

至於中小金融事業，已大部份來歸，我們扶植他們的方法，是在經濟統制與吸收游資這兩件事上給予他們便利，並且幫助他們。把他們扶植起來，是可以逐漸代替渝方的幾家大銀行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五日

到全面和平之路

和平是人人所盼望的，全面和平更是人人所急迫盼望的。但怎樣纔能達到全面和平呢？什麼時候纔能達到全面和平呢？

一般的說法，全面和平有待於蔣與共產黨的覺悟，蔣與共產黨如果覺悟了，全面停戰，全面撤兵，

全面和平可以實現。蔣與共產黨如果不能覺悟，戰爭狀態繼續存在，全面和平即不能得到。這樣說來，全面和平的決定之權，是在蔣與共產黨，因為覺悟不覺悟只能由他們自己去決定。他們現在不覺悟，現在就不能有全面和平，如果將來還是不覺悟，將來也不能有全面和平。這樣說來，全面和平豈不是成爲渺茫的東西嗎？

而且蔣與共產黨是不能覺悟的，因為蔣的處境與中國的處境是兩件事。蔣如果停止抗戰，共謀全面和平，中國可以得救，但蔣的地位却會不能得救了。因為抗戰是消耗國家的力量，而蔣個人的力量却是靠抗戰纔保持着的；這和疾病傷害身體，而病菌則正靠疾病之持續纔能確保其生存一樣。重慶的抗戰正如患着熱症，你叫他停戰等於叫他退熱，發燒時的興奮一消失，即刻會變得衰弱不堪的；英美將離棄他，蘇俄與共產黨將離棄他，不但離棄，還要加以壓力，那時候蔣非崩潰不可。所以我們說過，蔣所有的只是阻礙全面和平的力量，可是沒有作成全面和平的力量。許多人看到蔣有力量阻礙和平，因而以爲蔣纔有力量作成全面和平，這是錯覺。至於共產黨，更不是覺悟不覺悟的問題，因為他們並非不知道再抗戰下去於中國有害，但他們知道得更清楚的是，再抗戰下去於蘇俄有益；而他們的任務則正是保衛蘇俄。

蔣與共產黨是不能覺悟的，這樣說來，豈不是全面和平非但渺茫，簡直是悲觀嗎？事情決不是這樣的。我們必須認定，全面和平的決定權不在於蔣與共產黨而在於我們。全面和平的實現只在於我們的努力，其實現的時間只有拿我們的努力的進展來測量。

這裏所說的努力，是要在國民政府力所能及之地，做成和平模範區。現在空口說全國統一，事實卻是連和平區都未曾做到統一；空口說全面和平，事實卻是連和平區都未曾做到「面」。所謂和平區，現

在還只是都市與都市之間的一些點和線。我們的努力，就是從統一和平區入手做到統一全國，從和平區的完整入手做到全國的和平，從局部的撤兵入手做到普遍的撤兵。

這種工作，就是清鄉的工作。

清鄉的工作，就是要確立和平區的治安。應當趕快成立保安隊，與正規軍配合，並與日軍協力，深入農村，消滅遊擊隊。只有消滅游擊隊，和平運動纔能推廣到農村。我們首先要在一地方的農村建立和平運動的點，再把各地方的農村溝通起來，由點聯成線。做到這一步，清鄉的軍事行動的任務可說是告一段落，正規軍可以調回國防區域，日軍也可以撤退，而由保安隊守住這些點和線，進一步以政治工作補足軍事行動，來完成清鄉的任務。這所謂政治工作，就是由保安隊去推進農村的保甲制度，這種保甲制度乃是保安隊廣大而深入的後衛。這樣和平區的治安可以確立，和平運動既由點與線推廣而為「面」，都市即不至於孤立，而與農村結合，和平區的完整可以得到。這種清鄉的工作在一地方完成，一地方的中日共同維持治安的階段即為過去，日軍可以撤退，而由我們自己來維持治安，統制經濟；這種清鄉的工作在和平區全部完成，所有在和平區為協同維持治安而駐屯的日軍部份即可以全部撤退，即使其時戰爭狀態仍然存在，日本駐軍也只限於重要軍事據點及其聯絡兵站。這已經是做到了局部撤兵。

我們現在還只有都市間的點與線，這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廣大的農村與都市間的點與線配合起來，結成面，纔談得上和平區的完整，纔可以着手建設與復興，纔可以做成模範區。人民在這裏可以安居樂業，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在這裏可以有事實的表現，循此推廣開去，國家的統一與全面的和平可以做到。所以清鄉工作，就現階段來說，乃是由局部和平到全面和平，由局部撤兵到全國撤兵的一條大路。這

是可以由我們的努力來決定，不是要等蔣與共產黨的覺悟始能成事的。現在就是要把和平運動的重點放在清鄉工作上頭！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七日

炸彈屠殺和重慶政權

爲政治鬥爭而買兇暗殺，已是一件最卑劣無恥的行爲；爲個人權利而買兇暗殺，陰謀不遂，至於明目張膽屠殺到一般民眾，尤其是豺狼不如的獸行，這是人類莫大的耻辱。中國今日而有這種人，真是中國莫大的恥辱。

暗殺和陰謀是於兩種政治形態之下發生的，一種是獨裁者的暴力政治，另一種便是沒落中的政治狀態必然的反應。

重慶政權恰恰如此，蔣介石的言行，充分表示了獨裁者個人權利的慾望。我們還看到重慶一大批無恥的政客文人，至今還是大傳其「捧場」「吹擂」的調子，另一方面藍衣社共產黨的恐怖浪潮，屠殺到一般民眾，這種行爲，十足證明了獨裁政權的暴躁與沒落。蔣介石共產黨這樣窮兇極惡的幹下去，除開謀和不斷的恐怖，只有加速其殘餘力量的崩潰，而革命運動的進展，是絲毫沒受到影響的。

我們早就說過了，站在和平運動一邊的同志，不是槍桿和炸彈所能威脅的，我們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向全國同胞闡述新的政治意識，由觀念鬥爭上的勝利推動革命的進展。重慶的殘餘政治力量，至今仍有英美侵略主義及第三國際在華代理人支持着，他們不為國家民族着想，他們到底不會覺悟。我們在痛心之餘，只好加緊我們的努力，正如汪先生說過的話：『不靠重慶的覺悟，憑我們自己的熱血，和平運動也幹得成功的』。在這種場合下，重慶的苦悶，便表現在它的政治陰謀，而恐怖陰險和惡毒的手段，反更鞏固了我們的意志和信心。

最近南京的陰謀案件，暴露着重慶在壽終正寢前的迴光反照。在民衆屬集的地方，放起炸彈，很明顯的他們所要殺的不是什麼個人，而是一般民衆。這點民衆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種缺乏人道觀念，缺乏政治道德的獸行，他們或許以為可以使社會的下層感到害怕，但害怕決不就是服從，而是進一步的痛恨這種卑劣的行動，實在是重慶自己把弱點露出來。我們翻開歷史看看，專制的君皇和苛刻的獨裁者，都沒蔣介石那樣狠心。俄國在羅曼諾夫皇朝的末代，曾爆發血染歷史的「紅星期日」，但這樣屠殺民衆，俄國的革命一樣成功了。重慶的當事人應該立刻明瞭，主觀的獨裁意識和不顧國家民族的行為，同胞是不會接受的。要是因此便遣使暗殺人員跑到南京來，以手榴彈的威力而破壞娛樂場而屠殺民衆，只有加深民衆對陰謀屠殺的痛恨，加速重慶的沒落。所以由這次南京的炸彈事件，我們對重慶政權的未來，可以分析出幾個趨向：

(一) 恐怖人員的無能以至幹出卑劣而不顧人道的案件，這是表示藍衣社共產黨在日暮途窮的掙扎中。(二) 重慶的壽命，已瀕於最後一息，政治上的弱點和不人道的企圖，將加速其崩潰的過程。(三

(一)事實證明，抗戰意識的不正確，和逐漸消失。

我們對於被害的民衆，深致其惋悼，對於根絕藍衣社共產黨的恐怖陰謀，更願提出三點意見，請大眾予以注意和討論：

(一)我們必須加緊努力收回上海租界，因為上海租界至今還是重慶暗殺組織的據點，工部局既然無能肅清，則讓給我們來幹。(二)我們要求一般民衆，一致起來協助政府確立治安，肅清匪共與藍衣社，以民衆的自衛使陰謀行爲無隙可乘。(三)加緊觀念的鬥爭，加緊建設的努力，使和平的意識和平的事實普遍到社會每一角，使重慶的獨裁政治買辦意識和非人道的種種醜惡形態，完全崩潰。

這是重慶政權的隕滅，也就是藍衣社共產黨的隕滅。

民國三十年四月九日

田中之言

二月二十四日，日本田中兵務局長在衆議院赤字委員會披瀝其對華事變之見解，有這樣的說話：「今後大陸作戰之重點轉換，爲在佔領地內部建築兵營，以治安第一主義與經濟開發爲目標，蓋此種建築兵營之舉，實爲過去解決滿洲事變之關鍵，今則蒙疆及華北亦已作同樣之進行。華中方面，則上海已築有兵營，故上海一帶的治安乃有較好成績。(見日本經濟學者雜誌第十九年第十二號，三月廿四日印行。)

該雜誌編者於引述田中的說明之後，加以按語，謂自武漢會戰之後，事實上已有此轉換，即不再着重在進攻戰，而着重在整理戰線，充實佔領地，今茲軍當局之賢明的披瀝，殊足稱頌云。

對於這一事實，我們希望重慶知所警惕，希望國民政府負起責任，並希望日本當局加以慎重的考慮。重慶以拖爲得計，結果却是日本在佔領地建築兵營，這種建築兵營，現在雖然還不過是動議，即在蒙疆及華北也還不過開始進行，但如果完全實現，則撤兵問題勢將發生新的困難。弱國之於強國，無論是戰爭，是外交，拖總不是辦法。因爲，拖是製造既成事實的機會，既成事實一多，總是於強者有利，於弱者有害的。清末許多外交問題都是因爲拖，弄到海關，郵政，以及租界制度後來都以既成事實作爲修訂條約的根據。而重慶現在的拖，即蔣介石所說的磁鐵戰，正在製造的既成事實是什麼呢？就是日本軍隊在佔領地建築兵營。重慶的藉口，是要日本先撤兵然後議和，但所做的事却是儘在把日本軍隊「愈引愈近，愈吸愈緊」（蔣介石語），緊到日軍在中國地面上建築兵營，生了根，總算是達到了「磁鐵戰」的目的了吧？然而中國是落在更大的苦難中了。要日軍的流動部隊撤退，尙且需要經過如許煩重的手續，如果建築了兵營，這筆賬將來從何算起，關於這一層，凡是中國人都不能恝然置之的。

重慶不覺悟，只能由國民政府來負起責任。我們要做成和平模範區，首先要使這區域沒有日軍佔領地的意味。把日軍佔領地變做中國的和平區，這不是名詞的改動，而是要有事實來表現。如果日軍普遍的建築了兵營，我們只有怪自己太無能耐，太不要好；我們只有怪自己太不負責任。我們所堅決主張的強化清鄉工作，乃是現階段強化國民政府的槓桿。清鄉工作做得好，我們自己有力量維持秩序，確立治安，日軍局部撤退可以實現。因爲建築兵營的計劃在日本原是不得已，而日軍的協同中國維持秩序，確

立治安，原是過渡時期的辦法。所以，今後或者是局部撤兵，或者是建築兵營，那一樣成爲事實，完全在於我們自己努力不努力，完全在於我們自己能不能負起責任。

對於日本，我們只能希望其瞭解。建築兵營之舉在日本爲加重負擔，在中國爲引起疑懼。中日事件如不能以貫澈和平來解決，而訴之延長的戰爭，則其結果，將不能不取決於太平洋全面形勢之變動。當太平洋形勢仍在流動不決的今日，日本在華建築兵營，只能使中日戰局僵化，此與日本處理太平洋形勢之活潑對策，便不能配合。而且建築兵營之目的原爲確立治安，開發經濟，循此以言，則爲日本計，協助國民政府完成清鄉工作，較之日軍在華建築兵營，在兩國互相尊重主權的意義上，是要明朗得多，在確立治安的意義上，是要有效得多。強化國民政府這一中心課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是只有自求多福，站在日本人的立場，卻是應當與人爲善。和平運動的成就，在於中國的努力，更在於日本的誠意，這是近衛聲明與豔電以來一般的情勢，中日雙方各應明瞭其責任，並且互相督促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日

弱者的心理

重慶方面天天在那兒希望美國的援助，只要美國可以用大量的軍火，無限制的送給他們，在他們就以爲不單可以抵抗日本軍，而且可以打勝仗了。倫敦方面也是在那兒希望美國的援助，以爲在這歐戰最

緊急的關頭，美國若肯參戰，則是幫助英國渡過難關的最有效方法。這種心理，和一個遭遇了災難的人，希望他人的救濟是一樣的，至於他人爲什麼要來救濟，就不是他所知道的了。

我們要抗戰，一定要有抗戰的力量，假若是不顧力量的拚罷，那也只有拚到底，等到發覺自己的力量的不够，而要希望他人的援助，以解脫所遭受的困難，這未免是太沒有把握，而近乎是一種夢想。現在重慶當局，不僅在作這種夢想，而且用這種夢想去安慰失望的民衆，甚至於羅斯福公子的來華，也當作是極重要的消息在宣傳着，這豈不是令人啞然失笑。

美國爲什麼要援華援英，難道羅斯福真的是慈善家麼？假若美國可以不顧自己的利害，而願意爲重慶方面，倫敦方面的利益去犧牲，則在中日事變發生的最初，就應該用實力去干涉日本，參加歐戰的時機，也應該是在德軍與英法兩軍酣戰於杜佛海岸的時候，決不至於聽了戰敗前法國政府的哀號，而置若罔聞了。

現在國際局勢的發展，已不僅是每一洲的自主問題，而已達到整個世界爭霸戰的猛烈開展的時期。英國要保持她的傳統的世界霸權，可是德國要爭，美國也要爭，德國對英作戰，美國援英作戰，雖然立場不同，手段不同，目標却是同的。演進到現在，英國雖仍然是戰場上的主角，然而相爭的對手已顯然在於軸心國之與美國了。所以我們可以說日德意的勝利，乃是美國世界霸權的崩潰，而所謂民主主義的勝利，不過是美國世界霸權的出現而已。美國要打擊日德意是爲的樹立世界霸權，而援助倫敦重慶也是爲的樹立世界霸權，並不是何厚於倫敦重慶，而何薄於日德意。只因爲美國的霸權如今還剛在建立中，所以不能不管閒事，但她的援助倫敦重慶，決不是要維持英國的原來地位，也決不是要在亞洲樹立一個

強大的中國。她却是要打倒日德意而使之屈服，同時也要打倒中國和英國。因此我們也可以知道重慶倫敦對於華盛頓的希望，究竟能够有些什麼！

美國的雄心是要宰制歐洲與亞洲，而不是要扶植歐洲亞洲，歐亞兩洲內部的混戰，這正是美國要達到她目的的最好機會，她的企圖是要延長兩洲的戰爭，以便從容佈置，而將兩洲確切的把握在手掌中，決不是要將戰爭迅速結束，以致錯過了大好的機會。所以她的做法是使英國勉強應付德意的戰爭，可是不願意英國戰勝德意；在亞洲也只須重慶能拖住日本，而不願意重慶能戰勝日本。因為這是打倒日德意，同時也是打倒中國與英國的最好方法，如同下莊刺虎的故事，以便小者死大者傷，自己則一舉而得其兩。

重慶倫敦既然是美國同一要打倒，要宰制的對象，這樣我們也可以知道她們向華盛頓所取得的援助，究竟是什麼一會事。重慶和倫敦的夢也可以醒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六日

渝共分裂與中國前途

渝共關係，新四軍事件是一個關頭，這次日蘇協定又是一個關頭。新四軍事件之後，渝共分裂開始表現於在朝的政治鬥爭，而日蘇協定之後，這種鬥爭將進一步明朗化，是無疑的。

首先是在重慶，其次是在香港，後來是在上海渝方的報紙出動對共產黨的攻擊，而以香港方面的表現最為出色。柳亞子之被開除黨籍是中共的一個小小的成功，但亦由此可見中共的鬥爭，現在還是照樣在官僚集團中施展合縱連橫的手段，還是照樣的沒出息。茅盾這一夥所謂左翼文化人，從新疆重慶逃回香港，正在進行以資本家為掩護，組織一個團體，並且出版刊物，以為對重慶展開攻擊的陣地。國民日報在斥責星島日報，而星島日報的主編金仲華則借胡文虎做擋箭牌而予斥責者以斥責。大公報的銷路最近聽說下跌，有人說是受了國民日報的競爭，其實並不是因為營業上或技術上的問題，却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渝共分裂漸趨尖銳化，在中間徘徊取巧，自命為通曉官方意旨，而又通曉民間輿情的大公報，至此乃感覺困難，其半官方的身份不足以與官方的國民日報匹敵，其半民間（其實是半共產）的身份又不足以與中共的機關報匹敵，說話無法明朗，銷路受到影響了。星島日報的銷路比大公報更跌，這一半是由於渝方的政治封鎖，一半是由於民衆對中共已由懷疑到厭倦，茅盾這一夥的新活動，能否有生氣，現在還無從知道，看來恐怕也難以衝破這種黯淡的處境，七君子的往事不可再得了。

在上海，這幾天可以看到渝方的報紙攻擊中共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邦為既成事實。但上海的鬥爭不及香港的熱鬧，未見對方還手，因為所謂左翼文化人早已把他們的陣地遷移到香港去了。

這裏要特別指出的是，截至今日，這一套鬥爭還是從新四軍事件發展下來的，雖然已經帶及了日蘇協定。新四軍事件初時，渝方報紙與官方一致，採取勸告的方式，後來大概是接到了訓令，馬上改變，而以報紙的攻擊與官方的勸告配合來表演。日蘇協定之後，渝共的鬥爭將進入另一階段，是必然的，雖然重慶官方對此協定尚保持含蓄的態度，而蘇聯也聲稱對華政策不變，但中共正在醞釀對重慶明白表示

不合作，在和平與抗戰之間中立，有如古之和尚，以「剃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來替自己解嘲。因爲這一着如今還在醞釀中，所以渝方報紙還不知道如何即刻轉入另一階段的鬥爭。

對於這種種，我們並不引以爲快意。我們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即渝共之在逐漸走向明白的表示不合作，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照情勢看來，日本以蘇聯爲媒介與重慶議和是不可能，與蘇聯聯合行動分裂中國有如德蘇分裂波蘭也是不可能，可能的是，今後將有一個時期，國民政府以外，重慶有一個蔣介石政府，西北有一個蘇維埃政府，互相對立；這種不確定的形勢將延宕到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重慶的聯絡被隔斷，然後由蘇維埃政府接收蔣介石政府，中國分成兩國，而中國人的國家從此消失，到頭還是逃不了波蘭的命運。我們要防止的就是這一着。

現在遠東的國際形勢還在不確定當中，因而中國的地位也還在不確定當中，這不確定，正是我們還可以有所作爲的機會。我們要趁這個短促的機會展開和平運動，莫待環境終於確定，太平洋戰爭終於爆發，中國終於被分割之後再來做復國運動。全面和平因爲提不出新的內容，已漸漸的被人視爲一句八股的套語，這是每一個和平運動者都應深自警惕的。其實，要做到全面和平也不難，只問我們有沒有勇氣去爭回國家的主權。渝府因不能向英美爭取中國的自主，中共因爲不能向蘇聯爭取中國的自主，所以在一天一天沒落，但誰能取而代之呢？只有能向日本爭取中國的自主的和平運動者，纔能取而代之。現在我們的魄力和努力是還不够，我說這話，並不是失敗主義，只是因爲我們要有改造現實的勇氣，所以我們首先要勇敢地正視現實的勇氣。安於現狀，應爭不爭，是會把和平運動拖下水去的。

中國的處境

國府改組還都到今天是整整一年了。我們的努力有相當成績，但我們的處境則在更艱難起來。這一點很容易明白，因為中國的處境正在更艱難起來。前年四月，我在香港南華日報社評說過這樣的話：「必須在歐戰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和平。」後來在上海中華日報社評又說過：「必須在日美戰爭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全面和平。」現在回想，真是很感慨。中日和平方案成立，已在歐戰爆發之後，國府改組還都，已在歐戰擴大之後，而中日和約簽訂，則又在三國軍事同盟成立，美國在太平洋的戰氣開始表面化之後。到現在，美國租軍法案通過，在大西洋，美國以舊艦供給英國，而在太平洋則以美艦來接英艦的防地，這種形勢正在顯明起來。我們不但沒有在歐戰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和平，而且將不能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作成中日全面和平。這裏，蔣的罪惡不必說，我們的責任也沒有盡。

重慶在希望日美戰爭，不足爲怪，因為他們已經打得昏頭昏腦，那裏還會想到如果日美戰爭爆發，中國將只有加重失敗，而無分沾勝利的機會，正如英德戰爭無補於波蘭一樣。若是和平運動者也來鼓吹日美戰爭，那是更不可原諒。因為中國祇有安定自己，就是對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盡了分担的責任。中國現在，切不可隨便指定那一國做我們的敵人。也有人以爲日本如果對美開戰，對華一定更寬大，以此希望日美戰爭爆發，好把日本的目標移開去。這種想法對日本是缺乏友誼的誠意，對自己則是缺乏選擇禍

福的常識。他們總不看一看，德國因為要繼續加緊對英作戰，所以要繼續加緊對歐洲大陸戰敗國的控制。日美戰爭如果爆發，和平運動者從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的努力，將只有更艱苦。

戰爭不是兒戲，重慶之比華盛頓更勇敢，只是因為華盛頓的人們知道對美國負責，而重慶的人們則不知道對中國負責。我們和平運動者也切忌比日本人更喜歡戰爭，最近日本人伊藤正德發表「不可輕視的美國海軍」一文，我讀了之後只有欽佩，只有慚愧。人家是這樣的愛國，這樣的為國家策安全；因為愛日本，所以不敢輕視美國，因為不敢輕視美國，所以把太平洋的戰爭看得很認真，這纔是智深勇沉。然而我們，對國際的知識是太差，對本國的處境也沒有弄明白，如此而為己謀為人謀，便沒有一樁對。

我們要學習鎮定，並且多知道一點常識。我們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中國沒有可以取巧僥倖的機會。我們只有孤臣孽子之心為國家保存元氣，保存得一分是一分。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頹喪，但也不要太輕佻。

大家要記取汪先生的訓示·智深勇沉。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三日

渝共衝突及其界限

關於新四軍事件，有蔣的文告，有中共對參政會的公函，有渝方在港滬報紙的「輿論」，可是仍然不容易正確的測量渝共衝突的深度，並解答此種衝突的發展會不會走到內戰，及其可能給予抗戰陣營的影響的問題。

亞細亞雜誌四月號就這問題提供許多新的資料。據其所說，新四軍原來是江西紅軍的殘留部份，人槍不及五千，南京失陷後，得蔣的許可，在南京，蕪湖與漢口附近，以及長江北岸的某幾處編成游擊隊，按月領津貼十三萬元。到今年開春，這新四軍號稱十一萬人，槍械都是搶來的，蔣並不供給。渠等之首領會同八路軍之首領，曾幾次要求增加津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何應欽忽發一命令，限新四軍於一個月之內自江南撤至江北。對此，新四軍再作一次增加津貼的呼籲，並要求保留將來對各問題談判之權，以及撤退的充份時間。蔣不作答覆。十一月，蔣簽發愛的美教書限新四軍於十二月底以前自其所有在江南之根據地撤退完畢。新四軍再度要求延長時間，蔣仍不答覆。新四軍乃迅即撤退，至十二月底，其部隊之十分之九已移至江北，只有後衛人槍四千。以及另外的四千人包括傷兵，學生，工人，看護與政治人員，尙留在安徽南部。今年一月四日，這最後的一個縱隊依照蔣指定的路線，通過上官雲相的駐境，從安徽南部撤退。第二天他們向江邊開拔，正在一隘谷中行走時，突被八萬蔣軍包圍，命令繳槍，遂

起戰鬥，凡八晝夜，新四軍潰滅，除數百人突圍逃走外，被俘獲二千人，死傷五千至六千人。項英重傷被擒後槍決，葉挺重傷被擒後送重慶等候軍事審判。史諾說這是蔣軍在台兒莊之役以後的惟一大捷。現在是，蔣軍精銳部隊二十萬人在陝北八路軍後方監視，另外三十萬人集中長江以北與新四軍主力隊伍繼續作零星的戰鬥。

蔣與中共之間的曲直是不足論的，只是就這個事實可以看出蔣是相當的斷然，而中共的怨氣也很深，雙方都已把抗戰放在第二位。蔣在滇緬路重開之後，即將以前所宣傳的國民會議無期擱置，對中共的態度突然變得嚴厲，至於以五十萬精銳部隊經常為對付八路軍及新四軍之用，所謂對日大反攻是早已沒有這回事了。中共呢，前年德蘇協定成立之後，毛澤東對史諾有過這樣的說話：「蘇俄援華之繼續須視中國是否與蘇俄緊密合作。」史諾問他：「蘇俄援華是否會採取與對付波蘭的同一方式！」答稱：「這種可能是有的。」因此歐脫萊認為，日蘇一旦成立諒解，德國將策動，利用蘇俄說項，而以中共軍為壓力，作成蔣對日本的議和。但這是言之過早。因為德國有獨佔波蘭的可能，所以蘇俄要趕快參加分割，可是蘇聯現在還無須憂慮日本會一下子把整個中國都拿去，日蘇協定關於滿蒙的諒解，在目前已使蘇俄滿意。史太林沒有必要改變這種現狀，壓迫蔣介石議和，因為現在來壓迫蔣議和，不管日蘇之間再有何種諒解成立，中共還是不能取蔣而代之，蔣還是一個在日本與蘇俄之間的一個力量，於蘇俄無益。日本現在還提不出一種代價可以使蘇俄幫助牠解決中日戰爭。

蘇俄的態度如此，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結果是不得要領。中共雖對蔣銜怨極深，但仍避免訴之內戰。在蔣這方面，也不會。美國的支持，日本的不進攻，與蘇俄的猶豫，作成了重慶的存在。正因為這種

形勢的配合，蔣纔以五十萬精銳部隊用於監視八路軍與繼續打擊新四軍。他敢於這樣做，但也以此為止，因為如果再進一步，便會與上述的形勢配合發生參差，振動，以至於破裂；因為如果變成內戰，日本的對策將改變，蘇俄的對策將改變，甚至美國的對策也將改變，蔣將無從另外尋覓一個國際勢力關係的結合點來做支持物。所以我說，渝共衝突至今還停留在新四軍事件的範圍，日蘇協定還沒有把這種衝突展開一個新的場面。

多做自己的工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八日

世界的大風暴中，最容易昏頭昏腦的是弱小國家。遠在東方，中國的輿論界也往往說些不知所云的話。大概一種是同情英美的，恨不得英美一下子把德義扼死，而且也以為一下子果然可以扼死的。另一種是同情德義，把德義的勝利看作就是我們的光榮，在期待疾雷破山後的日月重光，風物清淑。

這裏，一個是正義的問題，一個是自身的利害問題，一個是事實的問題。

就正義來說，汪先生表示過：「中國同情德國之為解除凡爾賽條約的束縛而奮鬥，但亦以此為止。」循此，則我們對於德國之為戰爭禍首的惡謐，大可以不必跟英美的宣傳家一樣的義憤填膺。但一到戰爭的發展已超過解除對民族國家的束縛而為再分割世界殖民地與再建世界霸權時，此中曲直，身為殖民

地或半殖民地而左右須受世界霸權的支配者，便沒一定要表示興趣的義務。

就自身的利害問題來說，首須認識中國在兩大之間講合縱連橫的資格是不够。當人家覺得可以命令你時候，你去討好，只是雙重的損失，渝方是一路討好英美的，然而緬甸路忽然封鎖了，忽然又開放了，根本不因爲你討好不討好。這一層，倒不單是渝方應當明白，凡是中國人都應當明白的，因爲和平運動所依據的與抗戰所依據的是同一個中國。

說到事實的問題，這場世界戰爭誰勝誰敗現在來說還太早，因而要投機也還太早，我們覺得人家的風度是比我們的好。同情德義的中國宣傳家，至於不敢說義大利前一時在希臘與東非的失利，然而希特勒在一次演說裏却坦白的說到「義大利戰敗」。同情英美的中國宣傳家以其替蔣介石譁敗爲勝的同樣苦心去替邱吉爾辯解，然而邱吉爾報告戰局的演說却要老實得多。至如對於日蘇中立協定，中國方面的宣傳，不是捧之上天，便是按之入地，反而不及日本人自己的批評來得客觀。世界上的國家，也有與日本友善的，如德義，也有與日本不友善的，如英美，他們對日蘇中立協定的批評雖也夾有毀譽，但均不如中國之過份。中國現在是只有毀譽而無批評，而只知以毀譽討生活者的身份是可哀的。

以上三點，我們希望國內的輿論界知所反省。尤其是和平運動者，應當遵照汪先生的蠶電，國府還都宣言，與還都一週年紀念辭，以爲宣傳的依據。汪先生所歷次昭示者，爲「對於一切友邦，亦本此和平外交之方針，以講信修睦，增進友好關係，」而此種方針，固至今不變。此處須解釋者，僅爲我們所希望今後中國對英美的關係並非繼續已往之主從關係，而爲代之以友誼的關係，可不是一變變做仇敵。中國現在固然不能用超然的態度去看待世界戰爭，因爲你不去惹它，它還是要臨到你頭上來的，許多要

想中立而終於不能中立的國家，可以做我們的借鏡；只是中華民族的身份總應當自己知道尊重，不要穿入夾縫中去做丑角；國民政府亦有其既定的外交政策，不要自己把步驟混亂了，尤其不要把中國的立場迷失了。

中國的宣傳家似乎太過於把希望寄托在一種世界主義，不是這一種，就是那一種，這其實是過去所謂民主國家集團陣線的殘餘心理。處在中國現在的境遇，任何一種世界主義，只有與中國自身要求解放的奮鬥配合來講纔有意義，否則，你所講的只是別人的事。英美勝利或德義勝利，都不能使我們得救，與其化了如許力氣替人家吆喝，不如把這力氣化在自救的工作：倒是可以做出一番事業。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三十日

工人運動之流變

在今日的世界，今日的中國，紀念勞動節是有着特殊的意義。我們循着戰爭的河床去踏勘工人運動的伏流，可以發現歷史正在創造中的前景。

這次世界戰爭的展開以至於將來的結束，與工人運動有着不可分離的關聯。人民陣線使工人運動迷失，終至於完全敗北，戰爭乃擺脫了惟一可能的羈勒而爆發。其在中國，人民陣線同樣的招致了國家的災禍，也招致了工人的災禍。如今是，除了美國的工人倖免於那一次普遍的慘敗，尙能保持活動外，全

世界連中國在內的工人都落在戰爭的苦難中，蘇俄的工人，境況也並不較好。可是，這次戰爭並不是人類歷史的最後一頁，將來切斷戰爭的和平來到，工人運動所表演的角色，仍然是可注意的事物中之最可注意的。

從第一個勞動節到現在，工人運動已走過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三年，其領導是第二國際，其核心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其標識是工潮的繼續上升，其引起的波浪是俄國一九〇五年的民主革命，與中國一九一一年的民族革命。第一次世界戰爭把這個發展打斷了，直到戰爭的後半期纔重新抬頭，走上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作成了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革命，作成了歐洲各國將近十年的政變，並且引起了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到一九二八年，工人運動在世界的陣地上終於遭到了普遍失敗。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經濟恐慌就在這種沉寂中渡過了。但從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的政變開始，法國，德國，以至於英國的工人運動又漸有生氣，流波所及，印度與埃及的獨立運動也活潑起來。工人運動是這樣的走入了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在德國納粹上台時遇到了第一個失敗，到法國達拉第內閣上台而終結。至此，工人乃輾轉陷入戰爭的體制。現在是沉寂。

戰爭可以壓倒工人運動，然而不能消滅。戰爭同時也在助長工人運動。沉寂之後，將如何再抬起頭來，現在雖然還不知道，然而可以知道的是，今後的工人運動必與第三國際脫離；今後的工人運動必與世界和平運動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結合；今後的工人運動將是從另一方面來的決定戰爭結果的重要因素。

若就中國來說，從去年下半年起，工人運動已開始活潑起來，最近兩三個月來上海工潮已成爲可注

目的問題。不過現在還停留在經濟的鬥爭，道不上政治的鬥爭，工潮現在還只是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的本能的反應。和平運動者不是要彈壓工潮，而是要解決工潮背後的問題，而是要幫助工人從經濟的鬥爭進入政治的鬥爭，把工人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清算抗戰，共謀建築國家的獨立自由的基地，以和平之嚴正促成和平之統一。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

糾正十四年來的錯誤

孫先生的遺教，中國革命的完成有待於日本的諒解，十四年前的五三慘案是第一個反面的證明。北伐之役，本來是反英帝國主義運動的擴大；固然也牽涉到日本，但當時我們如果能正確的運用外交，把日本與英國分別看待，因為主要的對象究竟是英國，則北伐的成就當不至僅止於如此。與英國是無可妥協的，但在反英的戰略上與反英的成就上，中國未始不能改善對日關係。不幸中日雙方都沒有明白這一層。北伐剛達到長沙，蔣已與英國妥協，變成反日不反英，此種路線，至粵漢分裂蔣投靠英國後而表面化。於是又有濟南慘案。

這一錯着，並不因為濟南慘案而修正，反而愈走愈遠，以至於爆發這一場中日戰爭。這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只可惜我們不能善於運用華盛頓會議以後的遠東國際形勢。華盛頓會議以後，遠東國際形勢

的具體說明是：英日同盟拆散了，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已開始下落，可是美國也還不能在這方面有具體的伸張，而日本的行動則有着更多的自由。這三個勢力的牽制所作成的平衡，本來是暫時的，因為這三個勢力的對比不是確定的，而是在變動中。變動的方向雖然不能預測，然而可以知道的是，均衡的破裂，均衡現狀的破裂將是在日本的行動中體現。日本的行動可以有兩個方向，一個是聯絡中國，並與美國呼應，直接壓迫英國從南太平洋退却。日本當時也確曾有過這種南進論。另一個方向是與美國呼應，而以中國為戰場，消滅英國在遠東大陸上的勢力，這就是所謂北進論。不幸我們沒有看清楚這種環境，因為我們的處置不妥當，結果把太平洋的形勢分做兩邊，一邊是英國指揮中國，另一邊是美國默契日本。至此，日本的北進論乃取得壓倒的優勢，而中國則做了鐵砧。

可是，中日戰爭還只是改造華盛頓會議以來的遠東均勢的序文。以前是英美對立，現在變成美日對立，太平洋的形勢還是沒有確定。蔣以前幫英國抗日，現在又幫美國抗日，都是失算。固然，現在在華勢力最大者已是日本而非英國，因而渝方可以這樣說，中國現在的處境和孫先生在神戶演說大亞洲主義時的處境是不同了；但我們還是應當停戰，還是應當講和。因為，在遠東大陸以及太平洋上之由英日之爭到美日之爭，和在歐洲大陸以及大西洋上之由英德之爭到美德之爭，有其類似，而中國的處境與法國的處境亦有其類似。若說是要運用國際的形勢，議和是一樣的可以運用，至少是停戰之後可以更自由的運用。法國現在就同樣可以運用對英美的外交。若說議和或停戰不能恢復損失，則把這種損失暫時作為懸案，也未始不是一種辦法，因為繼續抗戰頂多也只能把這種損失暫時作為懸案而已。太平洋的局勢正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們正還保留着將來可以公平的解決這種懸案的可能。若說停戰或議和將非撤退游擊

隊不可，這將只是幫助日本安定其佔領地，則我們正可以收復被佔領地的要求來和日本的要求作爲交換。然則爲什麼一定還要繼續抗戰下去？渝方不相信日本的誠意，但總應當相信國際形勢的現實。渝方不是在宣傳日本解決中日戰爭的困難，與日本所受國際形勢的牽制嗎？如果如此，則更應當承認議和的有利環境，而抗戰則只是把這種有利的環境糟蹋了。渝方如果還堅持不議和，至少也應當承認停戰是有益無損。他們可以看看法國。然而渝方却在說先撤兵後議和，這不是對日本沒有誠意，而是對中國的命運開玩笑。

現在中國還沒有被征服，太平洋的形勢還沒有確定，這也就是說中國還有做法國第二的資格與機會。法國現在很少講親善，如果渝方不明白遠東與歐洲的差別，而堅持對日本的懷疑，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和議，因爲歷史上的和議本來不是只有一種典型，就算是普法之戰吧，還是應當議和，而且可以議和的。至少應當先停戰。若說中國與法國不同，法國如果不停戰，本土就會完全淪亡，然而現在日本已放棄進攻重慶的計劃，所以停戰不停戰結果還是一樣。那麼，我們還須認清，中國在另一方面也有比法國更困難的地方，那就是，法國內部是團結的，而中國則有中共爲其心腹之患。繼續抗戰，即使日本兵不打進來，到頭中國還是會像波蘭一樣被瓜分的。所以法國有不得不停戰的理由，中國也有不得不停戰的理由。

法國止於停戰，而中國則還可以議和，因爲日本在佔領地所遇到的困難，較之德國在佔領地所遇到的困難更大。這裏，我們就站在比法國更有利的地位，可以與日本談判議和條件，這也就是，法國只能暫時放任其被佔領地的現狀，而中國則可以收復其被佔領地的關鍵所在。

蔣之所以執迷不悟，乃是五三慘案以來一貫的對於遠東國際形勢的愚昧，不但對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無理解能力，就是對於一般外交運用也無理解能力。蔣是無足惜的，可是我們不能讓中國滅亡，我們要求即刻全面停戰，進而求全面和議。只有即刻全面停戰可以防止正在發展中的共產黨分裂中國的運動，可以防止中國之走向波蘭的命運。

紀念「五四」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三日

五四運動過去二十二年了，三十歲以下的人已不能瞭然，三十歲以上的人呢，早已脫離學生生活了。有的倒霉，有的發達，心境也各各不同了。倒霉的朋友們不必說，他們已經成了時代的渣滓，年青時候做的事等於一夢。發達了的朋友們是更不願意再提起五四運動。何止五四運動呢，連提起北伐，現在都覺得有點後悔似的，因為他們現在不喜歡有任何驚動。

五四運動出來的劉半農很快就倒轉來笑罵語體文。北伐達到北平，蔣介石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拜訪段執政，究竟咱們還是一家人云。

然而五四運動還是偉大的。它把中國文化提到世界文化的場面上去再估價。也正是這一點，使許多後來的人感覺不愉快。說它打擊了中國文化，並且即刻拿「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教條來糾正它。但也

仍然有人以為，文化的差別一種是進步與落後的差別，一種是民族間的差別，因為這兩者容易混淆，而且往往故意的被混淆，所以弄到以保持落後為保持民族文化，而體用之說則徒然成為一種玄語。至於最動人的中國固有道德與東方精神云云，也需要加以考訂。東方精神並不能幫助我們發揚民族文化，例子是，德國與英法，都是西方精神，但他們的民族意識的界限還是森嚴的。由此可知，我們如果接受西方精神，不見得就迷失了自己，而執着東方精神，不見得就能發現自己。我們要保持民族的道德，也須注意不要變成保持了宗法社會的遺規。

什麼是民族文化呢？就是一個民族求上進的意識形態。爭取國家的統一，爭取國際地位的解放，爭取國內生活的現代化，與這種精神配合的生活方式，就是中國所需要的民族文化。能够保持這個，並且發揚這個，總不必怕因為歐化而忘記了祖宗。科學是我們一定要提倡的，不但要有運用科學的技能，而且要有科學的人生觀；體與用是分不開的。我們是東方人，可是我們覺得東方人需要反省，不可以看輕物質，看輕物質是會弄到經濟被剝削，領土被宰割，而處之泰然，仍在那裏讀四書五經的。

五四運動之所以偉大，就因為它在這些地方給予了我們可寶貴的啓示。

可惜五四運動當時缺乏健全的領導，幾乎只是一種自發的運動。但亦因此，所以是純潔的，比較後來蔣介石用他的幕僚來領導，比較後來中國共產黨用它的別動隊來領導，却是要好得萬倍。現在的人們，對於中共的一套是厭倦了，知道非矯正過來不可，然而因為找不到矯正的角度標準，覺得還是蔣的那一套是正統，這將使中國文化繼續陷於無出路。中共是不滿意五四運動的，覺得不够「普羅」，蔣氏之徒也不滿意五四運動，覺得跡近「暴動」。可是我們，卻要承認五四運動之進步的意義，並且惋惜五四

運動以後的倒退。

紀念「五五」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四日

民國十年五月五日革命政府在廣州成立，後來北伐之役實以此爲其始基。現在國民政府改組還都，與當時情勢有同有不同，而我們所應注意的，乃是革命的核心應力求其健全，政治的體制應有新的運用。革命政府成立之時，環境至爲困難，亦至爲複雜，各色軍隊，各色團體，類多一時形勢之結合，初未有堅強一致之信念，故不久有陳炯明之叛變。基於此種經驗，乃有國民黨之改組與國民革命軍之再建。現在我們的處境與責任，較之當時是更爲艱鉅，因而要求健全的革命核心組織亦更爲迫切。我們要求強化黨的紀律。

強化黨的紀律，並不只是爲了易於叫人服從。像史太林的黨那樣，以擁護與彈壓爲紀律，乃是革命的墮落而非發揚。世界上固然也有一種政黨是以擁護與彈壓爲其本來的任務的，但那是法西斯。把國民黨法西斯化，蔣曾經這樣做過，結果却是失敗。我們不能再蹈覆轍。

國民黨的紀律應當是，下級要服從上級的命令，上級也要遵守下級的決議。這種紀律，就是要貫澈民主主義的嚴肅性。我們常常說民主集權，這民主集權的解釋，是必須下級有權，上級纔能把來集中。

集權是下級對上級負責，而民主則是上級對下級負責，偏廢其一，便是責任不明，便是沒有紀律。蔣的徒衆，有他們的紀律，但那是官廳的紀律，而不是黨的紀律。

黨的紀律之所以失墜，是因為黨的下層沒有力量，是因為脫離了羣衆。革命的政黨是領導羣衆，法西斯黨是利用羣衆的工具，而一個無能的政黨則以羣衆為應付的對象，時時因為應付困難而煩惱。中國現在，因為長期的戰爭破壞招致了社會秩序的瓦解，正在繼續增高的工潮為遍地的農民騷動，都可以證明羣衆對現狀的不滿與尋求新的生活，有如民國十年前後。當時革命政府能够代表羣衆的這種要求，我們現在能不能代表羣衆的這種要求呢？這就在於我們是打算與羣衆結合作為奮鬥的主體，還是把羣衆作為奮鬥的對象？民國政府改組還都能不能如同革命政府的成立那樣負起時代的任務，也就在於我們有沒有一個健全的黨。

至於現在的政治體制，原來是根據總理的建國大綱的。只是我們必須認清，這種制度是以與健全的國民黨配合為前提，纔能發揮它的機能。蔣的時代也是一樣的五院制，然而變了質，這道理在那裏呢？我們不能不想想明白。現在有許多人以為蔣只是錯在無底抗戰，我們和他的分別只在於我們是主張和平，所以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後，許多地方還是繼承蔣的辦法。這種觀念實在是要不得。

我們要怎樣纔能發揮五院制的真精神呢？我們一定要從蔣的政治作風解放出來。廣州成立革命政府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事，國民黨的改組與北伐則不過十幾年前的事，難道我們就如此健忘，至於在思想上輾轉不能解脫蔣的窠臼，無從尋覓總理領導我們已經走了一段的革命的軌跡了嗎？

我們要肅清蔣介石主義的殘餘，不僅是否定他的無底抗戰而已。只有如此，我們纔能以新的自信開

拓新的前途。我們要求強化黨的紀律，樹立革命的核心，而以此為運用國民政府之槓桿。摹倣別國的這種那種新體制，只能增加我們的空虛。中國的政治本已走過一段革命的歷史，我們為什麼要如此的感覺空虛呢？我們正有著一貫的發展途徑可循。紀念「五五」，就是要我們明白這一層。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五日

親善之道

中日要親善，是大道理；問題只是如何親善？在兩國的戰爭行為尙未停止的今天來紀念五七，想起二十一條之類的一連串往事，又看看眼前的情形，我們尤其不能不認真的來思索一番。

我總覺得，親善不是基於彼此感情的無間，而基於彼此利害的明辨。中日為仇敵十年，再經過這場戰爭，兩國人民的感情是只有更壞，現在要化為親善，當然是不容易，但一半還是因為我們的做法不好，講親善而不知所云，所以日本方面至今還沒有消除輕華侮華的觀念，中國方面也至今還沒有消除仇日排日的觀念。其實事情很簡單明瞭，過去兩國感情上的仇視是由於兩國行動上的仇視而來；今後也只有消除行動上的仇視，纔能消除感情上的仇視。感情往往是事實的結果，不是前提。

現在應當是多多解釋兩國的現實關係，使人民明白利害與取捨，不要像傳教師那樣只在那裏勸人為善，反而引起民眾的反感。中日講和，中國是吃虧的，這裏就要使民眾瞭解為什麼雖然吃虧還是應當

和。如果說，日本打中國是爲了要中國好，講和，中國不但沒有損失，而且大有所獲，這種話民衆是不要聽的。和平運動者對於民衆，應當是解釋多於勸導。例如法國的經過是我們的一個參攷。我們應當使民衆知道，中國從局部和平做起比較法國一來就全面停戰，只是中國的遭遇更困難，而不是中國沒有前途，這道理在那裏？法國如果繼續戰爭，本土會全部淪亡，所以要停戰，日本並不能够也並不打算佔領中國全部，但中國還是以停戰爲是，這道理又在那裏？法國停戰而不議和，中國議和而未能停戰，法國的做法是對的，而中國的做法也仍然是對的，這道理又在那裏？歐洲戰敗國家在德軍佔領下的命運，我們中國卻是可以解脫，這道理又在那裏？諸如此類，一定要使民衆統統明白，在理智的抉擇下作成和平；更由於和平事實之臻於滿意，兩國人民纔能有感情上的親善。

同文同種不是一個理由，英國和美國就曾經打過仗，而且現在美國的接濟英國事實上乃是接收英國。東亞新秩序與共存共榮則是一個目標。要走向這個目標，有一條崎嶇的路。現在我們的工作不在乎天天描繪這個目標，而在乎多做這條道路的測量與清除工作，要注意在這條路上走去的中日兩國人民，應當怎樣安排隊伍。中日兩國人民應當是攜手前進，或者中國人跟在日本人的後頭都還可以，但總不可以是日本人騎在中國人的背上。這不是空洞的原則，而是要作爲中日具體關係的據點。

中日人民與和平運動者不滿意於和平現狀，這是好的現象，但光是不滿意，而很少人能够嚴正的提出問題，嚴正的要求解決，這卻是不好的現象。照中日兩國的利害來說，和平運動成功的前提是存在的；所以還沒有做好，這個責任是雙方的，而我們又比日本人還更迴避問題。有許多事情果然是爭不回來的嗎？不然，還是因爲我們應爭不爭。

我惋嘆中日人民現在的隔膜比從前還更甚。從前是做仇敵，而私人間往往有真誠的友誼，孫先生的日本朋友不必說，即如一些普通的中國人與日本人吧，他們相見，雖然不一定能做朋友，卻是坦白的，表示出中日兩國人民的本然。現在則只是說些禮貌上的話，一來就融洽，其實是還沒有融洽。這裏，倒還是日本人比我們誠實些；日本人的要求已經使我們明白，但我們的滿意程度，日本人至今還是不容易明白，這個責任是要由我們來負的。因為我們不够爽直。應當如同兩個堂堂的男子相見，開誠佈公，就事論事。親善是生於相敬，尤其是生於相知。我們應當使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求和平，是因為我們要求祖國的獨立自由，並且應當把這種獨立自由的要求翻譯成現實的中日問題，提出意見，爭持都可以，只有這樣，纔能作成彼此的諒解，並且由諒解進於友誼，變成親善。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七日

重心在清鄉工作

和平運動的目的，在復興中國，建立獨立自由的中國，但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全面和平之實現，不能待於渝方之覺悟，而全恃吾人之堅毅的努力。

這一努力，在當前就是清鄉工作。

清鄉工作是和平運動的主幹。對外要做到日本軍隊的撤退，對內要確立以汪先生爲唯一領袖之民族

中心勢力，都只有從清鄉工作做起。

戰禍所及之區域，已成爲人間地獄。我們要努力肅清這一區域中的一切有害於人民的新舊腐惡勢力。游擊隊，共產黨，土匪，必須剷除淨盡。歷史殘渣的土豪劣紳，在戰時與特殊勢力作不正當連結的新式土豪劣紳，所以，清鄉工作不僅是維持秩序而已，並且使吏治澄清。

從清鄉的區域做起，我們還要使日本軍隊及一切非正常之機關撤退。這是可以做到的。這種區域，本來是在游擊隊手中，我們在這些地方完成清鄉工作，就是在這些地方辦到了停戰。前年七月汪先生在廣州的廣播演講，在非淪陷區停戰，日本軍隊依照約言，決不觸及該地之軍事政治與經濟主權。所以清鄉區域決不會有日本軍隊與非正常機關之蹤跡，是毫無疑義的。但這還不能說是撤兵，因爲這些地方本來沒有日本兵。所謂撤兵者，是在游擊區域隣近的日本駐軍，因爲游擊區域經過清鄉工作而變成和平區域之後，可以撤退。我們說抗戰不能使日本撤兵，和平可以使日本撤兵，又說從局部撤兵做起，清鄉工作就是辦法。

經過清鄉工作，我們方能有一片乾淨土地，可供人民安居。沒有游擊隊，共黨，土匪，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也沒有日本兵，並且撤消現時阻滯物資流通之統制，如此，我們方造成了人民還鄉運動，與上海游資內流運動的環境。

清鄉工作絕不以改善現狀，或恢復原狀爲滿足。現狀隨時要改善，原狀永不能恢復。清鄉工作之確立社會秩序與地方治安本身並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復興中國，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第一手段。治安秩序確立以後，我們即擬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作積極的推進。清鄉工作所

到的地方，我們只有一個黨，就是國民黨，只有一個主義，就是三民主義，只有一個領袖，就是汪先生。在這種理論的認識與行動的體系之下，我們要身體力行的來救濟人民，推行保甲組織，改善並管理物資流通機構，建設新的縣政與稅制，而以此復興農村經濟，並因農業經濟之復興而使都市復活。

我們決心在和平區域內，建設強化的，合理的黨政軍一元組織。而清鄉委員會之組織與行動就是一個模範，因為它不是官僚機關，而是切切實實的行動機關，它的意志是齊一的，它的紀律是嚴明的。清鄉委員會是在全國惟一的領袖汪先生的直接指導之下，凡是合理的，必需的辦法，說得到，也就一定做得到。就這點來說，清鄉工作又是具有政治制度的革命的偉大意義的。

現在清鄉工作已在開始，不久將可以實際行動，從一地方入手以次及於全國，而以此完成全面和平，建設中國，復興中國，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決心，並且也是我們的行動步驟。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二日

我們的抗議與決心

我們嚴重抗議公共租界巡捕襲擊吳雲甫夫人，殺傷衛士司機之荒暴行爲，並嚴重警告公共租界當局應負此不幸事件之一切責任。

吳夫人之衛士，當時曾出示手槍照會，執行檢查之巡捕，已明知車中主人係國民政府警政部專員吳

雲甫先生之眷屬，此在一般禮貌上，尤其在租界當局與市政府所成立之種種諒解上，即應參照多方之身份，而該捕等竟蓄意留難，逼令繳槍，這乃是惡意的侮辱與挑釁。前此，國民政府高級官吏在同一地點，曾疊遭類似之侮辱與挑釁，我們正惋歎並懷疑公共租界當局之措施，今則我們已無須惋歎與懷疑，而不能不承認公共租界當局已自毀其尋求諒解之經過，且明白敵視其所在地之主人矣！此其一。

當該捕等逼令繳槍時，吳夫人告以途中需槍保護，且該槍係工部局發給，如必須繳出，可同去工部局交涉。此種要求，自極合理，乃竟遭該捕等拒絕，蓋公共租界之巡捕通常有一種觀念，以為渠等固有權隨意虐待，戲弄，並敲詐在其範圍內之正當人士，私和，私了，而無須對工部局負責；但我們於此指出，工部局仍應對其所屬巡捕之一切不法行為負責！此其二。

因該捕等拒絕同去工部局，如此相持半小時之後，來一西捕，經其他巡捕與之說明經過，且又久久審視手槍照會之後，竟用手槍對準衛士，逼令繳槍，吳夫人方欲有言，該西捕已開槍一響，衛士負傷後，採取自衛行動，拔槍還擊一響，仆西捕於地，已亦因傷重倒在車內。於是所有在該處之巡捕用手提機關槍掃射，吳夫人之坐車中彈三十三粒，司機跳出車外奔避，亦被西籍後備隊員開步槍擊倒，並流彈殺傷路人多名，而吳夫人則僅以身免。夫以一普通汽車，其乘坐者為一婦女，並衛士司機不過三人，且已明白其身份，理應放行而留難，可以同去工部局而不去，必不得已尚可以呈請主管機關用外交方式辦理而竟當場格殺勿論，明知其無抵抗能力而竟用所有之武器，手槍，手提機關槍與步槍一齊轟擊，這就是歐美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這就是公共租界巡捕所受的訓練與施爲！此其三。

當司機已中彈倒地的時候，巡捕仍捉其頭撞地不已，以為快意。其後救護車來，將受傷之西捕載

去，而對於重傷之衛士與司機則置之不顧，對於吳夫人是否受傷亦略不存問。吳夫人要求送受傷之衛士司機去醫院，而已則去工部局，均遭拒絕，且在巡捕之包圍中禁止行動，如此者又半小時，以供渠等欣賞渠等所造成之偉業。此種草菅人命與獸性的殘暴行爲，實使全世界文明人士為之震驚。其後某律師乘車過此，渠係認識吳夫人者，見之趨前存問，竟被巡捕毆打仆地，仆地之後還要毆打一個痛快，這纔拘送捕房當作土匪關在鐵柵子裏。為什麼？因為巡捕們殘殺人命的餘興未了！因為這些被殘殺者都是半殖民地的中國公民！此其四。

肇事之後，當天的晚報在公共租界當局的授意或默許之下，刊登消息，盡歪曲嘲笑的能事，稱吳夫人之坐車為「怪汽車」衛士僅一人而稱為「保鏢等」，出示手鎗照會而稱為「拒絕檢查」，是西捕先開鎗，而稱為「該保鏢等開鎗拒捕」。凡此種種，我們不能不認為公共租界當局於草菅人命之後，尙欲繼續製造更嚴重之後果！此其五。

然而我們有我們的辦法。現在我們在這裏提出：

- ①公共租界當局向被難者道歉。
 - ②將所有參預此不幸事件之巡捕解交警政部分別首從依法懲處。
 - ③賠償並撫卹此不幸事件之被犧牲者。
 - ④保證以後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 ⑤取締所有惡意玩弄此不幸事件之新聞紙。
- 我們要求公共租界當局作迅速切實而滿意的答覆。公共租界當局如果以為有鎗即可以為暴為亂，草

營人命，則我們的館將用於止暴弭亂，保障人命！公共租界當局如果不能執行我們提出的要求，則我們將以我們的力量執行之！現在我們是等候答覆。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四日

本多大使之言

日本駐華大使本多返國述職，於十三日在京都招待記者團發表談話，其言至為懇切，且具有遠大而堅實之政治見解，我們很是感佩。

本多大使說明「日本承認國民政府，決非一時之謀略，進言之，倘一方面承認國府，同時又有與此背道而馳之言行，結果必毫無所獲」。這一說法，真足以澄清中日雙方對於和平運動之觀念。尤其在日本方面，頗有若干人士就和平運動之現狀立論，以為仍須準備在中國作五年以上之戰爭，又說和平政權之意義在於它是過渡的政權。這種說法乃是由於對中日事變之認識不足，並且由於對日本自身處境之認識不足，他們是被現狀壓倒而缺乏改造現狀的勇氣。本多大使之言，證明其對汪先生之以局部和平斬致全面和平之路線具有深刻瞭解，知道中日問題決非任何權謀所能解決，日本非尊重中國，無以成立諒解之前提。而非強化國民政府則無以體現其對中國之尊重。日本輕華侮華之觀念，已因戰爭的教訓而糾正，但至今仍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即不能把握中國之本體何在。日本方面頗有人以為蔣介石是不可輕侮的，

卻不知道不可輕侮的不是蔣介石而是中國，又頗有人知道了中國是不可輕侮的，卻不知道尊重國民政府即所以尊重中國。這種觀念之混亂，可以日本對和平運動之認識落於貧乏，而其結果則如本多大使所言，於日本爲「毫無所獲」。本多以其大使的地位指出這一點，的確是很有價值的。

和平運動之現狀一般人往往歸咎於戰爭行爲之繼續存在。本多大使對此亦有極警闢之糾正言論，指出雖在戰爭行爲尙繼續存在之今日，「將治安工作交與華方」，並「盡量緩和統制」，仍應列入當前的工作課題。這一點真是十分重要。因爲和平運動本來應當是做出許多工作以促成全面停戰，以促成撤兵，不是要等停戰撤兵之後纔來工作。日本方面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即無以表現其和平誠意，中國方面如果不認識這一點，即爲自甘於做傀儡。本多大使之言積極而有條理，具體指出和平運動走向其終極目標之行程，較之有等人之只知玩弄辭令，談親善，談合作，談共存共榮，談東亞新秩序而一無內容，徒滋聽者之疑惑與反感者，要光明正大得多。本多大使之言，使我們聽了感到親切。

本多大使提到清鄉工作，提到中央儲備銀行，提到經濟統制。關於這三者，我們曾幾次表示過意見，這裏需要約略說一說的是：關於清鄉工作由中國軍警與日軍合作進行一節，其指揮權力應屬於中國方面，而且日軍與中國軍警不能混合編練。若干地方可以參照歐戰時聯軍之相互關係，而大體上則應參照太平天國之役戈登與白禮文受李鴻章節制之故事。可以有日籍參謀團，但其權限不能超過已往在軍事委員會服務之德義參謀團。關於治安恢復後將治安工作交與華方一層，不僅日軍與其附屬機關須從該區域撤退，而且須從毗連該區域之地帶撤退。凡是清鄉工作所到的地方，全部撤廢現行之物資搬出入許可制度，而由國民政府依照中國自身之需要並顧及日軍之便利，另定經濟統制辦法，由中國政府自己來

執行。關於中央儲備銀行，日軍用票現時雖未能取消，但須改善與新法幣之關係。此改善之關鍵，不外於日軍用票本身，而在於中儲銀行之逐步接收物資輸出入的任務，華興銀行之機能須重新規定，華中振興公司之機能亦須重新規定。

環誦本多大使之言，我們深信日本方面必能竭誠協助我們貫徹上述之要求，全面和平循此可以早日實現。本多大使且鄭重勸告其國人：「決不容有任何日人藉中日合辦之美名，謀不正當利益之行為，現地軍官民應知一舉手一投足，均足以影響民心，」此尤為本多大使就其在華考察所得，覺中日親善之障礙，責任是雙方的，本此認識而發之至言。

我們對本多大使的談話表示好意，我們認為本多大使的談話與我們奮鬥的路線一致。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六日

問題的提出與解答

和平運動有許多現實問題急迫要求解決，例如：怎樣可以強化中央政府的地位？怎樣可以澄清地方的吏治？怎樣可以做到農民還鄉？怎樣可以做到游資內移？怎樣可以使得政府的政令乃至於一個普通老百姓的通行不再受到日軍的制約？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演繹成無數條，不過可以歸納做建立中心勢力，確保地方秩序，與實現局部撤兵這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就現階段來說是只有通過清鄉工

作。反之，也只有認定這三個問題的解決爲其任務，清鄉工作纔能有它的廣大的內容與一貫的行動體系，而不單是剿剿土匪而已。

建立中心勢力，是要做到黨政軍一元化，必須把所有的黨派融解於國民黨之內，所有的政治機關消除官僚主義而活潑的工作，所有的武力在全國惟一的領袖的指導之下正確的動作。必須這樣子把中華民族求生存獨立的意旨與行動打鍊成一個堅強的核心，一個整然的體系。這裏的手段就是清鄉。清鄉委員會的組織與行動，就是黨政軍一元化的體現。在清鄉工作的範圍內，除了國民黨沒有別的黨，除了三民主義沒有別的主義，除了汪先生沒有別的領袖。在清鄉工作的範圍內，凡有關於政治，外交，經濟，文化，以及軍事的問題，都由清鄉委員會直接解決，可以知照有關係的機關，協同辦理，但必解脫一切機關主義的隔閡與延擱。清鄉工作並且以行動給予所有武裝力量以新的訓練與編配，使其步伐齊一，紀律嚴明，而以此完成建軍之使命。

確保地方秩序，是要做到地方上沒有游擊隊，土匪，也沒有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而且要做到地方上只有中國自己的統治，沒有日本勢力的干預。清鄉工作所到之處，凡是物資流通的障礙與人口移動的障礙，一概予以廢止。糧食得以自由流通，資本得以自由流通，而保甲制度與農村合作制度，可以實施。

治安確立，是實現局部撤兵的前提。我們只要把江南區的游擊隊肅清，我們即可以收回京滬鐵路，只要把江北區的游擊隊肅清，我們即可以收回津浦路之南段，只要把皖贛鄂一帶的游擊隊肅清，我們即可以開放長江航路。而日軍則除若干重要聯絡給養的兵站以外，均須一律撤退。這不是理想，而是實質。

在在可以做到的。因為這裏除了我們自己能確立治安之外，尚有國際形勢作為前提，德法關係是一個例子。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日軍在佔領區之措施，大抵倣效德國。但德國之措施，固因時因地而不同，對付波蘭荷蘭等是一套，對付法國又是一套，而對付法國，現在又和前一時期不同。現在德國準備交還巴黎，放棄大部份既成事實，而以法國協力建設歐洲新秩序為條件。現在日本所處國際地位與德國有其類似之處，尋求與國之誠意乃基於實際之需要，而中國之於日本，則又和法國之於德國，在程度上是接近的。我們可以徵信現在日本要求全面和平之迫切，與迅即實施局部撤兵之誠意，並不下於我們。最近本多大使返國述職，在京都發表極有價值之談話後，且與外相陸相作重大之商議，我們證以遠東形勢之動態與日本所處地位，認為中日關係最近將有一新的變動，即日本將以更寬大之態度對待中國，因為除此以外日本實無其他方法可以解決中日事變。與此種時機相應，我們的努力即為清鄉工作。汪先生的說話：「我們幹，就有自由，不幹，就沒有自由。」和運同志與國人均應聽取。現在我們的幹法就是積極展開清鄉工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九日

關美國調停中日戰爭說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之說，是不能成爲事實的。

這傳說是怎樣來的呢？東京與華盛頓同樣的事出有因，眞理報之所載，在華盛頓比較在東京還更引起注意。其實也極簡單明瞭。我們只消把這條新聞與前幾天羅斯福總統譴責法國的新聞合起來看，就可以懂得美國何以忽作此想；再把這條新聞與本多大使返國述職期間日本重新考慮對華政策的新聞合起來看，又可以懂得日本何以忽作此想。

德法談判這幾天正在急轉直下，海軍問題雖然沒有發表，但德軍已得假道敘利亞之許可是事實，英法空軍在敘利亞已發生戰鬪行爲是事實，美國口岸若干艘法國運糧船已被扣留，也是事實。而法國建議由美國調停歐戰，尤可見法國已感覺局勢現狀之發展將使法國不能避免再參戰的命運。美國的對策如何呢？她倒不是怕的法國將在近東戰場上戰強德國的力量，却是在打算怎樣可以更安全的奪取法國的海外殖民地。華盛頓的紳士已公然說出要奪取達卡。自然還要奪取法國在中太平洋的羣島，以及印度南端與紅海岸的法屬地，即使不觸及越南。奪取達卡與西印度羣島不關日本的事，但奪取太平洋上的法屬地，日本是要干預的。

美國是在促成法國參戰，以造成奪取其屬地的理由。美國要接收英國的海軍根據地，也要接收法國

的海軍根據地；接收前者是通過合作，接收後者是乾脆攘奪。只是美國要穩住日本，以方便其攘奪。這種機會是新近纔發現的，所以這一次美國調停中日戰爭，也是基於一種新的打算。美國現在並不看重歐洲大陸，而看重大西洋，自然她也可以放棄對於亞洲大陸的執着，如果她能得到太平洋。民主黨議員湯姆斯的對於調停中日戰爭的意見是一種傳統的舊的意見，其實，美國對中國問題上的讓步將完全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讓步為標準，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以中國的獨立為其太平洋均勢的支點之一的觀念，已因第二次世界戰爭形勢的最近發展而有重大的改變了。只要條件相當，美國現在未嘗不可出賣中國。這樁買賣能否成功，關鍵在於日本。日本歡迎美國調停，可是不願意放棄海洋。日本可以停止軍事的南進為交換條件，但這不是說日本可以容許美國在太平洋上為所欲為。在調停還沒有開始，美國還沒有表示其對於太平洋的見解之前，光是說調停中日戰爭，日本自然願意試一試。隨着本多大使的返國述職，在日本國內正引起對華政策的新的批判，在醞釀一種新的變動。一部份人以為非強化國民政府不能得到全面和平；而另一部份人則又從灰燼中檢出熄滅已久的希望，以為倘若對蔣能够作成和議，便可以一了百了。這種混亂而矛盾的觀念雜然並呈，發生在醞釀對華政策的大變動之際，本來是不足為怪的。所以這時候日本對於在蘇聯與美國刊載的調停傳說，也不是沒有興趣。只是這種興趣，在一與美國接談之後，甚或還沒有和美國接談，明白了美國之以中國交換太平洋的心事，就會突然幻滅的。因為從形勢的各方面看來，日本沒有可能依照美國的願望，放棄對德義的同盟不算，還要放棄太平洋，而以此換得美國的幫助，而這種幫助又不過是停止中日戰爭，仍然不能解決戰爭停止後的中國問題。

日本的願望，為從美國獲得借款開發中國，而在太平洋與美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之意義，則為以西

太平洋爲日本的勢力範圍，而以東太平洋爲美國的勢力範圍。這不是美國所能答應。美國所能答應者僅爲幫助日本作成全面停戰，乃至於全面議和，而停戰議和之後的問題則由日本自己去負責處理，談不上借款。在太平洋上，美國之要求則爲日本在現在的界線停止，而且以此爲美國幫助日本作成全面停戰與和議的交換條件。這在日本看來是不合算。所以這樁買賣是做不成功。

我們的見解是，日本終將覺悟除了強化國民政府，由國民政府自己來統一並安定中國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至於太平洋的問題，現在還無從發現有以外交手段解決的可能。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念一日

建軍的途徑

我們當前最艱鉅的工作是建軍與造產，這是困難也得幹，因爲非此無以建國。我們相信和平可以救國，就得相信建軍與造產一定幹得通。

這裏且專說建軍。建軍工作繫於日本之誠意協助，更繫於中國的決心與知道如何努力。

中國建軍，日本照理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以前固曾有過冀東保安隊殘殺日本人的不幸事件，其後渝陷區的某種軍隊也有攜械逃走，加入抗戰，散而爲游擊隊的這一類使日方引爲遺憾的事件。不過日方也明白知道，這是因爲那時候中日兩國還沒有講和。現在日本根據近衛聲明對付中國，國民政府亦已解脫對英美與蘇俄之依賴，中國因日本的幫助而增強力量，這力量不會用以抗日，其保證即在於日本之

尊重中國，與中國所處之內外形勢。

中國建軍，在物質上，在技術上，都需要日本的幫助。物質方面，可以有兩個辦法，其一・把原來是中國的東西，戰敗而落入日本手中的，如同兵艦，軍械，飛機場，及兵工廠等等，無條件的交還中國。事實上，日本已自動的交還我們好幾隻兵艦，這是我們很感謝的。我們希望日方貫澈此種誠意，繼續把從中國得到的武器與武器設備全部交還我們，不說別的，光是步槍一項即可以配起五十萬人。這於日本損失不多，因為這些東西運去日本，大都是鋒化作鋼鐵原料而已。其二，日本拿她的武器賣給我們，並且幫助我們建設兵工廠，而以借款的方式來辦理。

技術方面，我們歡迎日本軍事專家做我們的顧問，如同我們過去歡迎德義軍事顧問一樣。但其性質，是出於中日兩國的友誼，而不是出於何種約束，中國的軍權不因此而有絲毫損傷，是第一義。

有了日本的幫助，我們更要自己有決心，並且知道如何努力。記者的意見有下列幾點：

①軍隊的編制要實事求是。現在我們有好幾個方面軍，有許多師，應當按照其實際之人數與武器配備，加以改編，甚至不惜名義上的縮小，而求實質上的擴充。現在中國的情形是和上次戰敗的德國不同。當時是德國為要避免協約國的疑忌，所以把正規軍縮得很小，現在日本對於中國並沒有這種疑忌，並且幫助我們多成立軍隊，這是日本的誠意，可是我們總不要把建軍當作面子上的事情，應當注意軍隊的質要配得上軍隊的量。

②有些軍隊是在國府改組還都以前，並且是在中日和平方案以前成立的，當時因為中日關係還沒有確定，所以這些軍隊和日方的關係有許多地方不是正常，需要改正而至今還沒有改正的，我們切不可認為

既成事實或予以歧視，應當由軍委會統籌辦理，務使凡屬於國民政府的軍隊，對日關係統一而純正，根據中日和平的約束，中國軍隊除對外與日本一致外，不應有任何足以損害中國軍權自主之措施，如果我們不和日本交涉，那是我們自己缺乏和平誠意。

(三) 應當着重成立模範警察與編練民團。這是爲了適應當前的任務與環境。當前的任務是確立地方治安，在這上頭，模範警察與民團是具有與正規軍同等的效用。當前的環境是武器與軍事人材的缺乏，成立模範警察與編練民團較之建設正規軍，無論在武器的配備上，人材的培養上，都輕而易舉。民團過去在江西廣西曾行之有效，現在我們着手清鄉工作，對此尤應有大規模的設計與實施。

(四) 糾正過去對海軍的觀念。過去中國是與日本爲敵，建設海軍的對象是日本，小的等於完全沒有用，大的又化不起本錢，所以有人竟主張除鉅私輪外完全廢止海軍。現在的情形不同。從現在起，中日已化敵爲友，我們建設海軍，小有小的用處，大有大的用處，而且未來的大海軍也非現在就從小處做起不可，有如前人所說，「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苟爲不蓄，則終身不得。」

建軍工作須分別緩急，考覈虛實，就其全行程來說，應爲鞭其後者而進之，而就每一個階段來說，則應爲重點主義的。現在籌備進行的清鄉工作，也就是建軍的中心工作，因爲清鄉委員會將要動員所有的各種武裝隊伍，不論是陸軍，是空軍，是海軍，是警察，是特工，都在一個整然的體系之下動作，而在這種動作當中，可以攷覈每一個部門的虛實，並分別緩急，加以改正與增強，而且，也只有隨着清鄉工作之進展，纔能恰當的把握民團的意義，並發現編練民團的實際方式與程序。

中日和平的正軌

昨天本報譯載日本泰晤士報的評論「日本對華政策」，是一篇極有價值的文章。這篇文章，像風雨表一般準確的反映了日本最近的政情。在此以前，我們早經指出日本國內正從事於對華政策的再檢討，本多大使在京都的演說正面的證明了這一點，美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傳說又反面的證明了這一點。其他如同本多大使與松岡外相，東條陸相，及川海相，近衛首相的商談，即就其不完全的消息來看，也可以想像日本國內關於對華政策的多種不同的見解，正在互相交換，並且漸趨接近，漸趨一致，而泰晤士報的論文則正是這種一致的反映。所以最近這幾個禮拜，實在可以說是近衛聲明發表以來的一個重要關頭。

和平運動開始到現在，日本對華政策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近衛聲明發表到去年五月和平運動開始到現在，日本對華政策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近衛聲明發表到去年五月，在這期間，只有原則，而具體的政策却還沒有確定，雖然已經有了和平方案，並且國民政府也已經改組還都。第二個階段是從去年六月起到這次本多大使返國述職止，在這期間，日本的措施，諸如華北對中國其他部份的貿易限制，以及華中的物資流通限制，很使中國人感覺不安。日本的加入德義同盟，更幾乎淹沒了中日和約的簽訂的比重。這大概是因為日本受了德國在歐洲佔領區的措施的感應的緣故。第三個階段是從這次本多大使返國述職開始。日本明白已往的和平原則是對，已往的政策却有許多地方不對，並且在尋求新的純正的政策了。這一則因為從去年六月以來日本在華的措施的結算促起了日本朝野

的深刻反省；二則因爲日蘇簽訂中立協定以來軸心國對世界的抱負與美國的反響，加以最近法國行將參加軸心這一形勢所可能在太平洋上引起的嚴重後果，即美國將不惜因搶劫法國在這方面的屬地而與日本發生衝突的當前危機，又使日本不得不重新考慮中日戰爭長期拖延的重量；三則因爲德國最近對待法國變得很寬大，德國的這種把對法政策與其世界政策配合的聰明舉動，引起了日本的興趣，並且給予日本以極好的參考，日本非去盡權謀，不能有真正的和平，即不能結束中日戰爭，從泰晤士報的論文，可以看出日本朝野的此種新的認識與決心。我們於此，表示甚深之欽佩與欣慰。

泰晤士報開頭就指出「中國市場之穩定，祇有在中國由一極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統制時方可實現。」過去持此見解的幣原，雖與見解完全相反的田中同歸失敗，但日本朝野今已明白幣原的見解沒有錯，所以失敗，只是因爲當時中國是在英國勢力的支配之下。經過這場中日戰爭，改組還都的國民政府已與英國的傳統關係切斷，沒有辦法再恢復。如果過去英國幫助中國中央政府強化是聰明的做法，則今後日本的聰明做法也只有是幫助中國中央政府強化。我們當然感激此種幫助，只是要指出像過去英國那樣以幫助爲支配的手段，在今日的環境將不能成功。中日兩國，說做朋友，就該老老實實的做朋友。

固然，今日以前，日本也說支持國民政府，可是，有如泰晤士報所說：「有疑問的一點是，日本的支持是否常按正確的方向實行。」其中的緣故，是因爲日本方面還有許多駭雜的觀念，該報於此特別指出「有一小部份人認爲應保持廣大面積上的和平與秩序，以使日本工商業達到必需的環境」，亦即在佔領區人爲的延長戰時狀態，在軍管理之下嚴厲統制中國經濟，而以此樹立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支配權。今年二月，日本議會亦字預算委員會中有人主張在華建築普遍而永久的兵營，亦即由於此種觀念而來。然

而此種觀念，該報認為「即就工業自身而言，亦成問題，因以軍隊駐屯來維持和平環境，須有極大的費用。」不但須有極大的費用，在商業的算盤上都不值得，而且此種人為的延長中日事變現狀的做法，乃是和日本當前的國際處境極不調和的。

該報於是主張日本目前就應當開始局部撤兵，以擴大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因為，即使在全面和平尚未實現的今日，還是「很顯然的，在事變未減至某種程度之前，適於秩序生活的環境是難以出現的。此種消極戰略自將不遲疑的要求日本在華軍隊之配佈採取急劇的改變。」這種改變就是局部撤兵。這於日本也有好處，因為「縮短戰線，可使戰鬪減少。」而就日本所希望的強化國民政府來說，則更顯然的是，國民政府與日本軍的兩重統治權力並存的現狀，必須徹底改造，因為國民政府必須能够毫無遺憾的統治和平區，纔能進一步統治全中國，這裏於關鍵就在日本援助國民政府，而不干涉國民政府。

該報之警語為：「如無合作的中國人民，則合作的中國是不可能得到的。而除非有充份的良好理由，中國人民的合作也不能出現，強制手段，絕對無用。」日本朝野有此認識，實為中日兩國前途之福。因為如今我們正須承認一個事實，即中國人民在和平區被日本人打了一記耳光，比較在火線上被日本人用槍炮轟死，更是損傷中日間的感情。而中國人民的產業在和平區依然不能收回，比較在火線上，被日本人的炮火毀壞，也更是損傷中日間的感情。因為人之心理，總是朋友的欺侮比較敵人的打擊還更難受。所以我們要極沉痛的告訴日本人，應當注意，不要讓戰爭還沒有破壞乾淨的中日人民的感情，倒因為和平得不像樣而被破壞得乾淨淨了。誠如泰晤士報之所言，我們實不勝對中日兩國和好前途之聲祝。

泰晤士報於其結論中說：「日本對華政策已達到一新的階段，」又說：「這目標已達到前所未有的

清晰程度。」我們欽佩日本朝野的此種新的認識與決心，我們願與日本根據她的這種新的認識與決心而來的解決事變的新方針，攜手合作；因為所要解決的是中日事變，而非片面的中國事變，所以責任是雙方的，努力也是雙方的。

鞭其後者而進之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五日

我們要有改造現狀的勇氣，便首先要勇敢於正視現狀的勇氣。論理，受着這樣長期的事變的慘酷教訓，中日雙方總應當懂得以嚴肅的態度來處理問題了，可是我們要自責，我們總在那裏迴避問題。

問題果然是迴避得了的嗎？和約雖已簽訂，現狀卻仍舊。有人可以這樣說：慷慨激昂的人們只是因為沒有鑽進實際工作，所以不知道其中的步驟與艱難。當然，民眾是沒有參預政治的實際工作，可是有他們的實際生活。他們確實不能諒解這種人所訴說的步驟與艱難。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不能把現狀的一切責任都諉之於全面和平的尙未到來。全面和平是局部和平的擴大，可是現在，即使是局部的，果真做到了雙方的和平相處嗎？

在這上頭，我們倒是佩服日本人，因為日本人比我們更認真。當我們還在辯護「步驟」的時候，日本人却已由反省而明白承認和平的步驟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在本報介紹過本多大使在京都的演說，並

且介紹過前幾天日本泰晤士報的評論「日本對華政策」，這裏我們再介紹馬淵逸雄的文章「東亞人的槍口應該向外」。他在這篇文章裏指出：中國目前雖然分成兩個，「抗日的中國」與「親日的中國」，但要注意的是「另外的一個巨大的事實，即中國社會的存在。」他說：要是忽略了這一點，「在A—C線上（抗日的中國）不用說了，在B—C全線上（包括親日的中國在內）兩國間的對立也會有全面地深刻化起來的可能。」他承認：「在日軍佔領區域以內的當地民衆，動輒有和日軍對立的傾向。」他解釋這原因並且警告道：日本將校們對於士兵的勸導，「結果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一般日本人之在中國，「徒然無益地埋頭於擄取並統制眼中所見到的財物。他們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使對這些財物和資源持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民衆，將來不會有和日本離心離德的可能嗎？」

馬淵逸雄做過很久的日本在華派遣軍報道部長，調陞回國，如今在軍的方面佔的地位比以前更重要。讀他的論文，我們只有慚愧。慚愧些什麼？第一件，日本倒還不那樣看輕中國，我們自己卻把中國看得已經沒有辦法了；第二件，日本倒還知道反省，我們卻只知道辯護？第三件，事變的現狀對於日本將只是失敗，對於中國卻將是滅亡，日本尙且不甘心失敗，所以在作改正、現狀的努力，而我們卻只在替現狀辯護，難道真的我們竟如此自暴自棄，至於甘心亡國嗎？

我們平常總是可恥地約制自己，以至於不敢正視現實，有歌頌而沒有檢討，說是恐怕友邦誤會，恐怕損害政府的威信，恐怕被渝方利用作反宣傳。這種心理必須徹底糾正，因為和平運動本來只是對國家負責任，日本人對日本帝國負責，中國人對中華民國負責，要這樣纔成立兩個合作的單位。我們不能避免誤會，只能消釋誤會。至於政府的威信，只有求之於和平運動的嚴正，而且我們也須知道，中國人民

在我們的宣傳與渝方的宣傳之外，還有他們自己的判斷，這判斷的根據便是他們的現實生活。

我們有什麼顧忌呢？做救亡的工作，是要愈素樸愈好。所謂「披髮櫻冠」而救之，這「披髮櫻冠」就是說不要裝做紳士。

不幸的是，中國現在只有輿情，而沒有輿論，因此我們也只好拿日本人的輿論做我們的鏡子。這裏便再引用另一位日本人的一段文字。這一段文字載在東洋經濟第一九三七號，一原有常寫的。他說：「到了南京，不知道南京在那裏。汪先生的住宅除了是一座文化的住宅之外，還有何物？而我們的總司令部則屹立如山！」一原有常的態度是荒謬，他不但不認識中國，而且也不認識日本。他所讚揚的現狀如今正成了日本朝野有識之士在重新檢討，並且要求改正的對象。只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我們和平運動者，要有改造現狀的勇氣，也得首先要勇敢於正視現狀的勇氣。

當此日本朝野正在反省，正在檢討對華政策之際，我們應當作同樣的努力，這種努力在現階段的口號是：局部實施和平條約！因為和平條約雖然簽訂，可是沒有動過，總說是因為全面和平尚未到來。然而我們認為，諸如局部撤兵，局部廢止物資流通限制等等，現在可以做的，就應當做。以局部和平斬致全面和平，這個路線是正確的。如果做不到全面和平，那是因為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局部而不和平。

同胞們！大家要奮起！抗戰已是死路了，和平卻要大家來擁護，並且大家來督促，纔能是一條活

路！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六日

中華民族的氣節

五卅慘案是給予列強的一個有力教訓。她們應當明白，對待中國，只能是做朋友，不然就做仇敵，可是總不能拿中國做奴隸。中國有過民國十五年前後的大規模的反英運動，後來又有將近四年的抗日戰爭，為什麼？因為中國人不願意做奴隸。

現在的事情是，日本人一定要認識中國人的這種不可屈伏不可磨滅的民族精神，纔可以結束中日事變。

事實上，日本朝野有識之士，也已漸漸普遍的明白這一點，重新在檢討對華政策了。他們說要強化國民政府，而且知道只有使國民政府的權力一元化，與擴大其統治區域，纔能成事。日本雜誌東亞五月號，載有「強化國民政府的第一條件」一文，有這樣的說話：「國民黨喪失其已往的生殺予奪之權，因為有比國民黨具有更大的生殺予奪之權的日本軍同時存在，」並且認為，這現狀如果不改變，國民政府是無法強化，中日事變亦無從結束。

這便是經歷過五卅慘案的鬥爭，經歷過反英運動與抗日戰爭的堂堂中華民族，使列強不敢忽視其身份的所在！

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清鄉；清鄉工作的成功，在於我們有正確的做法。我們是爲了中國而清

鄉，不是爲了日本來清中國的鄉。本來，地方上的人民是苦痛極了，然而他們至於齊願受游擊隊的荼毒，日本方面是應當深思其故的。所以我們做清鄉工作，一定要拿出事實，是爲了中國而清鄉，不是爲了日本來清中國的鄉。

這事實就是，清鄉工作所到，一地方的游擊隊被肅清之後，該地方就沒有日本軍，也沒有日本軍的附屬機關。該地方的人民便無須請求日本人發給通行證與物資流通許可證；凡是行政上的事情，以至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一概由中國人自己來管理，並且是秉承中國政府的意旨，爲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來管理。

這一層可有把握？我們敢說有把握。我們並不從日本替中國設想來攷察，而從日本人替日本自己設想來攷察，我們相信全面和平來到之前可以實現局部撤兵。日本要解除她自身的困難，不能不縮短戰線，這縮短戰線，便要求着局部撤兵。日本人替日本國打算，中國人替中國打算，在這裏發現了利害的共同點。所以我們敢說清鄉有把握做到局部撤兵。做到了局部撤兵，就可以做到局部和平；做到了局部和平，全面和平自然來到。

日本已認識中國的民族意識，並且承認了這種意識所表現於抗戰區以及表現於和平區的行動及其力量；我們和平運動者，對此尤其要有深刻的認識與自信。和平運動要怎樣纔有力量？要與中華民族的堂堂氣魄結成一體纔能發生力量。和平運動怎樣會沒有力量？如果與中華民族的堂堂氣魄分離便不會有力量。今天是五卅慘案紀念日，中日雙方從事和平運動者都應當三省，知道由抗戰到和平，並不是中華民族的氣質改變，卻是，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而抗戰，也爲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而和平的；其在日

本方面，則要把和平看做對華作戰的否定物，而不是對華戰爭之另一手段的繼續。

日本要認識這一點，中國的和平運動者尤其要認識這一點，和平纔能成功。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三十日

觀念的澄清

和平運動是否定抗戰的，但也有繼承抗戰的地方，這層道理很明白：如果沒有這一場抗戰，是不能有這一次的和平；又如果不是中國的領土至今還沒有被日本軍佔領完盡，也是不能有這一次的和平的。

抗戰是反侵略，和平也是反侵略。在這意義上來說，和平乃是抗戰的完成。所以贊電的說法是，「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為抗戰之目的已達。」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和平運動初起的時候，有人說我們是在和重慶做雙簧。日本方面，也有人說我們是寓抗戰於和平之中。做雙簧，是政客的一種小聰明，我們不屑如此。說是寓抗戰於和平之中，則是因為不瞭解和平原來是有繼承抗戰的地方。

抗戰的一面，是中國的仇日排日，和平運動要否定的是這個。但抗戰的另一面，即中國之不甘心於日本的侵華侮華，這個，卻是和平運動所繼承的。汪先生在其「告產業界諸君」一文中說得明明白白，「近衛聲明總可以說是放棄侵略主義，我們就開始和平運動。」我們做和平運動，是以日本放棄侵

略主義爲前提，並不是贖罪，並不是僅僅因爲戰敗，更不是幫助日本完成戰果。要這樣，纔能把握和平的本質，纔能把握和平的爭持分寸。

爲什麼不是贖罪呢？因爲中日戰爭，責任是雙方的，悔禍是雙方的。爲什麼不是僅僅因爲戰敗呢？因爲一個有氣節的民族之所惡有甚於戰敗者，何況這戰敗的事實乃是兩皆困難，如致國防最高會議書所說，「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爲什麼不是幫助日本完成戰果呢？因爲我們是要解決中日事變，日本是要結束「中國事變」，兩者的做法有其共通之點，兩者的立場卻是不同的。他們是爲日本，我們是爲中國。

有人把所有的屈辱看作抗戰的道德上的刑罰，把所有的困難諉之於戰敗。誰叫你抗戰呢？又誰叫你戰敗呢？這樣的自怨自嘆。這種人總不知道，經過這樣一場抗戰後的和平，本來不該是屈辱的，如果屈辱，那是因爲和平運動者不够嚴正。抗戰失敗帶來的和平當然要吃虧，但吃虧的程度如果超過戰敗的程度，則是和平運動者要負責任的。

又有人痛恨重慶，至於惟恐蔣也議和，至於以爲日軍佔領區的擴大就是和平區的擴大。這種人是不了解 汪先生的意思：我們不再徒然期待蔣之覺悟，但決不阻礙其覺悟。至於失地愈廣，和平運動只有愈艱難，凡是讀過「哀南粵」這篇文章的人，都應當記起自己是中國人的。

和平運動同志應當明白，對待日本，我們先要問問自己是和人家做朋友的材料，還是做奴隸的材料。我們不應當以日本人可以允許的東西來做我們爭持的限度，而是要以中國生存獨立的最低限度來做我們爭持的限度。對待國人，我們在歸咎於蔣的箝制力量之外，還須反省是否因爲和平運動尙未能以獨

立自由的事實使他們來歸。和平運動同志尤其要有堂堂的氣魄，因為我們並不是認罪伏輸了纔來幹和平運動，並不是傷心氣餒了纔來幹和平運動的。我們為什麼要把和平運動看作已經沒有辦法？為什麼應當可以有辦法的卻拿不出辦法來呢？和平運動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再出發，還都以後一年應當是贊電精神的再出發。同志們，大家要振作起來！

兩重權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九日

有人說，蔣那裏是自由的中國，我們這裏是不自由的中國，因此高喊：到自由的中國去！這種觀念，實在是很錯誤的，大家要明白，中國是不可分的，如果丟掉了這一大塊不自由的土地，一大羣不自由的人民，僅僅抓住西南內地，那裏還能成為一個中國？那裏還能有一個自由的中國？在我們這邊也是如此。如果把淪陷區和未淪陷區分了家，止於局部和平，則併局部和平而不可得。這是一點。

第二點，蔣那裏是自由的，我們這裏是不自由的，不錯，但要明白，蔣是在把還可以自由的地方繼續斷送，變成不自由，我們卻是在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要把不自由的地方變成自由的地方。也因此，我們的工作比蔣更艱難。然而我們的工作是對的。

汪先生說過：在淪陷區的民衆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

平沒有希望，同盟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大家便應以一致抗戰的同等精神來一致謀和平。（見廿八年八月九日廣播「怎樣實現和平？」）中國只有一個，倘然分成兩半個，是無論那一邊都不能有自由的。只有在淪陷區的與在前方後方的民衆結成一氣，集中於和平運動的奮鬥，纔能重新打造出一個整然的中國，一個自由的中國。否則，蔣說他那裏比我們這裏更有辦法，我們說我們這裏比蔣那裏更有辦法，都是言不由衷，而且糊塗得不明白中國在那裏。

蔣放棄責任，我們只有多負責任。和平運動者要有這樣的氣度，把蔣的責任看作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只有加倍的工作。我們在不自由當中爭取自由，首先要把和平運動的區域做成和平的區域。照邏輯來說，是只有全面和平，沒有局部和平的，但從運動的規律來說，以局部和平斬致全面和平乃是正確的路線，局部和平是拋磚引玉的做法，關鍵在於，雖然不過是磚，但總要够得上是一塊磚，而不是一些泡沫或者灰塵。要在局部的地方做成和平，當然是有限度的，不過我們的努力纔要能够達到這限度。當前的問題，焦點在於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這兩重權力的並存，我們要把一切努力集中於解決這一焦點。

本來，依照物理學，是不能於同一時間在同一空間安放同一體積的兩物的。因此有人想拿化學的學理來解答兩重權力的問題，說是通過合作，有如乳粉之溶解於水，鑽進水的分子的空隙中，如此可以並存。然而兩個國家的合作，不能是化學的，因為如果是混合，是溶解，那便消失了兩國本然，便不是什麼和平了。所以這解答還是只有求之於物理學。在物理學上，如果要在同一空間安放甲乙兩支鉛筆，只有把甲筆推開一點，讓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空間，給乙筆可以安放，然後再把甲筆推開一點，這樣繼續運動下去，到甲筆讓出全部空間，乙筆全部安放上去為止。而在這運動的過程中間，我們所看到的

現象卻是兩物並存於同一空間。現在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這兩重權力的並存現象，拿上述運動的規律來解釋。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過渡的意義，並且知道我們應當如何努力。

只有解決兩重權力的問題，纔能統一和平運動區域，纔能在局部的範圍內做到够得上某種標準的和平，要這樣，纔能統一全中國，再以和平的全面來完成和平的嚴正。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一日

怎樣努力？

現在大家都希望和平成功，但前途究竟怎樣呢？單說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這是宗教徒的虔誠，我們還是先要知道怎樣努力纔行。

我們要祛除同志與國人的懷疑與悲觀心理，但我們不可以這樣說：不准懷疑，不准悲觀。我們却是要用和平的動律來創造事實，使他們用不着懷疑，用不着悲觀。

人們的懷疑與悲觀，主要的是因為他們被國內三分之局的過渡現象所屈服。我們的一邊，重慶的一邊，中共的一邊，各不相下，各走各的路，將來會變成什麼呢？這樣一想，許多人困惑了，迷失了。本來也是，如果我們不能創造力量，不能拿出和平的事實使國人來歸，這三分之局是會繼續下去，誰都不能統一誰的。再到後來，或者是那一方靠了外力居然壓倒其他兩方，那也只有更壞，因為其時中國雖然

統一，然而已非中國人的國家了。

何況投靠外力也不是那麼容易。日本與英美在遠東的力量對比，如今還沒有確定，蘇俄的地位也還沒有確定，將來他們之間經過一場戰爭，又會變成什麼樣子，更是難說；所以無論投靠那一邊，用以對內，在目前是都不能取得壓倒的優勢，在將來則只能算是一場賭博；所以投靠外力，不僅是墮落，而且是無知。在我們和平運動者，尤其不可以和重慶或中共比賽投靠外力，要有這樣的自信纔是。

我們與日本合作，但不投靠日本，這是要拿我們有我們的自主的努力來解釋，這努力就是：

(一) 統一和平運動區域。和平運動區域各地方的現狀，我們要根據中日兩國基本關係條約並按照當前事態之所許而加以調整。例如華北，根據條約，日方可有某種特別便利，但此種特別便利僅限於某種特定的物資，某種特定的地點，而且是限於共同防共的一定目的與一定期間。可是華北的現狀還是繼承條約簽訂以前的，並且在條約簽訂之後還是照原來的方向發展。這毋庸是我們自己放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下過努力根據條約做調整的工作。其他如武漢與廣東，則在條約上原無特種規定，只因為那地方是日本軍的前線，特別受到戰爭狀態的影響。雖然如此，這樣仍然應當有分寸，按照當前事態之所許而加以調整，這種工作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動手做，是應當責備自己的。

(二) 自行統制經濟。關於和約附屬議定書了解事項第四條，「中華民國政府有統制對外貿易之必要時，當自行統制之，但不得與條約第六條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相抵觸。又在事變繼續期間中，上述統制，應與日方協議之。」這樣，由中國自行統制經濟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其中所說不得抵觸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根據第六條之規定，亦只是「考慮中華民國之需要，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的予日本國及日本

臣民以充分之便利」，中國自身之需要爲主，而於不妨礙中國自身之需要的前提下予日方以便利，不過如此。至於說應予日方協議，則根據附屬議定書第一條之規定：「前項特殊事態，縱在戰爭行爲繼續中，於不妨礙完成戰爭行爲目的範圍內，務須按情勢之推移，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調整之。」這樣，更可以知道要考慮的不過是統制的方式問題，而不是統制的主權問題。有了這樣明確的條約，爲什麼我們至今不做一點事，一任物資搬運許可證這一類現象繼續存在？這也只能怪我們自己不要好。

以上不過是舉的例子，此外應切實做的事還多。俗語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們沒有動手，拿什麼理由就說是行不通？拿什麼理由就來懷疑，來悲觀？大家應當一齊動手，馬上動手，把要做的事做起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三日

東亞的關鍵

汪主席此次東渡，以中國元首資格會見日本天皇，以行政院資格與日本大臣會談，以和平運動領袖資格與日本各方面有識人士交換見解，其意義至爲重大。

汪主席此次東渡，又在日本駐華大使本多返國述職期間。本多大使在京都之演說，中國方面引爲嘉慰，本多大使在東京與首相及各部大臣會商，東京報紙有良好反響，尤見日本朝野履行和約之決心，

汪主席此行，必能有明晰之考察，並以誠摯之商洽，得切實之結果，可不待言。

若干人屈服於現狀，認為中日事變結局將是不了了之，日本人中而有此想法，是為無識，中國人中而有此想法，是為失敗主義。中日兩國朝野人士，有收拾時局創造時局之見識與魄力者，必能瞭解環境之雅移規律，並把握當前之工作程序，為局部撤兵以強化中國政府之統治力量，為改造經濟統制現狀以復興中國經濟，為交通地方治安責權以安定中國人民之居住生息。

於此，我們希望日本朝野有一致之認識，認識中國之力量何在，以及如何配合中日兩國之力量。

中國的力量現在僅表現於阻礙的作用，使日本結束中日事變之工作發生困難，但亦因此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力量的存在。而且，日本還瞭解中國除現實的力量外更有其潛勢的力量，即可能產生的力量。日本方面少數無識人士，不知如何使中國表現於阻礙的力量轉過來發生正面的作用，而倡為在中國普遍建設兵營之謬論，與中國比賽力量的消耗；對於中國可能發生之力量不知如何使之與日本的力量配合，而把日本的力量用之於壓折中國的力量的新生。中國方面，也有人喪失自信，覺得中國沒有力量與日本合作，因而沒有資格與日本平等議和。這兩種人都是大錯特錯的。

就日本的立場言，對華政策必與其世界政策配合，是第一義，德國提煉其佔領國之物資，用於對英戰爭，末始無一時之效，但美國援英政策之發展，成長期戰爭之局勢，事實之鞭撻，已在促使德國不得不重新檢討其佔領國之政策，而瞭然於統制之浪費的一面，即因集中的運用物資而妨害物資之集積的生產機能，被佔領國之涸竭終將引致德國之缺乏。德國目前雖然還沒有此種反省的事實，但終將有此反省。可以斷言。在日本，有人已指出日美如果作戰，結果會是十年以上之長期戰爭。為適應此局面，須

有物資的大量再生產。對德義之經濟溝通，對蘇俄之商務協定，對荷印之物資保有，曾被視為日本應付長期戰爭之保證，但事實已在逐漸顯示日本終將不得不承認中國物資之比重，並且終將不得不承認中國之國際政治地位的比重。這種比重不是現在的，乃是可能的。所謂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並不是一句漂亮話，而是中國確可有此能力。問題只在於，日本願否有此能力與之合作。如果願意，就應當真真實實尊重中國之自由獨立，要這樣，中國纔能恢復力量，創造力量。否則，中日兩國不相生而相尅，日本在中國之所得，將不能抵補其在國際戰爭上之所失，且因此而終亦不能保證其在華之所得，是則中國之不幸將並不比日本之不幸為甚。此中抉擇，權在日本，但這不是說日本比中國多有一張牌。

日本朝野果能有此認識，結束中日事變之困難當可迎刃而解，中國人士果能有此認識，民族之自信力可以堅定。我於 汪主席東渡之行，以此種認識與真誠，對兩國和平前途致其無認之期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

清鄉工作的支點

要清鄉工作成功，關鍵只在於日本的諒解。讓我們可以放手去幹，讓我們可以自己行使主權，讓我們可以對得起中國老百姓，這就是諒解，也就是援助。

消滅飄風野鹿似的游擊隊，本來不難，難是難在游擊隊所依存的飄風野鹿似的政治環境。中國是歷

史上流寇最多的國家，因而也早已發明對付流寇的有效辦法。自從僧格林沁親王剿撫，兵隨匪流，大吃其虧之後，乃有民團與碉堡政策之確立。循此政策，我們現在來清除游擊隊，當無問題。只是當前的政治環境，猶未能解除老百姓對日本人的疑懼，猶未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這在清鄉工作上，乃是比武力更需要考慮的問題。

如何使中日關係之現實不致損害老百姓的民族感情？如何使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這兩件事做起來是相關的。

游擊隊爲什麼這樣猖獗呢？重慶與赤匪並沒有了不得的神通；我們倒是要想想，是否因爲和平運動區域的現狀有「爲叢驅雀，爲淵驅魚」者在？

所以第一件事，在清鄉區域絕對不應有物資搬運限制這一類制度存在。不但是在農村，就是與此等農村毗連之城市與交通站，都應當取締這種障礙。如果江南內何航運與滬寧鐵路的現狀不改變，第一期清鄉區域內的農村經濟自由即爲虛語。此種事實有害於中國，亦無益於日本。日人今中次膺最近在改造雜誌發表一文，指出滿洲國及華北之農村貨幣膨脹，由於經濟統制之現狀爲搜括農村物資而又阻礙城市工業品與農村物資之對流，如此造成之農村貨幣膨脹現像，實爲農村經濟之再生產行程正由停滯而瀕於中國之危險信號。對於此種事實的教訓，中日有識人士正應三思。

第二件事，是清鄉區域絕對不應有日軍附屬機關之存在。游擊隊一經驅逐出境，日軍與我方正規軍即應他調，即在與游擊隊作戰期間，日軍之合作有其需要，而日軍之附屬機關則根本不必有。此種附屬機關可以按照其任務分爲兩類，一類是供應日軍本身之日常需要，一類是維持地方秩序；我們所指的，

特別是後者。在這上頭，只是誠意的問題，不是什麼事實的問題。有誠意，則交還主權正所以達到治安之確立，無誠意，則所謂俟治安確立後始能交還主權，治安確立之解釋乃莫衷一是。

以上兩件事做得好，游擊隊可以肅清，做得不好，游擊隊是打不光的。游擊隊之所以能與正規軍抗衡，是因為有人民與之結合，所以肅清游擊隊的最好對策，是使民與匪戰；民團就是民與匪戰的表現。要人民與游擊隊分離，只有使人民與國家結合，我們要拿出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纔能使中國人民捨彼就此，而獨立自由的中國則取證於對日關係之嚴正。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念八日。

向 前 邁 進

主席東訪日本，全程完畢，業於前日返京。

主席在日本時節，雖值德蘇戰爭爆發前後，日本朝野皆在極度不安與審密協議中，但日本朝野仍然依照預定程序，予主席以歡迎，並且主席與日本當局也分別的對中國問題，予以詳密檢討。主席與近衛首相之共同聲明，表示中日兩方對於建樹遠東新秩序的決心，表示日本政府援助國民政府，使國民政府日趨強化的信念與決意。周副院長與日當局商定之三萬萬元借款，更是日本決心援助國民政府的具體表現。

德蘇戰爭之爆發，使世界局勢有相當的轉變，無論戰爭之結局是德勝，蘇勝，還是長期僵持，國際局勢都使日本更應認清強化國民政府，是日本處理中日事變的惟一途徑。他不能有別的變動，環境與日本政府的國策與威信，都不許可他這樣。

在中國方面，也是一樣。我們已受了四年的戰爭慘禍，我們沒有理由再加入別人的戰爭。我們只有一方面強化我們的政府，一方面改善我們的民生。

主席會說過，去年是商訂條約年，今年是實行條約年，這是就對外而言。從對內方面來看，去年是組府還都年，今年是強化國府年，換句話說，也是國民政府在人民眼前表現其能為國為民謀利益的一年。

這工作是繁重的，但是我們深信 主席回京之後，這一切必然逐步見之實行。

據近日日方報紙所載，最近國府施政的四大項目，是：

一、華北與武漢地方對中央關係之改進。

二、華中各合辦事業之調整。

三、華中民生問題之改善。

四、清鄉工作之推進。

清鄉工作，現已在實施之中，各地熱烈的宣傳，指明人民對於清鄉之誠懇希望。在目前事變持續中，同時為建國起見，我們覺得清鄉工作應注意到自主性與澈底性兩者，本報社論前已論及，茲不贅言，對於民生問題之改善，則內容相當複雜，除與治安問題有關者外，大部是與物資統制問題有關的。

現在日軍所行物資統制，除供給人民需要外，目的有三：一為保障對日輸出與在華日工業之原料供

給以及外匯之取得，二爲支持軍費之價格與流通，三爲對重慶之封鎖。在這三種目的中，我們深信有不
少應予改革的地方，有按照中日條約交由中國當局自行統制的必要，這是表示國民政府有統治力給人民
看的最重要的措施。但在將物資統制移交中國管轄之時，我們覺得雖因與日軍合作，可是還應避免多聘
顧問的辦法，這是退兩步進一步的行動，人民對之仍然要發生懷疑的。

對於華中合辦事業，日本方面也承認有若干是急就章。在調整合辦事業時，不能不分彼此，一率承
認其存在之合法。我們應先根據中國之國策，歷史等等，予以原則的規定，何者應予取消，即逕予取消
，否則亦應縮短或規定其特許營業年限。此後，對於中國現物出資部份，即應聘定專家，公平的予以改
估，中日雙方資本比例，按條約規定，事業的經營，亦應多用中國人士，這方是平等的合作。至於軍管
理工廠，應一律迅速予以發還，是日軍也同意的，我們不應僅以若干小工廠之發還爲滿足。在原主不肯
出面接受工廠時，工商部應逕爲其代表，向日軍手中接還，然後招誘商股改組公司租賃經營，以免機器
之擱置，生產財之浪費。

至於華北與武漢問題，我們深信這不是形式的問題，問題只在政府的法令與指揮，是否可以實質的
達到這兩處地方。就中國而言，奉正朔式的統一，等於不統一。在日本方面，亦應確認中日條約雖承認
華北有特殊化的必要，但是華北的特殊化僅限於某幾問題，而且特殊化也不能各方面皆使華北成爲半獨
立國，華北武漢地方現狀之繼續存在，只有使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援助，強化國民政府的宣言，發生是否有
誠意的根本懷疑。

過去，我們習聞原則的聲述，而未見具體事實之長足表現。此次主席東遊，我們又聞及許多概括

的政策的聲明，不過，我們相信這一次日本方面的聲明，是有具體事實作後盾的。主席回京之後，許多具體強化國民政府的事實，必將逐步實現。可無疑義。因我們厭聞空洞無內容。無現實性的原則的聲明，故於主席回京後之具體事實之表現，多寄企望，略予論列。

最後我們希望中國人民，努力向強化國民政府之途勇敢邁進，大家不要忘記今年是和平事實表現的一年！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卅日

國民政府的國際承認問題

德蘇戰爭指出世界新舊秩序之爭正向斷然的決絕的途徑前進，所有交戰國，不是站在英美那一邊，就是站在軸心國這一邊，所有中立國，也正在急激的跌入這一邊或那一邊。德蘇戰爭是軸心國對英美戰爭的一個部份，如此，所以有人想像軸心對英美的戰爭將因反共十字軍而移轉，不過是幻覺而已。日本現正保持中立，但這不是說對軸心游離，證以過去日本對德英戰爭不介入，而同時進行三國軍事同盟之簽訂，可知行動的步驟與技術問題是一件事，而行動的方向則又是一件事。但中立的餘裕正隨外界的戰爭進行而日趨消失，在德蘇戰爭以前與德蘇戰爭以後，日本的處世需要更慎重，也正在走近作最後決定的邊沿。

軸心與英美的兩大對壘，正在因德蘇戰爭而擴大，而集合歸隊，而各自體認其共同之命運，所有中立國家亦不能不分擔此兩大對壘中之或之一命運。這不是由於什麼理念，而是戰爭的現實。德蘇戰爭已使英美瞭然於海洋與大陸隔離之戰爭現狀只是過渡時期的東西，而把德蘇戰爭與德英戰爭看作海陸戰爭的配合來應付。軸心國方面亦因德蘇戰爭而瞭然於建設歐洲新秩序與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為不可分。由於戰爭的此種現實，無論那一邊的集團，其盟國間的義務，約束，與責任，都在日趨於緊密，強化，與明確，且以此推而至於中立國。美國的凍結這一國的資金，解消那一國的資金凍結，與宣佈這裏是施行中立法地帶，那裏是非施行中立法地帶，斬釘截鐵，幹得真是恩怨分明，甚至對於那些別無野心僅求置身局外以冀苟全的諸小國，都絕不含糊。軸心國方面，在這次德蘇戰爭中，也幾乎是拿一種紀律的嚴峻，要求諸中立國以行動表現態度，不但義大利，連芬蘭，匈牙利這類國家都被淪入戰鬥的隊伍。此種趨勢，自不僅限於歐洲，即對東亞亦然。

中日戰爭與歐戰之隔離已因德蘇戰爭而溝通，中國分担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已須同時考慮與建設歐洲新秩序之關聯，而中日關係與軸心對英美關係之關聯亦已使英美與軸心雙方作更現實的考慮。其在英美方面，正企圖使中日戰爭與德蘇戰爭配合，如此可以使已趨枯寂之重慶稍稍活躍，如果美國一旦對日挑釁，發生戰爭行為，則更將把蘇俄與重慶的軍事行動打成一片，而以之為英美對軸心陸上戰爭之一整然的據點。其在軸心方面，則在設計以中日合作為日德義合作之強化關鍵，而把中日合作看得比芬蘭，匈牙利等國之與德國合作，要重要到無數倍，因為如果沒有中日合作，德義將不能取得日本的完滿合作。

如此，可以推斷軸心對中國將作某種事實的表示，此種表示，就其歷程來說，在目前最可能的將是

德義的承認國民政府，而且將不止是德義兩國而已。

我們和平運動者絕不期望世界戰爭，正相反，我們是努力於隔絕戰禍，如此可以使中日戰爭的結束不至於更複雜。但我們也絕不迴避現實；如果不能防止環境之複雜化，我們就只有講求對複雜環境的應付。凡以平等待我之國家，不論其屬於何方，我們均願與之為友。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國際承認問題，態度與抱負是如此。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我們的應付有一不變的原則，即與中國有利亦於他國有利者，我們必樂為之，於他國有利而於中國有害者，我們必不願為。國際對中國有其要求，中國對國際亦有其要求，我們的努力是應付環境的變化而不至於被環境的變化所淹沒，所沖盪以去。所以我們並不畏懼現實。世界戰爭正在要求擴大，是現實，而要求中日和平，及與平等待我之國家相安為友，得以休養生息，則是我們努力的主旨。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

清鄉工作正式開始

清鄉工作已於七月一日起正式開始，我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這件事的意義，日本方面，中國自己方面，一般工作人員，以及一般人民，都要明白這是中日合作誠意的體現，也是中國的自救之道。

對於日本人，我們要說的是，我們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來幹清鄉工作的，因而我們是什麼都求認真

，不許可有一點苟且，有一點含糊。日本說要強化國民政府，對中國的獨立自主抱有誠意，我們就認定這句說話，拿出最大的勇氣來幹清鄉工作，同時要求日本以事實與行動證實其信義。如果清鄉工作失敗，就是中日合作失敗。我們必去盡中國人的一般弱點，如講面子而不講實際，滿足於歸還主權的名義而隱忍損失主權的實際，凡此已往所不能盡免者，在清鄉工作上面必予以極嚴格的名實覈核。我們要把握的是實物，不是追逐影子，我們說過的話一定算數，日本方面說過的話也非一定算數不可。重慶方面，英美方面，侮蔑我們是做日本的工具，我們要拿事實打破他們的這種侮蔑，如果日本方面也有人以為是可以拿我們做工具，我們亦必以事實打破此等人的錯覺。中日兩國的國策既定，誠意既立，無論中國人方面，日本人方面，有破壞此國策，歪曲此誠意者，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人中的抗日分子，漢奸分子，日本人中的對華侵略主義者，都是清鄉工作的對象，要從中國的地面上清除出去的。

日本人當能瞭解，如果以我們這樣的誠意還受了欺騙，那麼，今後至少有二十年，將不會有一個真誠的中國人再來和日本人試做朋友。清鄉工作就是戰鬥，我們是中華民族的鬥士，我們只有勝利或者失敗，但決不含糊到底自己都莫明其妙究竟是勝利或是失敗。清鄉工作是綜合的行動，有軍事，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因和日本人的合作也極為複雜，所以我們非牢牢把定主意不可，日本人非深刻瞭解我們的民族誠意與決志不可。

現在我們缺的是親善，而是嚴正。日本多講求親善，中國多講求嚴正，這是和平運動成功的基礎，也是清鄉工作成功的前提。必須對日本嚴正，我們纔有理由要求一般人民與日本親善。必須對日本嚴正，我們對一般人民說話纔能理直氣壯。這是我們對日本人要說的話，也是我們對清鄉工作人員要說

的話。

我們對一般人民要說的話是，我們願意接受你們對於中日關係的監督，而以此要求你們擁護清鄉工作，支持清鄉工作。清鄉工作果然可以是中華民族的自救工作，也可以是侵略主義的工具，如果我們做得不好，成了侵略主義的工具，我們願受民族的最嚴厲懲罰，那就是清鄉工作之悲慘的失敗，和平運動之悲慘的失敗。我們卻是要儘好的去幹，要使清鄉工作成爲中華民族的自救工作，本於這種誠意，我們要求一般人民與我們共同應付環境，克服困難。清鄉工作是要大家來幹纔能幹得通的，如果我們幹得不好，對日本不够嚴正，對自己不够認真，不能整飭軍風紀，不能澄清吏治，一切玩忽從事，這是我們對不起一般人民；如果一般人民只是站在旁邊，坐視我們對日本爭持主權，坐視我們收拾戰敗局面的困難，坐視我們孤忠奮鬥而至於敗北，則是一般人民對不起國家。所以我們有我們的責任，一般人民有一般人民的責任。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農民還鄉運動。地方上的紳士與勞動者流亡在外邊的，要使他們回來。我們的工作，便是要造成農民可以還鄉的環境。我們所要求於國人的合作，則是清鄉區的人民斷絕與游擊隊的關係，與在清鄉區以外的資本與勞動力流返清鄉區。現在清鄉工作已經正式開始了，各人都要認定自己的崗位，互相勉厲，互相督責，一齊工作，向前邁進，成功是大家的，失敗也是大家的，有此決心，清鄉工作一定可以成功，和平運動一定可以成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

應有的風度

日前本報社論曾就德蘇戰爭推測德義等國且將承認國民政府，今則承認文告已見之於官報，我們對於此等國家之友誼舉措，表示甚深之欽感。國府還都之後，重慶已淪爲地方政權，而有等國家，因其私慾與短見，仍保持對重慶之關係，是爲要重慶而不要中國，這在我們，倒是不屑屑於此，因爲一國的中央政府，苟有其被承認之資格，則取得承認與否，僅爲友誼上的問題，而非利害上的問題，因爲兩國的關係因承認問題而起之得失，並不只是單方面的。以此，還都以來，我們只是把承認問題看作國府強化 的結果，而未嘗把承認問題看作強化國府的手段。我們的努力，固在彼不在此。國民政府是對中華民國負責的，其對國際之態度，與外國政府之關係，一切以此爲根據。我們對於英美，對於軸心國，爲恩爲怨，各有其分寸，甚至在某種場合，於爲怨者不能不有所隱忍，於爲恩者不能不處以冷靜，總之國家不比個人，不能因激於恩怨而忘身。就眼前來說，我們對於各國的恩怨是一回事，對於各國所參預的世界戰爭的是非曲直則是另一件事。我們願與平等待我之任何方面國家爲友，而努力於隔絕戰禍，乃是不變的宗旨。如此，我們於感謝德義等國承認國府之餘，我們表示，國民政府將因此而彌自勉勵，在國際上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而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中國必致力於其自身之安定，而以此答謝諸與國之好意。

此外，我們尙有爲國人告者，我們尋求與國之目的，爲對外和平相處，對內休養生息。兩年以前，

我們已揭露尋求與國，反對捲入所謂國際民主國家陣線，以他人之恩怨爲恩怨，但同時我們並不承認我們是以德義路線對抗有等人的英美路線，因爲講到路線，我們只可以說是我們有我們的中國路線。兩年以後的今天，德義等國已承認國府，與中國發生正常關係，成爲與國，可是我們仍然不以那一國的路線爲路線，因爲我們有我們的尊嚴的中華民國。

對於和平運動同志，我們要說的話是，大家千萬不要因爲國府得到德義等國的承認而自滿。卻是應當反省，究竟是因爲國府強化了而取得承認的呢，還是僅僅因爲德蘇戰爭的形勢的驅使而取得承認的？而且要明白德義等國承認國府，不過是恢復正常的國交而已，諸如恢復通商關係，現在因爲世界戰爭的緣故，還是有着許多困難。國民政府現在仍須自強圖存。能够自強圖存，則國際將不能再如今日以前之忽視中國自身地位，列強將不能只是爲了日本的緣故而拒絕承認我們，或者承認我們。主持外交與宣傳工作的同志，尤應明白還都以來一貫之對外政策，即尋求與國而非尋求敵國的政策，已因德義等國承認國府而證實其爲正確，可不是因爲有了德義等國的承認，就以爲有了與國，可以去尋求敵國了。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三日

戰爭的開端與結束

四年前的今天，是中日戰爭的開始；打了四年，現在應當是打出了辦法，來結束戰爭了。日本繼續轟炸重慶，只是多殺傷中國老百姓，結束戰爭的辦法自然不是這個。

我們已經有了中日和約，而且主席這次訪日，又商定了若干具體的辦法，事情是大有希望了。只是日本人當中，還有許多不明白道理的，中國人當中，還有許多不爭氣的，我們要加以鞭撻，使之知道和平運動是何等嚴肅的。

本多大使是中國人的朋友，他在京都的演說與在東京的奔走，做得不錯。照理，一年以來日本在中國定了許多行不通的辦法，諸如強化經濟統制之類，距離戰爭的結束愈走愈遠的，由於一年以來之現實的無情的教訓，應當可以省悟了，而主席訪日之行之所以獲得某種成就，亦不能不說是日本方面已漸漸有此省悟。但日本方面正還有不少人在努力從一條不通的路轉到另一條不通的路去，以錯誤來糾正錯誤。這種人近來在日本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批評日本現行對華政策的錯誤，說是日本應當學學英美的買辦政策。就是說，日本應當假手中國人來控制中國人，由控制中國社會轉到控制中國政治機構，強化國民政府而同時強化對國民政府的控制。這種人是根本不理解戰爭了四年的教訓，根本不理解中國現在還有抗戰的部份存在，也根本不理解買辦政策的行使環境非所以語於現在。中國人的想法很直截了當，

如果一樣的是買辦政策，為什麼又要捨棄英美來遷就日本？日本是說過拿中國當朋友看待，不拿中國做她的支配對像的。所以在那裏驕傲英美的買辦政策的日本人，是可恥的，而且也愚蠢，因為這些人不知道英美在中國必定買辦政策，是化了一百年左右的光陰，而且是在相當穩定的環境中纔慢慢做成功的。可是現在，日本的困難是在結束中日戰爭，如果這些人的錯誤意見居然被採納，做了出來，也只能是軍管理加上買辦政策，越來越混亂，越來越損傷兩國人民的感情而已。敗壞中日兩國大局的，就是這等人。

中國方面，應當檢討的是，和平運動者對抗日分子的鬥爭是够有勁了，可是對於媚日分子的鬥爭不足。親日不是抗日，更不是媚日。不打倒媚日分子，抗戰分子是打不倒的。我們現在不是說要強化國民政府，建立中心勢力嗎？政府的強化，只有以國家地位的強化為其背景，如果日本只是尊重國民政府，不見得就是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却是一定要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國民政府自然可以強化。說到建立中心勢力，並不是靠厲行獨裁政治可以做到，却是要靠和平運動的陣營下一番整飭的工夫，把抗日分子，媚日分子，統統清除出去。

我覺得現在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顧忌是在一天比一天多起來，而且有等人還有這樣的觀念，以為總是中國向日本要求這，要求那，而日本則成了施捨者，求人者常畏人，被求於人者常驕人，這種觀念發展下去，是會使和平運動破產的。其實和平是雙方的事，中國有求於日本，日本亦有求於中國，無所用其畏與驕，亦無所用其顧忌。經過四年的戰爭，雙方應當拿出素樸的態度來。中國是戰敗國，可是並未被征服，這個界限如果分不清楚，則四年的戰爭等於白打，沒有一點進步。想起七七紀念日，想起四年的戰爭所加於雙方的禍害，想起中日兩國在世界戰爭的環境中的來日大難，要趕快結束戰爭，就應當

尋求可以結束戰爭的辦法做去，不要向着相反的路子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

外交常識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重感情的民族，然而往往不知利害，對日抗戰是如此，即是現在從事和平運動的同志當中也有犯這種幼稚病的。舉例來說，過去我們反對所謂陣線，不相信這次的世界戰爭會是什麼主義的戰爭；然而罵倒了民主陣線之後，却又有人在那裏高喊國際反共十字軍，這豈不是自己也跌進了陣線論的窠臼嗎？我們果然反共，可是豎電規定得明明白白，「不因此影響對蘇邦交」，去年還都宣言也說「同時對於一切友邦亦本此和平外交之方針，以講信修睦」，此種國策，固至今未變。現在德義等國已與我們恢復邦交，承認手續之後，再加以努力，將來還可以有某種具體協定，如通商協定，中立協定，親善協定之類，以增進關係。但在目前，還剛剛做到了承認，就來說中國願意做反蘇的一員，與德義等國共同努力於世界新秩序之建設，這却未免走得過遠了。

這種地方，我們倒是應當學習日本。日本是對於德蘇戰爭至今處以鎮靜。御前會議之決定，據近衛首相之廣播，與松岡外相之說明爲：「日本不問局勢之如何演變，必遵循其自身之國策，而不願盲從他國行事。」外務省主持之外交評論雜誌，對此更作明白之界說，謂「日本願同時尊重日德義同盟條約及

日蘇中立條約，俾可集中注意力於東亞新秩序而阻止歐戰延及太平洋。」日本人的這種謀國之忠，及其對友敵態度的分寸，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說我們應當學習日本，就在這些地方，不幸現在有些人是只知道聽從日本，而不知道學習日本。

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當中有些人的根性不佳，而又昧於外交常識。現在我們與日本是做了友邦，與德義等國也做了友邦；而對於日本，我們尚有軍事外交一致的說話。但這都不是說，我們躍躍欲試，要去參加世界戰爭了。現在正有許多例子供我們參考，笨人也可以明白過來的。英美是與國，但至今不是同盟國，日德義是同盟國，但至今軍事外交只是行動的方向一致，並非行動的步驟一致。所謂一致，不過是互相補充，可不是捨己從人。一個國家，捨己從人是不好的。

中國努力於安定自己，就是分擔東亞新秩序之建設，至於歐洲新秩序之建設，我們對之抱何態度，現在還談不到。主席的訓示「以不變應變」，所謂不變者，就是豔電與還都宣言的尋求與國而非尋求敵國的原則。中國現在仍在存亡關頭，糟糠尙未到手，而侈談肉糜，這是蹈重慶之覆轍。重慶不顧中國，而為國際奮鬥，我們豈非加以百般申斥嗎？如此，我們在為另一國際而奮鬥之際，也該首先顧到中國自身。因為在中國人看來，中國的存亡乃是高於一切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八日

經濟交涉的重點主義

現在和日本調整邦交，頂重要的，一個是政治的統一問題，又一個是經濟的統一問題。這裏專就後一問題來說。

在中國方面，關於現實的經濟問題的討論，很少見到。是因為顧忌呢，還是因為無知？我看是兩者都有。日本的報章雜誌上，却有關於這問題的許多意見與資料，這問題本來是可以談，而且應當談的。日本有日本的打算，中國有中國的打算，我們要知己知彼，並且尋求一個兩利的辦法。

日方在華經濟活動，已有過一次修正，現在又在進行作第二次的修正。最先，完全是軍管理，談不到關於產業的計劃，也有只是一種在佔領地的徵發。這不但浪費，連日本商人要投資也不得其門。去年六月之後，來了第一次修正：一方面強化經濟統制，並且擴大統制的產業範圍；另一方面，由日本軍方面把這種產業委托日本商人經營。至此，其經濟活動已與日本在華派遣軍自身的需要及目的逐漸脫離，而以作為日本帝國的經濟體系的一個部份，來處理在華經濟，而經濟行為乃逐漸呈現其自身的範疇與規律。

現在是開始作第二次修正，這次修正的特點是，不但由軍管理移轉而為日人商營，並且願意劃出一部份產業與中國合資經營，以及另一部份產業的交還中國自理。此外，還重新配置產業的經營重點。所

以如此，是因爲日本需要運用中國的資本，以彌補其投資力的短絀，又因爲太平洋危機的迫近，日本國外貿易關係起了根本的變動，這不但使日本國內的產業要來一個「再編成」，滿洲的產業，中國的產業，在其與日本的配合上，也要隨之而來一個「再編成」。日方所說的另行建立產業重點主義與緩和統制，就是這個意思。

與此直接有關的，是日本的對華貨幣政策。去年下半年起，軍票大漲，和英美匯率一對照，就知道這種高漲是由於另一種規律。日本物資輸華，多於中國的物資輸日，因此而起的對日收支不平衡，促成軍票對法幣的比價，其高漲率遠過於英匯美匯，是一種原因。另一種原因，日人稱爲佔領地的產業，如鐵路，船舶，電汽，皆在日人手中，限用軍票，不但因此而增加對軍票的需求，且因軍票高漲可以增加額外利潤，更人爲的促成其高漲。可是現在，發現這裏面是有缺點了。爲使中日的物資交流可以活潑進行，並且爲使中國人的資本可以活潑運用，軍票對法幣的比價，大概將由日方自動的降低。

這裏，我們要說的有三點。第一點，現在許多事情總是說爲了日本派遣軍的需要，其實從去年下半年起日方第一次修正其對華經濟政策後，已經不是這麼一回事；現在第二次修正，此種分離更爲顯明。由此可見只要日方有誠意，雖在戰爭行爲尙繼續存在的今日，把經濟權交還中國，並非爲事態所不許的。

第二點，日本在考慮對華經濟政策的時候，應當同時考慮到政治，以至於軍事，因爲這三者其實是互相關聯的。可是現在，日本還是把這三者作個別的考慮。她的對華經濟政策的兩次修正，就經濟本身來說，似乎是可以由不通的路慢慢的走到通的路上去了，然而還是行不通的，因爲中日戰爭不得結束，不如意的政治基地上不可能有如意的經濟成就。爲要結束戰爭，日方原有援助國民政府強化的表示，然

而儘管說拓展和平運動，求政治的統一，求新軍的建設，要是經濟不統一於國民政府，政治是不能統一的；產業仍在日方支配之下，國民政府要建軍也就自己沒有物力來支持。如今不徹底的調整一下，把這三個問題，經濟的政治的與軍事的謀綜合的解決，則其結果，是會沒有一個問題得到解決的。

第三點，現在日方已着手陸續交還軍管理工廠，並且答應緩和經濟統制，這自然是好事。但完全站在日本的立場打算，由軍管理轉移而為日方商營，更轉移而為一部份交還，一部份合資經營，加以一部份的經濟統制緩和，這在政策上固然有它整然的體系，可是在這裏，中國只是被當作對象來考慮，不是被當作共同合作的主體之一方來考慮，這是不對的。日本不能只無她的政策，有她沒有別人，中國也不能只有她的政策，有她沒有別人，這不只是友誼的問題，而是實際上行得通行不通的問題。

日本應當顧到，中國也有中國的重點主義。那幾種產業是非交還不可的？並且是要怎樣的條件纔算是實實在在交還了？如果是合資經營，則中國方面應當爭持的又是什麼？凡此，都不能由日方規定，而由中國承受就可以了事的。却是日本要顧到中國，中國要顧到日本，何況在中國地面上的事情，中國究竟還是主人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一日

再論重點主義

對日經濟交涉的重點主義，就是說建國的經濟基礎所必須具備的幾個起碼條件，一定要爭取。日本和中國做朋友，我們得到的比這還多，這是頂好；否則，即以戰敗的程度而論，我們也不應連這都失去。一個獨立國家，必須有她統一的貨幣制度，必須有她自主的對外貿易，必須有她完整的產業體系。這就是我們要爭取的起碼條件。一百年來，中國受英帝國主義的掠奪，這幾個起碼條件是被侵蝕了，但也不過是侵蝕，沒有被剝奪乾淨，因此中國總算保持了半殖民地的地位，還沒有淪為殖民地。現在日本說是和中國做朋友，中國是為此纔對日本講和的，拿英國來比，當然是比非其倫，不過，就是從頂懷的方面來想，總也不應壞過英國。這是正義，也是形勢。日本雖然做到了英國所未曾做到的，那樣深入的戰勝了中國，可是日本支配中國的形勢仍然遠不及英國所會有過的。如此，這裏所說的經濟方面的幾個起碼條件，我們是可以爭取得的。

依據和約，這些說話本來都是多餘，因為和約裏規定得明明白白：「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是則凡有損害中國之主權者，不論其為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皆所不許。可是和約是要從現實做起的。現實的情形如何呢？我們提出：

(一) 再拓展和平運動，就應當拓展新法幣的流通區域。現在新法幣的流通區域尙局限於華中，而

且在華中的流通都是不圓滿的。這種事實，是由於過渡時期的客觀環境非如此不可嗎？其實這是在於日方的對策如何，我們的奮鬥如何。在全面和平來到之前，我們首先要使新法幣流通於整個和平運動區域。

應當即刻重新訂定新法幣與聯銀券及日軍票的關係，使新法幣得以統一行使。

(二) 中儲銀行與地方銀行的關係，也應當重新訂定。現在有許多地方銀行，如蘇民銀行，皖民銀行之類，即華北聯銀也不過是地方銀行，這種銀行，都是中日合資的，其責權與機能皆有待於調整。在資金的動員方面，中儲銀行是替地方銀行服務的。但在經濟政策方面，地方銀行却是必須絕對受中儲銀行的指揮。其他一般商業銀行對中儲銀行的關係，也應如此。

(三) 必須把辦理外匯的責權交還中儲銀行。本來，由中央銀行委托商業銀行去承辦外匯，譬如委托華興銀行吧，也未始不可以，但這裏有一個前提，即被委托者必須絕對受委托者的指揮。就整個來說，凡是地方銀行，商業銀行，都應以中儲銀行為中心而依附，避免成為日本的在華國策會社的一個肢體。

(四) 不但是對外貿易，即在對內產業體系的構成上，中國亦應有她自己的設計。依照和約，蒙疆及華北的某種特定資源，在處理上我們須對日本遵守特定的約束，除此以外，我們的義務不過是經濟溝通，是互惠不是最惠，是平等不是支配與被支配。就大體來說，中國對其本身產業的編制，應當是絕對自主的。

(五) 為行使這種產業編制的自主權，不但中國要有自己的對外貿易機關，並且鐵路必須收回，內地物資的移動也必須由中國自行統制。和約的精神本來是如此的。若說是因為過渡期間，則可以另訂臨時協定，俾同時可以顧到無礙於中國主權的日方需要。現在大家常常說過渡期間，可是要明白，過渡期間

固然還不是全面和平的環境，却已經不是佔領期間的引伸；許多事情是應當現在就來動手好好的幹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四日

二論重點主義

日本在中國設有許多國策會社，總其成的，除金融方面有蒙疆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及華興銀行外，產業方面有華北開發公司與華中振興公司，所有交通，公用事業，礦，鹽，棉花，及蠶絲等產業活動，都歸這兩個公司統率。

對於這個，我們有意見：

這種產業大概是中日合資經營的，既然是合資經營，日人即不應稱之為他們的國策會社。不但名稱上不應如此，內容上尤其不應如此。

此前，日本在滿洲設有國策會社，即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這是基於日俄戰爭的結果，而且它的活動範圍，是限於沿鐵路線二十里以內。總而言之，是戰爭與條約的產物。這次中日戰爭既非日俄戰爭之比，日人在華經濟活動，稱說非以戰爭之掠獲為根據，而以平等互惠之原則為根據，是則此等國策會社之性質與範圍，因戰爭之現實而造成者，須遵照和平之精神與條約而予以改正，乃自明之理。即以戰勝國對戰敗國之要求而言，亦只能要求設立某種國策會社，而不能任其性質與範圍漫無限制。

此等國策會社之法律的根據，謂爲取得已往華北臨時政府及華中維新政府之承認。可是中日和約中規定，過去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辦事項，其中應調整而未調整者，應隨事態之所許，依兩國間之協議，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速行調整之。這調整的工作，首先應從改正華北開發公司與華中振興公司的現狀入手，規定其營業的性質，並局限其活動範圍。

在兩公司之下的商業，如鐵道，電信等屬於國營者，應首先交涉收回；並且收回要澈底，不可徒等形式，如貼錢彌補日本投資力的不足就算了事。

以上幾點，就中國來說，是得之則存，失之則亡的。我們要爭取這一着。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使弱小國家百世之下猶惕然警誠；中日兩國經濟的長短相補，自有正規可尋，與此固迥異其趣者。只因四五年來戰爭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現實，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就可以廓清，改正，但亦因此，我們的責任是十分重大。我們不做，聽憑不合理的現實存在，且繼續依照其不合理的方向發展，這是我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我們做了，如果日方不諒解，這是日本無以取信於中國。現在我們於責備日方之前，先來責備自己；為什麼大家只在那裏玩些小節目，許多關於國家存亡的大問題，倒是日方替我們說了話，我們自己還沒有明朗的表示，經濟統制的問題就是一例。本多大使回國，主張緩和在華經濟統制，中國方面，輿論界連響應本多的演說都不够勇氣；而當本多大使已在指稱戰爭行爲雖尚繼續存在的今日亦應即刻實施和約，如此對其國人大聲疾呼的時候，中國方面，還在努力於以戰爭行爲之存在來辯護不合理現實的持續。我們要責備的就是這等人。

國府與國家

主席對宣傳人員的訓示，謂就中日關係立言，應本於兼相利，交相愛之旨，切戒自私利己的觀念。這是對於只知有親善而不知有祖國者，以及只知愛國而不知所以愛國者的當頭棒喝。

所謂兼相利，交相愛者，是要把握中日兩國的利害共同點。日本要求確立戰果，中國要求最低限度之生存獨立。這兩種要求的一致的歸結，在於解決中日戰爭，而當前的課題，則為強化國民政府。

強化國民政府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把國民政府與中國結合。首先，講和平的人要認識中國在那裏。有人以為中國就是重慶政府，因而以為重慶政府倘若講和，中日戰爭就可以解決；或者以為中國就是改組還都的國民政府，與國民政府講了和，就是與中國講了和。此外，還有人以為中國是在倫敦紐約或莫斯科，只要解決英美或蘇俄，就能解決中國。這種想法，都是錯誤的。中國在那裏呢？中國是寄託在中華民族爭取生存獨立的鬥爭上。日本而以事實與行動尊重中國之生存獨立，則重慶即為消失其抗戰之根據，而英美與蘇俄雖欲利用重慶，亦必因不能利用中國而歸於失敗；如此，則在國民政府的統率下，全面和平自然可以做到。否則，倘若議和而中國之生存獨立仍不能取證，則即使由重慶來講和，它還是會遭遇國民政府所遭遇到的同樣困難；如此，則與國民政府議和，不能算是與中國議了和，與重慶議和，也不能算是與中國議了和，所以無論在中國，在日本，倘若有人只着眼於國民政府或重慶政府，而不知

道着眼於中國，則千百種打算都是徒勞。

日本只有通過國民政府而與中國平等和好，凡事纔能得出結果。國民政府本身，並不是一個終極的對象，日本只有以尊重中華民國之誠意來尊重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纔能強化。所以日本援助強化國民政府，即不能存有同時強化對國民政府的支配的念頭。國民政府自身必須是一個整體，不是日本國策的一個部份。國民政府有它自己的國策，和日本政府的國策同等莊嚴。兩者可以平行發展，可是不能成爲一個派系。

我們是素樸的現實主義者，不像重慶與中共那樣說是要恢復七七以前，九一八以前，甚至甲午戰爭以前的狀態，但也不像有等人之談親善，至於彼我不分。中日究竟是兩個國家，而中國又是打了敗仗，我們是以此爲根據，要求國家主權的收回够得上及格的標準。這個能够辦到，國民政府自然強化。日本戰勝了中國，但並沒有征服中國，我們應於此準確把握中國的戰敗程度，而瞭然於中日雙方的困難，以此作成中日雙方的要求的結合點，兼相利交相愛就是從這種知己知彼而來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四日

凍結中日資金

越南問題的反應是英美凍結中日資金，不是戰爭，凍結資金的反應則將是經濟的報復，或者還會有某種政治的報復，但也不是戰爭；到戰爭仍然有着某種距離。

日本在厲行的產業再編成與移轉對外貿易的路線，即為對資金凍結，禁運，與海上封鎖的事前準備。這種準備只能緩和困難。不能移去困難，要移去困難，將只有以武力來衝破。但在當前，只能採取報復。

可能的報復，可以拿德國做參考。德國是停止美國的經濟活動，不但在德本國，也在其佔領地。如此，在日本，乃至於中國淪陷區內，英美的經濟活動將受到打擊，是想像得到的，這種打擊，有可能是被沒收。據愛特迦·史諾的說法，日本有可能沒收英美在華的資金與產業，數達二十萬萬美元，不過在手續上還有問題，不至於就急轉直下到這一着。只看英美，雖已宣佈資金凍結與日印日緬商約廢棄，但並不就此斷絕對日本及中國淪陷區的貿易，而日本大藏省頒佈之外僑交易取締規則，按其程度，也不過是初步的報復。

在中國方面可注意的是，上海租界之所以迄今尚得存在，固由於日本對英美關係的惡化是漸進的，與此相配合，避免採取斷然的行動；也由於上海之為國際自由市場，倘有使日方容忍其維持現狀的理由

。現在英美凍結中日資金，對日關係惡化雖未至尖端，但已成爲顯著，而且上海的國際自由市場的資格亦因此而失去。這樣，租界的命運就很值得研究。

其在重慶，早想切斷和平運動區域的舊法幣，而以此解脫責任。可是有一個很長的時期，重慶仍在利用上海市場，所以不能下這決心。而且沒有得到英美的同意，蔣也沒有辦法可以切斷。但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日本在華中強化物資統制，上海市場對於重慶的意義因此消失殆盡，所以有這次蔣對美國的請求凍結。這一凍結的作用，就是切斷和平運動區域的舊法幣。

經此切斷，上海的外匯黑市並不就會消滅，但有可能最後竟至於消滅。舊法幣既與外匯脫離，其作國內通貨的資格將受到影響，是無疑的，或者還會發生舊法幣在和平運動區域與在抗戰區域的價格剪刀差。我們要注意的是，新法幣是與舊法幣保持某種聯繫的，就是日軍用票也不能例外。舊法幣經此變動，新法幣應如何改正對舊法幣的關係，而自立基礎，乃是目前就須考慮的問題。還有，中日資金被凍結之後，上海游資的混亂情形可想而知，如果沒有辦法處置，則囤積之風將一發而不可制，有人以爲游資將逃往重慶，這倒不足爲慮，因爲重慶既有切斷這方面的舊法幣的決心，游資又不能變成貨物通過封鎖網運動到重慶去，光是把舊法幣逃回，是不被歡迎的，不過目前資金雖被凍結，上海的對外商業關係尚可維持一時，而在這期間，又有幾家銀行被指定特許處理此種商業關係，這樣，上海的一部份游資還是可以變成和平運動區域的物資而輸出，再變成英鎊美元，經過幾道手續之後流回重慶去，而其蛻脫下來的舊法幣，則仍然留在和平運動區域。他們的這種手段，我們不可不知道。

凍結資金並不就是斷絕商業關係，但商業關係的斷絕將隨之而來；凍結資金並不就會引起戰爭，但

到達戰爭之距離已因此而縮短。日方為應付此現實的趨勢，近衛新聞正在改訂中的經濟政策，將較前幾天的預定程序還更強烈的推進，並且對在華佔領地的物資統制，也將提出新方案。不但如此，日本對於國民政府的旨趣，援助其政治機構的強化這一層，也將更堅定的貫徹其一定的目的。這在我們和平運動者，正是打疊起精神的時候，時勢所趨，我們已非積極參預東亞問題不可，只是我們無論何時都應牢牢把握住中國的本然，當心在國際的大變動中消失了自己。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廿八日

時代與文人

和平運動的理論到現在已有很完整的一套，以後也不必再有發明，卻是只要保持一點說老實話負責任的精神就好。說老實話，是敢於正視現實，負責任，是對中華民國負責任。

現在的情形是，理論走在現實的前頭。本來理論是走在現實的前頭的，但走得過遠，以至於回頭一看望不見現實，也是不好的。因為再下去，就會沒有根據，而又不能不在過高的理論與過低的現實之間找一個配合，這樣固然可以發明另一種理論的體系，然而究竟還是不發明的好。

比方說，中日關係是合作，不是混合，所以即使日本方面，都已再三聲明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其本然之特質。這已經很够，並且是很正確的。可是現在我們這一邊，卻又發明了「混成一體」說，這便是

另一種理論的體系，這就不對了，還是保持原來的中日一致而非一體的說法來得正確。

再比方說，以前是常常說到和平運動是艱難的，並且以孤臣孽子自況，近來的口氣卻稍稍不同了，往往是很堂皇。但也仍然有人以為，要堂皇不如先求嚴正，好說不如苦幹，原來的理論是「在不自由當中爭回自由」，倘若另來發明「以不自由為自由」的理論，則雖然大概不會有人敢於出來反對，但決不會有人聽的。

宣傳不是文化的全部機能，為文化而文化的說法是否成立，這種過於高深的哲學且按下不表；單表今日的中國，文化也實在被摧殘得太厲害，而且還在繼續被摧殘下去，倘能於宣傳之餘，保存一點與宣傳政策無關的文化，總是好的。有些知識，是超於和平與抗戰之外，並且不但中國需要，日本也需要，甚至第三國也需要的。自然科學是最顯著的例，即文學哲學等要是僅作觀察，不下結論，給讀者以自己可以想一想的自由，或者也是值得做的。今天以至於今後，假使不是深明政策，環境所驅，批評是要愈慎重愈好，不但是關於中國，關於日本，就是關於第三國的事情都一樣。不過，雖然不表示見解，光是說些寫些中國還有幾個省份，世界上有幾個國家之類，使大家知道知道，這也是應該的。因為中國再被摧殘下去，將來或許會連這一類知識都滅絕的。這一類知識能够保持得不滅絕，文化人的功勞已經值得讚揚了。

不能判斷問題，光是提出問題也好，連問題都不能提出，則就是迴避問題，迴避現實，但只要不故意曲解問題，不捏造現實，也還算是好的。文化人的條件是「行吾心之所安」，至於行得甚少，那也只好予以原諒。前人所說「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不能責之一般文化人的。這固然是時代的好

悲劇，但比較都去扮喜劇總得好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六日

作惡者必自損

中華日報社日昨下午遭渝方暴徒暗算，發生定時炸彈爆炸，釀成火災，我人聞訊之餘，殊深痛憤，除對中華日報同人寄以深切之同情與慰問外，於政治戰鬥之立場上益感我人責任之深重，此項暗算之逆襲，實以我人之威力足使渝方寢臥不安，故雖遭受損害，乃益知鞭策奮邁。

和平運動乃一政治運動，而獲致政治運動之勝利，自有其正軌，決非任何暴力所能爲力，其道唯何！乃在以政治之主張訴諸國民大衆，取決於國民大衆。是以我人已屢屢爲國人道：我人絕對卑棄任何陰謀暴行而出以堂堂的政治鬥爭之陣容以與渝方相周旋。蓋卑劣的暴行，充其量僅足損壞我人些微之物質，與少數忠勇同胞人身之傷害，決不能阻礙和平運動進展於毫末，更不足以動搖我人奮進意志於萬一，此者可取證於我人過去之所遭遇。抑有進者，渝方之此種暴行暗算，實爲一最足予國人以污辱之可恥行爲，渝方旣擁有如許之武力，何以不足以阻止其喪師失地，竟乃轉而殺害國人，燬滅同爲國家之產業，此者足證其戰鬥精神之喪失，固已不足爲我人戰鬥之對手，抑且爲予國家民族羞辱之罪人。明乎此，我人對渝方實亦不屑再予申斥。

我人之作此言，決非故示鎮靜，蓋我人之力量，已久爲渝方所深切認識，亦爲國人所深瞭然。我人過去之所以不願以牙還牙以暴力阻遏暴力者，並非我人力量之不足，我人敢斷言倘一旦迫使我人不得不以暴制暴時，則我人之力量足使渝方在滬之一切暴力及其一切組織粉碎無餘，摧燬淨盡，而於我人前屈膝！然我人迄未施行者，即以「多作惡者必自損」，渝方此項暴行之結果，徒招致國人之吐棄並自暴其短，自促其滅亡耳。

我人固在戰鬥中生長者，對於日本且不苟且，對於國人即無慚恧，對於渝方則更無所畏懼，此爲我人不動之自信，亦即我人戰鬥精神之所在！

中華日報社同人過去爲和運宣傳已盡其最大之努力，其不折不撓之奮鬥精神，尤爲我同業所欽敬，此次遭此不幸，我人深信其必能奮揚其過去之精神，益爲邁進，我人於論及渝方之暴行，僅足證明其已喪失與我人作政治鬥爭之資格與自信之餘，敬致我人深切之同情與慰問之意。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日

紀念八一三

八一三爲什麼會闖成這樣的大禍呢？毛病出在策士之多。當時策士們之言曰，日本僅在恫嚇，所以中國就以恫嚇答覆恫嚇。等到戰爭擴大，眼見得不可收拾了，則又思借攘外以安內，這叫做將計就計；

地方軍閥藉名抗戰以倒蔣，蔣即以抗戰之名動員地方軍閥，這叫做調虎離山；中共藉名統一陣線以爲議會鬥爭，蔣即以統一陣線之名單住中共，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諸如此類，國事就其這些策士們的陰陽妙算中一誤再誤地被誤下去了。

中國之有策士，其源出於戰國，其流極於曾國藩的幕僚。蔣晚年事事學曾國藩，也學曾國藩的幕僚制度。這幕僚制度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大概就是參謀團或智囊團，可是在本質上，在責任心上，兩者有其顯然的不同點。參謀團或智囊團的任務是政治技術的設計，或者是戰略、戰術的設計，可是不能制定國策，國策是要由議會或者內閣來制定，通過元首頒佈的。幕僚制度則只是政客政治的產物，作合縱連橫的活動，而國策亦即由此產生。

參謀團或所謂智囊團是可以與民主政治並存的，但幕僚制度則絕對不能與民主政治並存。中國過去在國民革命時代，就沒有幕僚制度。幕僚制度的復活是國民革命夭折後的事。沒有國民大會，沒有黨內的民主精神，沒有五院的實際責權，沒有內閣制也沒有總統制，在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就只看見官僚小組會議，就只看見一羣策士們在紛紛的獻計。

現在是和平運動的時代，說和平運動的陣營裏也沾染有策士風，那是屬於巧言聾聽的一類，應當立予糾正的。只是中國士大夫的策士習氣與官僚小組會議的慣例，要革除也實在不容易，因爲中國不能急切走上現代政治，所以沒有東西可以來代替幕僚制度。和平運動同志與蔣介石那一夥既然是處在同一個中國，雖然不至於被傳染，卻不妨作爲殷鑑。重慶的策士們，或則連籌帷幄之內，或則到處奔跑，不得意的時候，看看相，算算命，排八字流年，實足陰陽先生的本色，得意的時候，斡旋乾坤也是他們。

和平運動本來是很嚴肅的，開端時就斷然表示不與重慶做雙簧，這使策士們大吃一驚，因為他們可以兩邊跑的機緣被堵絕了。和平運動也本來是很民主的，前年底協議和平方案與去年春還都南京，這一類大事都是經過同志間的詳細討論的，所以這時候沒有幕僚制度，稱得起一個革命團體。現在是，現在我們發現了我們原有的這種美德。

因為提到八一三，我們為抗戰之出於策士們之手而痛心，同時看到和平運動必不致敗於策士們之手而安心；安心就是樂觀主義，而現在要提倡的正是樂觀主義。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三日

進步與落伍

和平運動到還都以後，在理論上有很大的進步，不幸而往往有人落伍，便應當立即予以糾正。

還都以前，是說中國必須跳出世界戰爭的漩渦，所以不應再抗戰；因為世界戰爭是帝國主義者分割殖民地的戰爭，中國是半殖民地，是被分割的對象之一，自己湊上去，大不合算。但後來德波戰爭發生，等到還都，世界戰爭的規模已具，經過這個事實的啟訂，和平理論於是以更新的態態而出現，原來這次的世界戰爭乃是為了軸心國要替全人類解除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既然也是受英美帝國主義侵略的，而且也只有英美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對此當然要感動。因為抗戰而被英美帝國主義利用做工具，

是忘記祖國，但如果因爲和平而成爲軸心國的一員，這卻是目標更大，也更積極的做去。

和平理論的這種進步的線索，是歷歷分明的。起先對於中國以外的事情，範圍僅限於東亞，並且重點在於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而以此爲分担新秩序的前提。但到後來，因爲德義等國都承認了國府，中國的外圍也就擴大到歐洲新秩序，並且把重點放在分担中國，分担友邦和與國的新秩序，而由友邦和與國分擔中國的獨立自主。所以起先是說中日兩國各保持並發展其本然之特質，使中國復歸於中國，日本復歸於日本，而東亞復歸於東亞；後來加上註解，中國爲日本，日本爲中國，由融洽以至於融合，融合於東亞新秩序之中；這並不抵觸中日兩國的本然之特質，卻是中日兩國的本然之特質必須如此纔能保持並且發展。

如此，和平理論不但發展到更遠大，更現實，而且找到了比以前更堂皇的支點。起先是把中國自己看做二兩法碼，講和可以保持這二兩法碼在遠東國際均勢中的作用，而亦以此二兩法碼的作用作爲講和的保證之一，所以說國際形勢不能用以抗戰，但可以用以講和，使之有利於我。後來却是，遠東的均勢已因日美對立的尖銳化而破壞了，這樣，中國便不能再以二兩法碼自居，卻是應當迎頭趕上，與戰勝國爲伍，以共同爭取偉大的世界，不再以一隅之和平隔絕戰爭，而以分担新秩序來保證此一隅的和平，並擴大此一隅的和平。

在時代的巨輪的轉動裏，就是塵埃，也要做飛揚的塵埃，纔有聲有色，何況中國已成爲這巨輪的軸心之一，已躋於戰勝國之伍呢。所以凡事要放得更遠大，更積極。事實是常青的，革命是前進的，太陽底上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停留在原來的地方，大概就是這種道理。但也仍然有人停留在原來的和平理論，

變成落伍，以至於用懷疑的就心的目光注視現實的進步，對於這種人，無論其為同志，為同胞，應當給他們解釋。解釋比討論好，因為解釋沒有不即刻被接受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日

是進步還是歪曲？

今年是和平實踐年！這一口號在現階段看來，已一致認為不應再是口號，而應為和平運動的歷程碑！我們不僅要做，而且必需要做到！

因為現在是實踐年，所以我們不需要再進步的理論，却是需要再進步的事實，理論是行動的指標，行動是理論的實踐，我們已到了實踐的階段，則理論該是早就定妥了的事，現在只需要去做和怎樣去做，以至如何去做到的問題。聚論紛紜，反會使光明正大的事，弄得晦澀難辨，迷失了我人行進之指標的。

在現時我想多討論討論如何去做實際問題，或許總要比較吃力不一定討好的發明或是製造一套新奇的理論要好得多！和平運動的進程，在還都以前原是以發揚和平運動的理論指導民衆認識以爭取民衆的擁護為主要任務的；在還都以後的一年中，和平運動的主要任務已進為調整國交和簽訂和約二大目標了；今年是和平實行年，這一簡明的標語，已說明了他本身的含義，即是說和平運動的第三階段的現在，是要怎樣去實現和平，實踐和約！現代的中國老百姓，決不再是蜀漢時代的阿斗，蔣誤認了這點，所

以蔣遭到了定命的失敗，這教訓給予我們和平運動者是同樣的可貴。所以新奇的理論的被製造被發明，不是說老百姓不再需要，實是他們自身的經驗所教導他們而得的認識已足夠富豐，他們都知道需要和平，但怎樣才算是和平，他們都有點迷糊而不得不要求我們和平運動者少說一點玄奇的話，多拿出一點事實來，俾與他們過去所聽到的理論來一下引證。所以今年是和平實現年，在老百姓的要求上雖非爲「必然」，但總該是「應然」的事。

在實踐和平的進程上，我們的本錢在那裏？我們拿什麼去實現和平？這不在於發明或製造新奇理論而在於我們大家都應有一種嚴肅的殉教者的精神，雖有一百次的失敗，但我們決不能忘記了一百〇一次的交涉或嘗試，古諺所說的「明知其不可爲而故爲之」，基督耶穌之自願上十字架，諸葛亮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這些精神都可稱之爲殉教精神；在大英帝國主義者壓榨下的甘地所採取的不合作主義，在現時中國固然是不應該倣取的，但殉教的精神在目前的中國是十分需要，而且是必需的。

記得盧森堡曾批評列寧和普列哈諾夫二人，她說列寧好似一條獵犬，而普列哈諾夫却是一隻哈吧狗。這意思是說：列寧發現了一個目的物後是緊緊地抓握住而不肯放鬆的，他在一件事沒有做好之前不會再被外物引誘而放下這個就去做那個，所以列寧是成功的；普列哈諾夫却不然，他的意志是不堅定的，常會受外界的引誘而往往更易其工作和目標，一如哈吧狗似地看到什麼就玩什麼，所以他是一無所成的。這一個批評對於我們是足資警惕的，因爲我們現在需要的也只是列寧樣的獵犬而非哈吧狗式的普列哈諾夫。我們要咬住鱷電的原則和範圍，不要追逐更新奇的和平理論。

上面說過了，理論是行動的指標，理論是指導現實，改正現實的，所以理論應該是在行動之前早就

規劃定好了的，如其理論時時刻刻在變化或是進步得太快了，將要使現實追趕不上而變成了落伍，那麼不要說指導現實和改正現實將不可能辦到，並且必將造成以理論來迎合現實的現象，這不是理論的進步，而是歪曲，其危險的程度，要比沒有理論更壞，所以我們寧可使理論不要太新奇太多變更，而決不可使現實太落後太稀少。以不變應萬變是我們在行動上所應取法的，我們在和平運動的行進上。應該要貫澈豔電的主張，這是最老實的指導原則，它所指示我們的標的，所督促我們要做的，至今還是存在，只須我們將豔電所交給我們的使命做通了已是很好的了，在這個還沒全都做通之前，更進步的理論應當保留待將來再說也還不遲。

與其好高騖遠，食而不化，到不如老老實實地一件一件地做去，做到了這件再去做成那件，不致弄到一無成就。再重複說一句：現時中國所需要我們和平運動者的是：以殉教的精神，多去做出一點更進一步的現實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一日

後死者的責任

為紀念和運殉難同志作

今天是和平運動殉難同志紀念節，我們除對殉難同志表示無限哀悼外，不禁深深感到我們後死者的責任。

回想和運初起時，我們的同志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但我們却有堅強的信念與決心。我們決以繼續犧牲繼續奮鬥的精神，來完成這一救國運動。一個人不成，就來第二個，一次不成，就來第二次；前仆後繼，決不停止，決不苟安。

這種精神，在革命初期是必要的，而在革命的繼續進程中，尤其是在草創了一個局面而猶未底於成功的時期間，一樣的需要保持革命初期的這種精神。所有的革命史，都證實這一點。

我們以辛亥革命這一史實來看。在事成以前，所有同志都抱着犧牲決心，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如徐錫麟秋瑾諸烈士的慷慨就義，黃花岡之役七十二烈士的一舉同殉，而汪先生博浪一擊，尤使清廷爲之膽寒，竟不敢對革命志士再加殺害。他們以犧牲一己的生命來奠定辛亥革命基礎。到辛亥以後，革命原已成就了一個局面，但惡化腐化諸種勢力，又復相繼混入，其中有一部分革命同志則已安於現狀，不肯再繼續努力，而國父孫先生則始終如一，不與惡化腐化勢力相妥協，還是要呼號奔走，領導諸同志繼續革命。其間如蔡鍔黃興等的再舉義旗，宋教仁的死於袁世凱之手，也都因不滿於當時所成局面而繼續奮鬥犧牲的。又如民十五的國民革命，後來也總算成就了一個局面，但汪先生却還是要輾轉奔走，不苟安於現狀；雖經多次危害，始終不撓不屈。

由此可見前人所說「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革命初期的烈士易求，革命後期的志士難得。但革命是前進不息的，因此真正的革命家乃是以一貫做烈士的精神來擔承做志士的責任的。

記得 汪先生在謀刺攝政王之前給胡漢民先生的信中有這樣幾句話：「譬如煮飯，當熟之以薪，薪盡而飯熟，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乎！」當時胡漢民先生在 汪先生信後有幾句按語說：「譬如炊飯，以

已爲薪，曾不念其已當爲釜者。」當時一般同志都期望 汪先生來負支持革命的重任，不願 汪先生先作犧牲，所以胡先生也要 汪先生做釜。釜的責任是忍辱負重，要經得起火的熬煉。後來 汪先生幸而未遭清廷殺害，負起了釜的責任，但 汪先生的做釜，却仍以薪的精神去做的，始終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絕不會懈怠，絕不會苟且，也絕不會自滿。

現在 汪先生領導和平運動，也還是一貫的犧牲精神。

和平運動在現階段，經同志們的共同努力，自國府還都，和約訂立，也已成就了一個局面。過去一部分同志是犧牲了，更大的擔負壓在我們後死者的雙肩。我們拿 汪先生煮飯的比喻來說，殉難同志已做了煮飯的薪，留下我們不得不做釜。如今飯雖半熟，還隨時有煮成僵飯，爛飯，焦飯的可能。薪還要繼續燃燒，釜更要以新的精神去忍受火的熬煉！在這局面下企圖苟安的心理固然要不得，忍不住火的煎熬因而反移恨於薪的燃燒那種心理尤其要不得。做許白難。做程嬰更難，做許白的難，難在立時犧牲的勇氣，而做程嬰的却除了犧牲的勇氣還需要持續的毅力，所以更難。我們就和運已成局面虛心省察，覺得在可能限度內尙待努力的還很多着。半年來本報曾本「責己重以周」之義，迭有指陳，這裏可不用再舉。我們要善體 汪先生昭示我們的罪己精神。時時作深切的反省，人人有深刻的責任心。以程嬰忍死撫孤的精神去撫育這方在成長的和建大業，效 汪先生做薪的精神去盡釜的責任。

紀念和運殉難同志最好的辦法，就在於我們如何盡後死者的責任。論語說，「今汝畫」，我們不要把和建大業也那麼一畫畫去才是！

清鄉工作檢討

清鄉工作是現行國策的重點。可以說國民政府現階段能不能展開，這就是關鍵。

清鄉工作對於中國有好處，對於日本也有好處，便是因於這交點而協力進行的。對於日本的好處是藉此可以縮短防線，活用兵力，接近戰爭之結束。對於中國的好處，是多做一分清鄉工作，即可以多保存一分國家、民族的力量，即可以多收回一分主權。

從七月一日正式開始以來，第一期清鄉工作已初步完成。在該區域內，沒有了游擊隊，沒有了苛捐雜稅。自戰亂以來，假借某種團體名義，或結托某種勢力，設卡收捐，濫施生殺之權者，無論其為官吏，為軍警，為豪紳，為浪人，清鄉工作所到，一一嚴厲加以管束，取締，或科以與盜匪同罪。至於游擊隊之不及逃走而被俘者，前後近萬人，其中除民衆遞道控訴，殺人者死，此外均酌量情節，准予取保開釋，予以更新之路。

現在是，京滬車已可以開夜班，通過清鄉區而行旅不驚。在鄉下，無論白晝晚上之路，不會碰到土匪，城鎮之大小工廠已一開始冒烟，恢復生產。

所以有此成績，皆我清鄉將士及全體工作人員，在汪委員長領導之下，苦幹硬幹，知其所幹之工作為現行國策之所寄，為和平運動區域之拓荒，為國家民族之氣，而以最大之努力所獲得之果實。此種

工作，本來如治亂絲，非細心再加忍耐，不能找出頭緒，更非以斷然堅決之態度，不能芟除因循苟且之習。工作開始以來，軍警與地方官吏之糾紛，地方官吏之民衆之互訐，中日軍進行合作中所發生之誤會，以及土豪劣紳浪人土匪之混亂轉轍，日必數十起，講到應付，有外交，有軍政，有民政，有社會政策，有經濟政策，其情勢之複雜，百倍於曾國藩李鴻章時代，十倍於過去江西剿共時代，至今能以更短之時間，更紺之物力，收更大的成交，我們於此引爲嘉慰。

當此國際形勢的變化尚在不可知之數，中國以疲敝之餘，自處之道，端在以不變應變。重慶是以僵持抗戰等待國際之展開，我們則以休養生息去迎接國際形勢之有利於我。僵持抗戰，是只有使疲敝者更疲敝，而從事休養生息，則國家民族之元氣賴此可以保存，而恢復壯大。這裏的進度，就是以促成日軍的局部撤退爲標識。

從本多大使，畠俊六總司令，以至於馬淵報道部長等等，皆經一再公開宣稱清鄉完成日軍即從該區域撤退。這是可靠的。爲什麼可靠？因爲清鄉在日本之目的，即爲縮短防線，活用兵力，而以此接近戰爭之結束。而且清鄉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中國的事情只有由中國人自己來處理，由中國人根據其自己的意旨來處理，纔能有辦法。因此，把握了清鄉工作的規律，也就是把握了中日關係的規律，也就是把握了和平運動現階段的規律。

現在清鄉工作尙未全部完成，大家要繼續奮勉。中華民國放着有路子可走，現在只是需要肯做事的人，能做事的人。

第一期清鄉的檢閱

汪委員長前昨視察清鄉區，對第一期清鄉工作成績甚嘉許，諸同志之賢勞，日方之協力，與一般人民厭亂求治之意向，於此皆有事實之表證，而清鄉工作之為強化國府的中心課題，為過渡時期中日關係的輪軸，為由局部和平漸致全面和平的里程碑，此其意義，亦於此而益明朗化。

現在中國不幸分裂為三，論人口，論土地與物資，和平運動區域皆優於重慶抗戰區域與西北共產區域，但為保證此優勢，和平運動區域必須修補破敗，而且必須改正中日關係之現實，使主權在我，而以此求抗戰區域與共產區域之統一於和平運動區域。這就是清鄉工作的任務。清鄉工作先從和平運動區域做起，把游擊隊，共產黨，土匪，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勢力解除，還之於民衆，並且把日本的軍權撤退，還之於中國。這種做法，是以強化和平運動區域為強化國府的基地，是以展拓局部和平為達到全和平的橋梁。

清鄉工作的成功，一在於正確把握對日本的關係，二在於準確把握對民衆的關係。就對日本的關係來說，日本確是以十分認真的態度協助我們清鄉，我們要做得出事情，纔能在實際工作中對日本表現我們的立場的嚴正。這次中日合作清鄉，正是相互發現對方，認識對方，瞭解對方的機緣，我們要得到日方的尊敬，只有在工作上表現，使日方覺得有可尊敬我們之處，有不得不尊敬我們之處。國家的獨立自

主不能求之於人家的施捨，更不能求之於空論，却是要看你有幾分斤量，便有機分獨立自主。清鄉工作諸同志在 汪委員長領導之下，以其氣節，以其勞苦，與日方合作，誠意而嚴正，至今日方高級負責當局・經正式聲明清鄉區治安確立日軍可以從該處撤退，我們的努力的初步成績，已使日方採取局部撤兵為其國策，這就可見清鄉工作的意義的重大，循此可以使中日關係復歸於正常。

就對民衆的關係來說，民衆是最素樸無僞的，你替他們做得一分事，他們就給你一分評價。這次清鄉工作，事係創舉，隨時隨地需要發明，需要改正，使民衆感覺不便的地方當然不能盡免，但民衆能够忍受不便，此則清鄉負責同志之認真做事，獲得民衆之諒解使然。苛捐雜稅之廢止，對貪官污吏與土劣浪人之懲辦，苟有不及覺察，一經民衆之要求與告發，未有不與民衆同其好惡，雷厲風行，切實做到的。此種事實，皆可舉數。單就清鄉區域至今沒有鴉片官私買賣一事而論，即已可見清鄉負責同志之嚴肅認真，洗盡數十年來軍人政客之惡習。振奮和平運動，而與民衆同甘苦，就是靠的這種精神。

清鄉工作從開始到現在不過兩個多月，這次因 汪委員長的下鄉視察而作全面的檢討，更加強了我們的信念。這條路線的正確已有事實證明，大家要以更大的努力循此奮鬥下去！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日

兒玉謙次失言

華中振興公司總裁兒玉謙次於八日接見上海新聞記者圓席上發表談話，原文具見於九日上海日文大陸新報，其言素樸無華，不失產業家本色，雖係渠個人之見解，不足以代表日方當局之政策，此就翌日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次長落合少將關於同一問題之談話可以見之，但兒玉以其華中振興公司總裁之地位而發言，吾人殊不能不認為極可注意者。

兒玉係戰時產權交還中國之否定者，且鄙棄中日合辦事業資本比例華方五十一日方四十九之規定，謂此乃酸朽之言，其所持理由為，此種國策會社為日本所造成，故應由日方掌握實權；而公共汽車及瓦斯等則係日本新創，並非繼承中國原有之企業，故歸還之說乃為無可依據。兒玉並表示其期望，稱此等企業為純經濟企業，亦即可以超然於政治約束之外，而由中日兩國之民間經濟人圓滑合作，渠更表示惋惜，謂中國方面有力之經濟人未能挺身而出，且以此為不能遽將產權交還中國之理由。

兒玉之抱此見解，顯係由於渠熟悉中國之困難，而未能熟悉日本之困難，以其產業之一角隅為出發，而無視於此產業之一角隅與中日全面關係之配合。

吾人固與兒玉同為素樸主義者，以為此等事取決於正義，毋寧取決於現實，惟吾人所見之現實較兒玉所見者更為廣大而深刻。蓋若僅就正義而言，則日本在華造成之會社，一部份原為中國之產業，因戰

亂而由日本保存，殊不足以邀得中國方面之感謝；中國方面感謝日本的保存，只有在交還之後，因爲只有在交還之後始能表明此種保存是爲了中國。就此意義而言，則兒玉所說「排除萬難」而保存者，乃是過渡到產權交還中國之一階段，而不能以之爲產權應由日方把握之理由。此種產業之另一部份，如公共汽車及瓦斯，則其性質屬於中國官營事業，苟如兒玉所言，爲日方所新創者即應爲日方所有，則英美於中國原無商埠之地新創商埠，原無鐵路之處新創鐵路，而據爲已有，吾人固仍視英美爲侵略行爲也。

惟吾人雅不欲多作此種正義之討論，吾人寧願多討論現實。兒玉須知，結束中日戰爭爲中國之要求，尤爲日本之要求。倘若中日戰爭不能全面結束，則修正現狀，謀中日戰爭之部份的結束，此在日本爲減輕負荷，在中國爲彌補破敗，此種事實的規律，已爲中日雙方所共見，而以之爲現行政策的依據。數月以來，本報立言主張先從局部撤兵，局部交還產權，局部撤銷日方在華經濟統制做起，日方隨之亦作同樣表示，由本多大使，畠俊六總司令，以至於馬淵報道部長，及日本泰晤士報，先後或以演說，或以談話，或以論文，表示雖在戰爭狀態尙繼續存在之今日，日方願就事態之所許而謀條約之履行，對於局部撤兵，局部交還產權，局部撤銷物資流通限制，均與吾人抱同樣之見解。蓋此種見解實現，不僅爲解除中國之困難，亦爲解除日本之困難也。

吾人雖不苟求一單純之產業家如兒玉者對此全面的形勢有同等之認識，但就兒玉所從事之產業範圍以內來說，兒玉固極瞭解苟無中國民族資本與之合作，於日本有何等困難。就渠之談話中對於「中國方面純經濟人出山」的期望，可見渠在職務上之感覺與考察，有其深入之處。但正因其如此，兒玉須知中日和約中關於中日合辦事業資本比例之規定中，在中國有其不得不然，在日本亦有其不得不然，固未可

以酸朽視之；而兒玉所期待之中國民族資本的合作，亦只有在產權交還中國的條件下始能得之者。兒玉於中日戰爭爆發前夕，曾率領經濟代表團來華，當時渠之言論爲「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不爲中國人所喜。現在中日戰爭已繼續四年餘，而兒玉之談話未見渠之知識因此種慘酷的事實教訓而有所進步，此則吾人殊不能不爲之惋惜者。

興亞院華中聯絡部次長落合少將在十日發表的談話，使吾人感覺渠係一頭腦清明之政治家。渠以當地負責任者之立場，繼兒玉談話之後宣稱：「將全部國策公司之經營現在即移交國府，雖爲時尚早，但於今日視性質而可移交者亦屬有之。」且謂當地各機關正考慮此種性質，有關公司方面，務須信賴當局之此種路線云云，由此可見日方具眼之士亦知倘如兒玉所言，則其時受損害最甚者將非中國。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二日

外交與國格

一個國家，無論其處境如何，國格不能喪失，生存權利不能放棄。她對國際上無論應盡多少義務，應盡何等義務，她仍得主張其獨立自主的權利。

強國有外交，弱國也可以有外交；戰勝國有外交，戰敗國也還可以有外交。弱國或戰敗國有沒有外交，就要看她在外交上能不能主張其獨立自主的權利。

日本在去年九月與德義訂立了三國同盟，可是她的旁邊有蘇俄，她的對面又有美國，現在都已做了德義的對頭，她的處境不能說不困難。可是她對蘇俄却在今年四月間訂立了日蘇中立友好條約，到德蘇開戰，她仍能與蘇俄維持中立友好態度。她對美國也同樣保持正常關係。當德美在海洋上衝突尖銳化的今日，她仍不妨與美國進行談判。格里埃號事件發生，日本官方機關報就聲明無論此次事件造成何種新發展，日本將本其自主政策，繼續作趨向世界和平之努力。（見路透社九月十日東京電）她這樣做法會使德義不高興嗎？不會的。正相反，這些正是給德義看得起的地方。但她對三國條約的態度究竟有沒有冷漠呢？也不見得。他自己固早經一再聲明絕對不願避免三國條約的義務，我們也找不出她在目前會對三國條約冷漠的理由。要知道日本這種外交政策的運用，正是最聰明的幹法，也是最有國格的幹法。

我們再看西班牙吧：西班牙與德義比起來是弱國，而且弗朗哥政權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雙手扶植成功的。西班牙在現在當然與軸心國有休戚相關之處，弗朗哥也這樣公開聲明過。但今年二月間義西兩巨頭會晤時，傳墨索里尼曾向弗朗哥要求二事：（一）由軸心國海空軍相助進攻直布羅陀或（二）允德軍假道西境，並予義方以海空軍根據地。弗朗哥却完全拒絕了。（見路透社二月四日倫敦電）他這樣做法得罪了德義嗎？並不會。他不給軸心國以助力嗎？也不致於。他只不肯丟掉西班牙的國格。

我們再看看法國：法國現在是戰敗國，而維希的外交究竟如何呢？本年六月間德法共謀合作，維希負責人士會表示法國現行政策謂：「法國政府之主要工作，厥在保衛法國及其帝國生存有關之利益。」（見哈瓦斯六月六日電）又貝當亦曾於彼時宣布法美關係，大意謂法國重視美國之友誼，但法國決履行對德之義務。（見國際社同日電）這就是說法國應當盡其對德的義務，但也無妨於對美的友誼。又同年

五六月間達朗（維希政府協理，與德進行締約談判），其廣播詞中有如下的話：「德國爲戰勝國，何以欣然接受談判，其主要原因實爲德國意欲重建歐洲秩序，並知此舉非獲得歐洲各國之協助，不克有濟，以故務欲使我國能改善戰敗國之地位。」（見哈瓦斯六月十日維希電）凡此都可看出法國今日的外交，還是保持着她的國格。法國對德可以停戰，却仍然不失國家的尊嚴，這正是維希的可敬可愛處。達朗的話尤值得我們參攷。

我們在這裏可以得一理念：就算是同盟國，講合作也得有個樣子。所謂軍事外交一致，並不是亦步亦趨，而是相互相成。不但軸心國如此，英美蘇也一樣。她們的關係都是一致，可不是一體。她們的行動目標一致，行動的步驟却是參差的；她們相互負責，却並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立場。只有在惡意的敵人方面，或者不懂得如何做朋友的人們看來，纔會因爲她們的這種行動步驟的參差而加以猜測，謂爲發生裂痕，或者表示驚訝，爲之不安。這種人就是不瞭解德義需要法國及西班牙的合作，乃是法國及西班牙各就其地位上所能發揮的助力。法國及西班牙愈有獨立作爲，愈能發揮這種助力。日本對德義，德義對日本，也是如此。

中國和德義是朋友，和日本更是軍事外交一致，然而中國仍然應當有她自己的外交，獨立的外交，要這樣子纔有資格講合作，於中國有益，也於日本有益。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念二日

恢復正常外交

本多大使前天在南京召開全華總領事會議，日外務省東亞局第一課課長太田代表豐田外相致訓詞，其結語有云：「日政府對國府之條約，必須一一付諸實行，蓋日政府所祈求者為國府之發揮其機能，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任……」本多大使亦謂：「在急迫之局勢下，日本政府處理事變之方針，絲毫未有動搖，而國民政府之強化，又為處理事變必取之途徑……」這是日本外交當局最近的表示。我們從這幾句話裏更可證明中日和約的實踐，雙方是同感迫切，同具決心的。

汪主席說過今年是和約實行年。過去大半年中，國府的努力可以說都集中在這一點。六月間 汪主席的親赴日本，及從七月起的清鄉工作是關於實行和約的兩件大事。但國府的努力固盡其可能，同時日本固已給了國府許多助力，而仍有不少地方使和約實踐遭受阻礙，這就是和平運動區域裏那些非常狀態的存在。現在是正當全面和平實現前的一個過渡時期，這所謂過渡，其意義應是使非常狀態漸漸恢復到正常關係。在臨近前線的地區，一切都在軍事狀態中，可以算是例外，但在其餘和運區裏，那些非常狀態卻不能任其長久存在，否則過渡時期將永無已時。

此處所謂非常狀態是指政治的特殊化，經濟的統制及外交情形等而言。關於政治經濟方面，本報已屢經論及，現在因日本外交當局提及中日和約的實踐，又想到和運區裏關於外交的非常狀態，認為要斬

求和約的實踐，需要中日雙方更大的誠意與努力予以解決。

我們往往看到在和運區裏，中日關係的處理，常有因地而異因人而異的現象，而且交涉的對手，日方除外交機關之外尙有許多並行的機關，以致線索紛歧，責任不專一。這種地方，就需要糾正。在首都，在上海一帶，是一種情形，在其他和運區，又是另一種情形，但既同屬中國的地帶，日本對中國主權的尊重，即不應有所分別，何況是同屬和運區，更不應授人以絲毫特殊化的口實。再就因人而言，中國方面才識不能無參差，日本方面態度亦不能無參差，但在交涉上頭，一方既為代表中國，一方既為代表日本，即應以尊重對方國家之精神尊重對方之人員，無論中國方面，日本方面，上下的態度必須一致，各部份的誠意必須貫澈，而避免各自為政，且或因此而各利用對方之弱點。至於交涉之應由外交機關以外交手續辦理，尤為恢復中日正常關係之起點。除前線地帶以及與軍事直接有關事件以外，所有關於中日間各項問題，均應根據近衛聲明與懿電，國府還都宣言，中日和約之原則，用外交方式求解決，統一而有系統。蓋所謂戰爭狀態雖尙繼續存在，但仍應就事態之所許而力謀正常關係之恢復者，即是要把許多工作從軍事的範圍劃歸到外交的範圍。

本多大使對中日現行關係具有極深刻之認識，前次渠在京都之演說，提出履行條約以充實此過渡期間，以結束此過渡期間之見解，引起中國方面之興趣與欽佩，今渠於返任之始，即召開全華總領事會議，以求貫澈渠之此種見解，中國方面自應以同樣之熱誠與更大之努力，共同合作，而在全面和平到來之前，首先把和平運動區域做成和平區域。

「我對於日本國民的希望」書後

今年是和平條約的實行年，因而今年乃是和平運動的成敗年。和平運動的成敗，關鍵不在共產黨，不在重慶，也不在英美，而在和平運動的能不能嚴正。要能够嚴正纔能够親善。

陳公博先生在日本改造雜誌發表的論文「我對於日本國民的希望」，是我們大家要說的話。陳先生在論文中說：「（一）在政治上，和日本的三黨會談；（二）必須現在就停止對日特殊化；（三）反對不平等條約，（四）和平運動阵营中信仗日本人的勢力而存在的不肯分子應當清除。這四點也就是中國人的真正要求。

誠如陳先生所說：「我以為中日之間尚存在着一部份的戰爭狀態，基於軍事上的理由，當然對於締結的條約不能盡如理想的順利解決，但是我以為與軍事不發生直接關係者亦復很多，如能實行迅速的解決，當亦可使軍事獲迅速的終結。」在國民新聞的社論中，有一次我曾經說過：「我們不能等待戰爭行為結束之後纔來實行條約，卻是要現在就來實行條約，而以此促成戰爭行為之結束。」我並且說過：「雖然戰爭行為仍然存在，可是鐵路還是應當即刻交還，現行經濟統制還是應當即刻廢止，而與日方另訂臨時協定，以顧全日方在過渡時期之合理要求。」其中如經濟統制，說是為了防止物資流入抗戰區，那也只宜行之於和平運動區與抗戰區的交界地帶，不應當行之於和平運動區的。說是同時為了物資可以供

給軍用，這乃是一種徵發，德國雖行之於法國，日本卻不應行之於中國的，因為法國的是淪陷區，中國的是和平運動區，法國政府至今沒有撤回巴黎，我們的政府卻已還都南京，這就是說日本不應當再拿對付佔領區的方法來對付我們。至今日本人在報章雜誌上還是用「佔領區」的名詞，我以為這種錯誤不止是文字上的。

講到地方特殊化，尤其是致軍事毫無關係的。為什麼要這樣子，連到「華北」對「華中」的輸出入都當作第三國看待，如陳先生所說的「北方的資源不能流通於中部，上海的資源不能在揚子江流域流通」，而且，這還不過是說的經濟。我們從近衛聲明，從中日和約，從無論那一方面，都找不出有許可這種現象存在的理由。沒有理由的事情應當取締。

其他如長江的封鎖，應當開放，不開放給英美，也應當開放給中國，何況長江是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即令戰爭行為尚繼續存在，也不是沒有合理的過渡辦法可循。再如對於糧食問題，軍票問題，都應當另訂辦法。在解決糧食問題當中，有一個原則，就是日本不應有絲毫徵發的意味；在解決軍票與中儲貨幣的關係當中，也有一個原則，就是日本不應有絲毫徵發的意味。中國雖然是後進國，然而中國人民在這些地方是十分明白，而且斷然堅持的。因為在中國地面上的事情，總須以中國的利益為主，這是和平的前提，就是和約當中也是這樣規定：「關於前項資源之利用，考慮中華民國之需要，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的予日本國及日本臣民以充分之便利。」這裏就說得明明白白，首先是中華民國自身的需要。

要解決中日戰爭，就應當如此，也只有如此。

陳先生的說話，使人感奮，也有使人感慨的地方。他說：「我的說話，或者太嫌率直，在中國不爲

若干人所喜。」日本人還沒有不喜，而若干中國人先已不喜起來，這若干媚日分子實在是比抗戰分子更其阻礙中日和平的。陳先生接着說：「或者日本的若干人士不喜歡我的說話，亦未可知，但是一念中國的前途，一念中日兩國的前途，我不禁忘却了自己，代表着一般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士，大聲疾呼。」日本人河本泰三，於其「評陳公博氏之見解」一文中，謂「陳公博氏之參加國府，有如屈原之正直，而無屈原之消極。」本來，從發表懿電，追隨汪主席的和平運動同志，多數是懷着這種孤臣孽子的心理而來的，和平運動的聲音就是中華民族的聲音，是如同洪鐘，響徹十分，是如同獅子吼，不作囁嚅情話的；陳先生的「大聲疾呼」就是這樣。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六日

和平的進度與歸結

閒時想起有一回幾個人在一道，說蔣的抗戰是拖，我們的做法又是什麼？陶希聖說道，我們的做法是熬，要把和平運動熬煉成熟，話是說得很好，可是我有一點感想，覺得做和平運動是愈素樸愈好，有時候因為解釋現實找到了太好的詞句，反會把現實的嚴肅性沖淡了的。我自己三年來關於和平運動的理論的發揚，也是綺語太多，覺得說老實話負責任的修養還是不够。

政治便是鬥爭，和平運動不能例外，而鬥爭又是最現實的。革命所要求的，是把宮庭鬥爭化為議會

鬥爭，把議會鬥爭化爲會場外街道上的鬥爭。和平運動的前半段就是這樣子的。起先是汪先生在黃山對蔣個人爭執和戰問題，隨後是把和戰問題提出於中常會最高國防會議，又隨後是發表懿電。懿電以來，召開六全大會，並且從民衆當中組織武裝隊伍，都是這一鬭爭的發展。對蔣的鬭爭如此，對日本的交涉，當時也是當作這一革命運動的本體來看，不當作普通外交來辦理，所以每次都通知重慶，並且訴之於國人的。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是劃時期的鬭爭陣地的建立。陣地是進攻的根據，但同時有其守勢的一面。政府機關本來是被運用的工具，但亦有其自身的重量，自身的動律，和平運動者要爭取的一着，就是運用這政府機關，而不被這政府機關的重量所壓倒，不被這政府機關的自動律所挾捲以去。

這等地方，頂要緊的是去盡綺語，在野時的綺語與朝時的官話，和平運動的莊嚴並不是靠這來維持的。在目前，應當切實把握和平運動已有的進度。抗戰是已經落了第，重慶在等待日美戰爭給它補考的機會；和平運動的成績呢，也還是要經過一場考試纔見分曉。馬淵說的中日問題的解決有待於太平洋問題的解決，這話有他的道理，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溫習功課。不過將來寫在榜上的名字，不是和平，也不是抗戰，而是中國，不是和平或抗戰的勝利或失敗，而是中國的勝利或失敗。所以我們應當着眼於包括和平運動區域與抗戰區域的人力物力的愛惜與保存。在中國境內，無論那一處，國人都應當工作，應當生產，應當修補破敗，因爲我們大家只有這一個中國。現在需要一個國民運動，像斐希德告德意志人民書所引起的那樣的國民運動，把抗戰與和平的對立統一起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七日

紀念孔子

紀念孔子，我們想起孔子的一句話：「知恥近乎勇。」

所謂知恥，是對現實不諱飾，所謂勇，是有改造現狀的魄力。

中國現在是在苦難中，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保持民族意識。爲英美而戰，爲蘇俄作前衛，是無恥；丟了英美，另尋主子，而不知道另尋的乃是朋友，也是無恥。

知恥，就是和平運動初起時的一句老話：不左靠蘇俄英美，也不右靠日本。懂得這個，纔有和人家做朋友的資格。

現在是國家以尊嚴第一，政府的尊嚴第二，個人的尊嚴在其末。陳公博先生所說尊重自己尊重對方，是要時時刻刻的國家的尊嚴爲念。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們被罵爲漢奸，我們不以爲意，因爲我們有決不做漢奸的自信。我們只想到國家的尊嚴，沒有想到個人的尊嚴。雖然到了現在，我們還是照樣認爲，如果國家的尊嚴還未能保持，個人的尊嚴是談不到的。

和平運動就是這樣一羣愛國之士創造起來的。所以我們一貫的信條，是說老實話，負責任。說老實話就是知恥，負責任就是勇。

我們的和平運動有三個例子可援，但這三個例子都是不恰當的。第一是蘇台登區和德國一氣，演進而爲捷克之被合併。第二是蘇芬議和，後來芬蘭靠德國之力再打蘇俄。第三是法德停戰，至今法國還只是以停戰保留觀望的機會。

我們的和平運動却並非由於日本的壓力而產生，而且是不用權謀，不存觀望，我們的信條是和日本做朋友。

不過，日本是戰勝國，我們是戰敗國，我們從何取得和日本做朋友的資格呢？這在形勢上，靠的是中國雖然戰敗，但未被征服，在努力上，靠的是我們要能够代表這未被征服的中國。

和平運動並非寄託在宗教的虔誠，它乃是一種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有它自身的規律。和平的保證並不在於現有的事實，而在於潛勢的可能有的事實，即由局部和平斬致全面和平的把握。如果止於局部，和平即爲不成立。

中國人現在那一個不想和平，日本人現在又那一個不想結束戰爭，在這情勢下，全面和平的客觀條件是俱備的，而全面和平之所以至今尚未來到，則一部份的責任要由蔣來負，另一部份的責任却是要由我們來負。

蔣只知有英美蘇俄而不知有中國，是蔣的罪惡。但我們是應當做出一個榜樣，給國人以明白的概念：中國是在我們這裏，不在蔣那裏。在責備對方之後，同時明白自己的責任，這就是知恥，知恥纔有幹的勇氣。

四年之前，汪先生在廬山會議上發表一篇「最後關頭」的文章，指出抗戰是慘痛的，但要忍得住這

慘痛。其後發表贊電，同志間有「戰難和亦不易」的說話，大家都很明白，我們做和平運動本來是抱着忍受和抗戰同樣的慘痛而覓取比抗戰更光明的前途的決心的。悲觀論在抗戰是失敗主義者，在和平運動也一樣是失敗主義者。但是我們也不以定命論來代替悲觀論。我們相信事在人爲。

中日問題的解決在於日本的誠意，但中國的統一則在於我們的努力。首先是我們看日本的做法，有近衛聲明纔有贊電；後來是日本看我們的做法，我們能够代表中國，日本就拿我們當朋友看待，我們不能够代表中國，日本就拿我們當奴才看得，所以汪先生說我們要有罪已精神。

從局部和平入手，並非止於局部和平的意思，却是先來創造和平的模範區以取信於國人。個人的尊嚴是不能取信於國人的，只有國家與政府的尊嚴總能取信於國人。對內的尊嚴是不能取信於國人的，只有在國際地位上的尊嚴纔能取信於國人。英美與蘇俄譏侮我們，軸心國承認我們，我們的榮辱却不在於此，而在於我們能不能自立。

孔子說的話：「知恥近乎勇」，就是教訓我們要認識自己的處境，並且要有苦幹的魄力。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七日

司公刷印書圖閱新民國

承接各項印件

承接
項目

書報雜誌
簿冊單據
有價證券

禮券證書
名片禮帖
中西箋封

股票支票

商標貼頭

本公司經營出版及印刷事業，置有大小各種印刷機器，各體各號之鉛字銅模，單色及複色照相製版機，凡印刷上需要之銅模，鋅版，木版，紙型鉛版，中西文各號銅模，均由專門技師與熟練員工擔任工作，能力雄厚，管理嚴密，信用卓著。除自給自用外，仍有餘力為各界服務。無論大宗或普通印件，均所樂於承接。如蒙惠顧，請向本公司營業科接洽為荷。

設備完善·為各界服務

二七六一九：電話號六二九一路寺安靜海上

蘇俄的地位

保國加入軸心，五十萬德軍長驅入境，東南歐局勢不變。接着來的，當是南斯拉夫加入三國同盟，希臘被迫停戰。英國能否憑藉土國，支撐東南歐半壁，英國的政治家正把希望寄託在蘇俄的態度，他們把蘇俄的地位，看作在東南歐有舉足輕重之勢，而且德英戰爭的勝負，以及太平洋的前途，蘇俄全是決定的因素之一。所以英國對於蘇俄，現在又大肆外交活動。美國也在進行與蘇俄建立友好關係。德國和日本自然也在競爭，日本想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還有日外相行將訪問莫斯科的謠傳。

蘇俄成了各大國爭相拉攏的對象，並非由於蘇俄的國力，乃是由於機會。一年多的歐洲戰爭，三年多的中日戰爭，牽扯住德日各國，消耗了各國的實力，於是蘇俄在對比下強大起來。德國要在戰爭狀態下建設歐洲，除下政治的形勢，在物資方面就有需要蘇俄幫忙的地方。德蘇商務協定公開的部份雖似不足道，但以蘇俄為封鎖的缺口，較之蘇俄所能直接賣給德國的物資當更多。蘇俄可以把自己的製造品賣給德國，而以輸入來做自己的用途，而不觸犯條約。日本的南進，也需要蘇俄的友誼，其中的理由，也有爲了政治的形勢，也有爲了物資方面。

自從德日義三國同盟成立，蘇俄的此種居間地位更被重視。三國同盟成立於去年九月杪，十月間英國即向蘇俄提議取更廣大之政治諒解，據英國外次白特勒今年一月二十日在下院報告，未獲得蘇俄之

明確答覆。但英國仍未絕望，繼續利用土國接近蘇俄，而蘇俄則以此爲要求英國承認其兼吞之領土之機會。

美國爲要保證英國不敗，與爭霸太平洋，也沒有忽略對俄外交。美國已以解除對蘇道德禁運來緩和美蘇關係，更以高等油類及機械供給蘇俄，並在海參威設立美國領館，開辦西雅圖與海參威間的航線。最近即將完成的援助民主國法案，亦未將蘇俄除外，美總統更在紅軍紀念節電賀加里甯，這都是美國竭力討好蘇俄的表示。美國所以如此，一在阻隔蘇俄與德國接近，一在使蘇俄奉制日本南進。所以本年一月間，東京輿論曾指責美國之舉動爲離間日俄，並要求政府與蘇俄樹立新關係。日本現在緩和美國，也可以說是爲了調整對蘇關係的餘裕。日蘇臨時漁業條約已經訂立，這是日本對蘇外交的成功，是英美對蘇外交的失敗。日本正謀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此約成功，將是推動日本南進的重要條件之一。德國與蘇俄的關係，已經成立的有互不侵犯協定與商務條約。最近土保互不侵犯條約成立，蘇俄並不反對。至於德軍入保，蘇俄對保雖有所表示，但其抗議的程度是極輕微的。對俄外交，照情形看，德日的成功比英美的大些。英美只有給予蘇俄以便宜，但蘇俄對德，還是屈從的多，她只好讓德國控制波羅的海，並且還將只好讓德國控制愛琴海與黑海，雖然不大願意，只是蘇俄這種不大願意的樣子，很容易使人上當。土耳其恐怕就要以爲蘇俄對德有所衝突，並且根據這種誤會而貿然參戰。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五日

巴爾幹戰爭的範疇

在進展中的巴爾幹戰爭，我們要恰如其份的確定其意義與限界。

巴爾幹國家沒有像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那樣大的經濟價值，但在戰略上，却是現階段的重點所在。就廣義的戰爭來說，當前的戰爭場面，是必須從德國的對英施行海上反封鎖，與積極建設歐洲大陸的戰時經濟來瞭解，而巴爾幹戰爭則為其補足手段。

義大利的軍事失利，催促了德國，而有德法的交涉，以及和弗朗哥的交換意見，但其結果，却是從巴爾幹下手。德國現在還沒有挽救義大利在北非的失敗的對策，巴爾幹戰爭的任務，只是控制愛琴海與黑海，使義大利在內線作戰的場合可以站得住，使軸心國的戰線可以完整。德國在歐洲大陸進行戰時的建設，是不能讓義大利受威脅的。

巴爾幹戰爭還有它自身的意義。德國是重視羅馬尼亞的經濟價值的。黑海沿岸的羅馬尼亞，有如波羅的海沿岸的瑞典，前者供給德國煤油，後者供給德國銳鐵。現在羅馬尼亞的位置還是處在戰爭的邊緣。德國至少要把戰線推遠到達達尼爾海峽以外去，纔能把羅馬尼亞放在後方，得到掩蔽，如同控制挪威海面把瑞典放在後方安全地帶一樣。

此外，巴爾幹在這次歐戰中的地位，較之她在上次歐戰中的地位，有著不同的意義。上次是，帝俄

與德國爲敵，日本亦與德國爲敵，所以德國在地中海東部的戰爭，只有牽掣的意義。這次却是，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有着打通蘇彝士運河的積極的要求。現在德國固然還不是把巴爾幹戰爭和打通蘇彝士運河當作一個任務，但控制愛琴海與黑海仍然是準備將來打通蘇彝士運河的一着棋子。

就對蘇關係來說，德蘇親善的保證不在於保持兩國邊境的緩衝地帶，而在於消滅這種緩衝地帶。德國過去斷然進兵波蘭，與現在的斷然進兵巴爾幹，就是因爲看到蘇俄的友誼的中立，是太過迫近的德國的槍砲和刺刀作成的。德國自然也可以給與蘇俄一點好處，而蘇俄也就只在這一點好處上頭打點主意。過去分割波蘭就是事實的說明。這次蘇俄對保加利亞送了一紙不够抗議的程度的牒文，而對於不相干的羅馬尼亞却提出了類似最後通牒的要求。蘇俄看到不能阻止德國進兵巴爾幹，已經在打算分沾利益，只是如此罷了。

德義在這方面海陸空軍的配合，佔領愛琴海與黑海將不比佔領波羅的海與挪威海面更難。土耳其在達達尼爾海峽安埋水雷，使想起挪威海面安埋水雷的往事，土耳其的參戰或將比較挪威有用些，但在這裏再沒有法國陸軍與英國的海軍配合，有的只是希臘。

但巴爾幹戰爭仍然只是英德間廣義的戰爭的補足手段。就全局來說，現階段的戰爭的洪流還是在於德國對英國的海上反封鎖，與在歐洲大陸的戰時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的展開，還是在大西洋太平洋與地中海全面的戰鬥，可是這種條件現在未曾具備，巴爾幹戰爭只是爲的奪取一個據點而已。

美國的行動程序與方向

租軍法案的通過，是三國軍事同盟成立以來美國尋求對策的一個總結。羅斯福總統十五日的演說，可研究之點不在於美國之將踏入戰爭，而在於美國將以何種方式踏入戰爭。

演說中對於「援助中國」與「援助英國」平行提出，這是前此所未有的。十七日的消息，英美將共同使用海軍根據地，除了新嘉坡，把直布羅陀也列入。這又是前此所未有的。美國軍艦六艘將訪問新西蘭，同時傳說羅斯福總統將巡視加利比安海英國讓與美國的海軍根據地。

美國是否將平行處理大西洋與太平洋呢？她將把重點放在那裏？她將如何配合兩洋的行動？

第二次世界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地位的發展，與英國的處境不利，較預想的程度更甚。因此，美國的目標已不僅在太平洋，已超過了上次戰後華盛頓會議的遠景。從華盛頓會議到這次戰爭前夕，美國是把太平洋作為政治鬥爭的假想陣地，但對於歐洲，則只在一般的概念上與英國作經濟的鬥爭；國際聯盟她是不參加，其他亦無可建立政治的據點。可是美國現在已衝破了這一制限。對於遠東，美國以前把中國作為她的前哨的，現在把她的前哨推遠到印度了。雖然只是亞細亞雜誌的主編人愛特迦·史諾這樣透露過，但今後既以新嘉坡為陣地，印度之於美國，在地理上較之前此中國之於美國，距離是更短了，而且前此美國只是要拿中國來重新制定對日的勢力關係，現在却是更要拿印度來重新制定對俄的勢力關係了。

。事實是在發展到這一步。對於歐洲，美國的目標也有了一個輪廓；加利比安海被美國所有，直布羅陀的名詞也被提出了。

但美國在大西洋與在太平洋雙軌的發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因為華盛頓會議之後十餘年間美國在太平洋努力的成績，再加上這次中日戰爭英德戰爭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推進，不是這次法國戰敗後纔開始的美國在大西洋的活動所能追趕。美國行動的重點還是在太平洋。美國將在太平洋的據點行動，而在大西洋，則還在援助英國當中去覓取行動的據點。法國戰敗至今不到一年，美國在大西洋獲得的地位，已幾乎等於上次大戰四年之後她在太平洋所獲得的地位，但在這方面還是不能就行動。

美國用軍艦護送英軍火的運輸，雖已有此說法，但不見得就實行。現在英國的軍艦還足夠護航，由美國的軍艦護航是沒有必要，徒使美國的對德不宣而戰被逼到宣戰，這更沒有必要。美國寧願英德在那裏相持，而她的艦隊則略取太平洋。再以後，美國將如何正面處理英德戰爭，現在還不能預測。

太平洋的戰爭，將以新嘉坡為中心，並且與緬甸，印度，以及澳洲的陸戰配合。在這上頭，美國把重慶的抗戰力量也計算進去。但是中國問題要複雜得多，僅從對日的關係來考慮，是不够的，還要考慮到對俄的關係。俄國將不讓重慶和美國的戰略配合，却是時機一到，要把重慶圈作她的附庸。太平洋戰爭一開始，美國的「援助」將不能抵銷俄國對重慶的壓力，於是重慶的命運乃與美國的戰略分離。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九日

蘇俄的處境

巴爾幹戰爭以及松岡之訪問莫斯科，使人重新攷慮蘇俄在外交上的地位。蘇俄之將不能避免參戰，是無可置疑的主題，因為既然是世界規模的戰爭，全世界主要的國家必一一被牽入，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規模的戰爭。值得研究之點是在，蘇俄將站在那一方面參戰？將於何時參戰？這裏，主觀的選擇往往受環境的支配。

一種說法，蘇俄加入軸心較之加入英美方面更為可能，理由是，加入軸心，蘇俄是處在後衛，而加入英美方，則將是處在前線。這種說法現在看來是太簡純。蘇俄如果與德國為敵，固然很有可能慘敗，但徵之上次大戰的經驗，德國要對付蘇俄，也是相當吃力的。蘇俄的力量不能被估計得過高，但也不能被估計得太低。蘇俄畏懼德國的程度，尤其需要有恰當的估計。日德夾攻蘇俄的危險也不可看得太嚴重。因為其時南太平洋戰爭併發，日本在滿蒙邊境對俄採取守勢的可能為多。所以這問題在目前還不是蘇俄外交的決定因素。

蘇俄如果能很順手的遂行其中立漁利的政策，她是寧願中立下去的。但蘇俄有兩種困難：一種是，要有力量纔能中立，要有更大的力量纔能自主的選擇中立與參戰時機，就這一點來說，蘇俄的地位是不及美國，雖然好過法國。蘇俄的中立願望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會被參戰的形勢所迫，不得已而放棄的。另

一困難是，蘇俄的中立漁利，較之美國在上次大戰的中立漁利，成績差得遠。上次大戰美國漁利的條件是：（一）美國自身有高度的生產力，可以應付英國的軍火製造與糧食給養的要求，所以包得下這筆生意；（二）英國給予美國以世界金融市場與殖民地資源的便利，使美國的生產擴張可以活潑進行。這兩個條件現在蘇俄都沒有。

德蘇經濟協定，可以看出德國要求蘇俄幫忙的地方很少，而給予蘇俄的發展機會則更少。這是因為德國這次的戰爭準備，較之上次大戰時英國的準備充實得多，所以不像上次英國臨時求懇美國的供應那樣去懇求蘇俄；而且蘇俄也沒有上次大戰時美國那樣高度的生產力，足以供應德國。

蘇俄的三次五年計劃，都是建築在自給自足的規模上的。事實上第三次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蘇俄經濟已超過原來的規模，而要求世界的基地，然而其時的世界經濟已因各種布洛克而密不通風，這乃是第三次五年計劃之所以不能有興奮的表現的癥結所在。蘇俄現在是一般的渴望着世界殖民地的資源，與世界金融市場的便利。但她不能像德國那樣自己來創造一個。她只能在兩條路之中選擇一條：或者是接受德國所施於歐洲大陸的經濟體制，而成為它的一部份；或者是加入英美，從英美手上得到資源的自由與資金的自由。前一條路，蘇俄現在還不願意；後一條路，蘇俄現在還不敢斷然採取。她只好在兩者之間徘徊。

她在徘徊之際，惟一的希望是不要讓形勢的自然變化過早的塞斷了兩條路之中的任何一條。巴爾幹戰爭之所以引起蘇俄的特利關心，即是因為巴爾幹現在已是蘇俄對英美保持接觸的惟一通路。波羅的海已被關住了，海參威方面又橫梗着日本，如果黑海也被德國圈了去。蘇俄對英美的關係便被隔斷；雖然

還有波斯灣，卻是一切需要從頭做起。所以蘇俄對於巴爾幹戰爭，不能熟視無睹，但又要避免正面刺激德國，這是蘇俄的爲難之處。

日蘇互不侵犯協定還是可能訂立，這裏並不因爲蘇俄對於巴爾幹戰爭稍稍表示對軸心國參差而有何種障礙。但這協定如果訂立，也並不是說蘇俄的徘徊政策已經終結，只是因爲日蘇之間的形勢本已相安無事，不侵犯協定不過是承認現犯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一日

美國的兩洋政策

戰爭現在是以美國的兩洋政策爲中心而旋轉。人們已經可以看到，英美正在重新分配海上勢力，英國可以保有地中海，而在直布羅陀以西與蘇彝士以東，則由美國接防。格林蘭之受美國保護，與新嘉坡之供美國使用，恰好指出了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霸權的移轉。

歐洲的地位，在於它是世界經濟的軸心，因而也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因爲海洋是歐洲的。然而今後的情形，海洋將離歐洲而去（除了地中海），這一世界軸心的移轉不必等到戰爭結束之後纔見之於事實，即在戰爭進行中間亦已見之於事實的，那就是，歐洲之世界軸心的地位正逐漸在戰爭中消失，因而歐洲的戰爭亦正在逐漸消失其在世界戰爭中的決定的意義，等到美國掌握了太平洋與大西洋，歐洲戰場上

的結算如何，將成爲不足重輕。

所以美國在進行接收的，不僅是英國，乃是歐洲。從前是英國的歐洲臨馭全世界；今後則將是美國的美洲臨馭全世界。現在歐洲國家的總生產力雖然大過美國，而且大過連美國在內的美洲，然而海洋如果被美國接收，世界的生產力中心是將隨之而轉移的。德國在歐洲大陸已有遷移產業的計劃，說是要把西歐的工業區與東南歐的農業區對掉位置；美國將來是同樣可以把歐洲與美洲的傳統的經濟地位對掉的。所以這一場戰爭，不僅是英國沒落。而且將是歐洲的沒落。

歐洲的生產力只有在歐洲尙保持其與世界殖民地的傳統的關係時有其意義，可是在這種關係的移轉尙未完成之前，美國是不能讓德國征服歐洲的，因爲此時讓德國征服歐洲是等於讓德國征服世界。事態之進行也正如美國之所期，德國征服地中海的工作還剛在開始，直布羅陀至今安然無恙，而巴爾幹戰爭又距離蘇彝士尙遠。美國只須支持英國，但不必現在就來解決英德戰爭，美國將於五月參戰之說不會是事實，因爲如果說是因爲護航而將有此可能，美國是可以將軍艦交給英國，讓英國自己去護航的。美國如果真的考慮參戰，也將在蘇彝士瀕於陷亂的時候，因爲蘇彝士如果落入軸心國手中，日德義海軍便可取得聯絡，這是美國所要顧忌的。但在目前，支持英國還毋須美國的海軍參戰，而德軍從巴爾幹到蘇彝士的行程則將是屈折的，恐怕不是再過一兩個月就能達到。

在遠東，英美荷的海上聯防工作正在進行，在完成以前，美國不會對日挑戰，而在完成之後，則美國可以反客爲主，等待日本去進攻，也不必對日挑戰。所以南太平洋的戰爭現在來說也還是太早。

歐戰初起，美國事實上說不上兩洋政策，因爲其時美國還只是利用歐戰而在遠東推進，對歐洲是無

可着手。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的地位的制限，即美國在歐洲沒有政治的據點，而美國的世界經濟的陣地又不足以挾制歐洲，這種事實使得美國對歐洲不可能形成一種積極的具體的政策，她所能做的只是向太平洋推進，而向太平洋推進的課題也是只在中日戰爭搖動了英國的遠東霸權之後纔被提出的。直到法國停戰之後，美國纔有機會擬訂她的兩洋政策，而以接收整個世界霸權為主題，於是遠東政策乃成爲這一主題的附屬。在這以前，美國對法國萊諾總理的兩次呼籲不予以理會，人們嘆息美國估計形勢之疏忽以及民主國的動作遲鈍，其實這種嘆息是愚蠢的，因爲只有讓法國崩潰，英國纔肯把世界霸權交出來，給美國去處理。美國並沒有失策。

這次的事情，德軍已深入南斯拉夫，美國還只在宣佈紅海爲非交戰區，還只在援英法案適用於南斯拉夫，人們又在嘆息民主國的動作遲鈍了。其實美國並沒有必要過於着急。現在的形勢是，法國對軸心國尙保持着游離，蘇聯尙在徘徊，尤其是英倫尙屹然存在，戰敗國如荷蘭尙保持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巴爾幹的戰爭尙只觸及了地中海的邊緣，德國不但未曾取得歐洲的海洋背景，即在歐洲大陸的戰時建設成績亦在不確定當中，西班牙就是一個未知數，巴爾幹尙在戰爭中。美國現在階段並沒有比這更多的要求。美國所做的只是延遲歐洲決戰關頭的到來，而以此取得接收歐洲外圍的海洋的充份機會，援英法案的預期效果原是如此。參戰將是不可免的，然而美國現在還沒认识到這一着，她之所以敢於拿言語與某種行動刺激軸心國，只是因爲她明白知道軸心國不致因此就對她挑戰。

日蘇協定以後

日蘇中立協定是否可以比擬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呢？這裏就要考慮德蘇之間的形勢與日蘇之間的形勢的角度如何，並且日蘇之間是否也有一個波蘭。

日蘇的相互顧忌不及德蘇的相互顧忌之甚。蘇俄吃緊的是在歐洲，不在遠東。明興會議妥協之後，德國將以何種壓力加之蘇俄，是克林姆林宮的人物所日夜不安的。這是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被蘇俄看作有重大意義的理由。德國發動戰爭的準備經已完成，所差的只是與蘇俄的關係，這是德蘇互不侵犯協定被德國看作有重大意義的理由。可是在遠東，日本知道德蘇關係在現狀之下，蘇俄是沒有考慮到與日本爲敵的，蘇俄也知道日本要解決「中國事變」，要南進，不能與蘇俄爲敵。所以簽訂中立協定之前，日蘇雙方並沒有大的不安，簽訂中立協定之後，日蘇雙方也沒有衝動的喜悅。而且，現在日本的南進準備不及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當時。地中海東部的戰爭尙未有結果，蘇彝士運河仍爲日本與德義軍事結合的障礙，而且日本在泰越和議上頭的成就還是不够，當法國尙在宣佈不與昔日之戰友爲敵的今日，越南對日本的善意是須嚴格檢視其界限的。所以只是日蘇中立協定，對於太平洋的影響並不那麼嚴重。

至於遠東的波蘭，中國彷彿是。在松岡赴德經過蘇俄時，東京的報紙曾有日本可同意中國境內有蘇維埃地帶存在之語，而中共代表毛澤東又於其時過赴莫斯科，這些，都是使中國人民不安的。然而蘇俄

不能如進兵波蘭那樣進兵中國；她只能指令中共軍隊行動。中共軍隊的力量足以消滅蔣介石，篡奪重慶政權嗎？現在還沒有根據可以作這樣的估計。日蘇中立協定條文相互尊重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邦，所謂蒙古人民共和邦是我們不能承認的，這且不表，只是就這協定來引伸，蘇俄也不過嗾使中共割據西北，將明白表示與重慶政權不合作而已，這是與對付波蘭不能相同的地方。

日來渝方報紙在憂慮蘇俄對華政策是否將改變，在宣傳美蘇關係瀕於決裂。其實，憂慮是不必，宣傳也過於乾急。蘇俄物資援華原來是交給中共軍隊的，交給渝方的也有，只是少些，而且以此為渝共關係的交換條件。今後蘇俄仍然可以宣稱對華政策不變，繼續以物資援助中共軍隊，而在渝共關係明白破裂以前，仍以其中的一部份物資繼續援助重慶，不是為的援助重慶敵對日本，而以之為援助中共應付重慶的微妙手段，這在蘇俄是可以對日本解釋得明白的。

美蘇關係不會因日蘇協定而有何種衝動的啓發。德蘇協定之後，英蘇關係尚且繼續敷衍，何況日蘇協定在白宮的人們並不估計得很高。隨來的日蘇之間的通商協定，不能有大過德蘇通商協定的成就，蘇俄仍有所求於英美的市場，而英美也在以冷靜的態度考慮，對於蘇俄在這場戰爭中尚未確定的地位作聰明的應付。渝方的宣傳，美國並不以為此種考慮的根據。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八日

歐洲戰敗國的命運

歐洲戰敗國有翻身的機會嗎？捷克・波蘭・丹麥・挪威・比利士・荷蘭・南斯拉夫是一類，他們的本土已淪亡，她們的政府有的搬往倫敦。法國又是一類，停戰而未議和，戰敗而未亡國。羅馬尼亞又是一類，雖未戰敗，等於戰敗。所有這些國家，她們的經濟完全落入德國的戰時統制之下，而這種統制，如界將來戰敗國的身份不改變，即使過了戰時，還是會繼續存在，變成經常的制度的。並且，除去國外，她們的行政也在德國的指揮之下。要問她們有沒有翻身的機會，就要問這種制度有沒有取消的日子。

靠英美戰勝，使她們可以復國，是一種說法。但這是賭運氣。而且由於經濟這場戰爭的世界經濟規律的變動，即使是英美勝利，也不能復活戰前殘餘的自由主義，德國今日之所施於戰敗國者，將不為英美所取消，而為英美所繼承。她們可以復國，然而得到的只是極深的半殖民地的身份，還是不能翻身。

靠德國戰勝後建設歐洲新秩序，或能秉和平相處的氣度，使她們可以稍稍伸腰，這又是一種說法。但前面所說的戰後帝國主義經濟之將走到極度的壟斷這一規律，不但限制着英美的寬大待人，同樣的將限制德國的寬大待人。

戰敗國對於這場戰爭的勝敗誰屬，是無可希冀的。那麼，她們將終於沒有翻身的機會嗎？這也不然。

第一次大戰使英國幾乎失去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第二次大戰却製造了許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是不可思議的。戰爭使世界資本主義衰弱，它在經濟上要求更嚴格的壟斷的趨勢，將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要求解放的政治鬥爭所抵消。這是一點。戰後的地圖將不同於戰前的地圖，也將不同於戰時的地圖。將來決不會如羅斯福總統曾經說過的，把世界分成幾個區域，以洲為單位，界限分明，各有一個霸主。將來還是洲與洲之間國家的從屬關係相當錯綜；即使那時候的世界霸權是一元的，也不能把一大羣國家圈住。既然關係相當錯綜，對等的霸主之間或頭等霸主與二等霸主之間的矛盾，還是可以提供弱小國家以爭取解放的助力。上次戰後，英法對土耳其政策不同，英美又對德國的政策不同，而英法美日的忙於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的爭執，則把聯軍討伐蘇聯之舉終於鬆懈下來，這種機會，戰敗國與弱小國家將來一樣可以得到的。這是另一點。再就經濟規律本身來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要求衝破國家的界限，但資本主義之私有財產制度的發展，則要求保持國家的界限。資本主義末期的壟斷與獨佔的趨勢，到了某種程度，終將因觸及私有財產制度的最後一堵牆壁而不能不停止。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使國家的界限消滅，倒是強化這種界限，上次戰後國家經濟主義的勃興，便是說明。現在的趨勢固然是向集團國家經濟主義發展，但也不過是集團，而不能把組成集團的單位消滅，變成一統。既然如此，還是有國家林立的根據。所謂集團的約束，是有它的限度的，正如一國之內的經濟統制，尚且不能澈底打破企業主之間的界限一樣。因此，弱小國家仍然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經濟單位與其獨立性。這又是一點。

以上三點，就是戰敗國將來翻身的支點。至於她們之中那一個國家能够翻身得早些，復興得像樣些，則要看那一個國家的政治家與人民能在目前的艱苦處境之下多保持得一分實力，多保持得一分堂堂的

氣魄，並且知道怎樣去發展鬥爭，以被壓迫者的鬥爭來解放自己，而在帝國主義抗爭之勝負誰屬上頭存希冀之心。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廿五日

悲壯的法蘭西

法國是在苦難中，然而法國是悲壯的。在德國的壓力之下，被佔領地與非佔領地的產業損害是嚴重的；在英美的壓力之下，海外資金的凍結，與海外貿易的被凍結，同樣嚴重的打擊法國的健康。又有特·戈爾，又有拉伐爾，一個在外面進行分裂運動，一個在內裏醞釀政變。然而法國仍然存在，而且她的存在使戰爭在歐洲的場面，以至於在世界的場面，其程序與角度起了顯著的曲折。法國戰敗後的國際地位，仍然不下於蘇俄，或者僅次於蘇俄。

這不僅因為法國還有她的力量，更因為她知道如何處置自己。停戰而不議和。停戰保持了法國的力量，而不議和則使德國的戰果不能確定，保留翻身的機會。

為了保持這個原則，法國忍受英國對其海軍的襲擊，忍受美國凍結其資金的宣告，也忍受德軍在佔領地的控制；可是巧妙的拒絕了任何方面來的過份要求。她拒絕交出軍艦，並且抗議英國封鎖她的海上糧食運輸。她把特·戈爾判罪，也把拉伐爾免職。她拒絕再戰，可是拒絕投降。她只是停戰。停戰後的

法國仍以其尊嚴的身份與英美保持關係，宣佈不與昔日之戰友爲敵，並以其同等尊嚴的身份與德國進行談判，而沒有在談判中迷失自己。她的觀念很簡單：如果和議不能使她得救，她甯願保持停戰以待可救。

她的停戰，是因爲不能不停戰；她的不議和，是因爲她還可以不議和。保持法國的海軍就是保持法國，而保持法國本土陸地上的最後自由，又就是保持她的海軍的自由。她不能讓她的南部也被德國佔領，以致她的海軍不能不離本國而去。然而她也不議和。因爲法國不單是陸上的國家，而且是海上的國家。大陸戰爭的某種確定的結局使她不能不停戰，可是海洋的形勢至今仍在不确定之中，這不确定，使她保留了不議和的自由。因爲法國不同於羅馬尼亞或南斯拉夫，所以拉伐爾不能當權；也因爲國法不同於荷蘭，所以特·戈爾在倫敦不能有動人的活動。

停戰期間法國是在付出鉅大的代價，然而較之繼續戰爭的代價已經是輕微的。如果法國繼續戰爭，也不能就幫同英國得到勝利，至多可以在一個較長的時期保持世界戰局的不確定，而在這周圍形勢的不確定當中保留法國的機會。然而法國所僅能要求的這種不確定，却由停戰而更安全的保住了。德軍在佔領地的控制與軍費徵收，較之因爲繼續戰爭而使法國本土全部淪陷的損失，較之因爲繼續戰爭而每天負擔的鉅額軍費支出，較之因爲繼續戰爭而把國家的產業陸續抵押給美國，總算是可以忍受的。至於法國現在所遭受的海上封鎖的痛若，則繼續抗戰也是不能避免的。

法國的被佔領地至今任其爲被佔領地，但亦因此，至今仍然是法國的被佔領地而不就是德國的領土的一部份。達朗雖然幾次到巴黎談判，然而法國的人民與政治家都知道，在這一場世界戰爭結束以前，

德國之爲戰勝國的身份並沒有確定，而法國的戰敗國的身份也並沒有確定，這時候來談判和議，要找出一個妥協的交點，雙方都很困難的，所以不強求和議。

這種情勢，將來是要變動的，大概到了這一場世界戰爭的後半期，或者就在地中海的海軍決戰之後，法國終將被逼放棄中立。這是不幸。但在現階段，法國的應付環境，是無可訾議的。她是勇敢，並且沉着。

德國的戰略被撓動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二日

繼巴爾幹之後，德國的目標將是近東，抑是直布羅陀，至今仍待考訂。或者希特勒的打算是向西，而結果却走向了東，因爲伊拉克戰事撓動了德國的戰略。

向西的打算，與其說是爲了展開戰線，毋甯是爲了強化作戰主體。德國在歐洲大陸作扇形的軍事展開已有可驚的成績，但至今只是德國單槍匹馬的戰鬥，一切力量都以柏林爲中心而向四面八方放射。戰爭的規模如果更擴大，戰線如果更延長，只靠德國本身是否能舉得起這個重量，這便成了問題。義大利至今不能發揮其威力，法國的力量至今不能被德國利用，而與日本聯合行動目前又未覓得一種方式。至於蘇聯，雖在德蘇協定之外又有日蘇協定，她的向背還是沒有確定。如果德國只知把戰局擴大，而不能

及時調整戰爭力量的主體，前途是可慮的。

進攻直布羅陀，目的不在乎爭此一海峽，而在乎藉此可以改善義大利在地中海的地位，使之成爲德國的真正幫手，並且使法國成爲比較義大利還更有價值的德國的幫手。把德義法三國如此的做成一個戰爭力量的主體，纔可以把戰線再推遠而不至於外強中乾。日來達朗正僕僕於巴黎維希間，且有主張對德妥協之說，此固未可遽信，但德國之意趣則於此可見。法國如果參加軸心，不僅影響地中海的場面，且將直接引起太平洋上的戰爭，因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其時將被英國攻擊，而日本將勢難坐視。故法國於此不能不慎重，何況美國最近頻頻對法國表示好意，又何況德國沒有發現新的方式可以壓迫法國就範。德國現在所能研究者，僅爲是否可以佔領直布羅陀而無須法國之協助？以及是否佔領直布羅陀即能封鎖地中海而把法國關在裏邊，以致法國非加入軸心不可？如果要假道法國纔能到達直布羅陀，又如果佔領直布羅陀而仍不能解決地中海英海軍，則佔領直布羅陀的戰略將被迫放棄，而改向近東發展。

伊拉克的反英戰爭與回教徒的反英運動，阿拉伯與敘利亞的不穩形勢，都不能等待德國從容再建其戰爭機構與外交的修正工作。伊拉克如果被英國壓倒，整個近東將一時的被英國所平定，德國將來再要在這方面策動便不容易。而且英國如果能够鎮伏回教徒的反英運動，土耳其的態度也將受到影響。所以伊拉克的舉動雖然早熟，德國却不能不竭力追趕，與之配合。德國現正繼續佔領愛琴海希臘的島嶼與英國的塞浦拉斯島。後者如果到手，則土耳其與英國勢力的聯接便被切斷，土耳其將被關在裏邊，有如瑞典，而對德國的假道要求屈伏。現在德國駐巴黎代表與達朗的談判，假道敘利亞進兵，當爲其主題之一。可是英國軍隊正步步進逼伊拉克，德國的動作是否來得及呢？土耳其的調停伊拉克戰事，當爲德國

所歡迎，因為藉此可以希望緩兵，但主要的還是要看德國派遣空軍支持伊拉克能否使伊拉克戰事稽延時日？

伊拉克戰事只要能够稽延時日，近東戰爭的嚴重性便將超乎一般人的預料。美國是把近東戰爭看得比直布羅陀更緊要的，因為近東如果被切斷，蘇聯的態度將決定，日本的態度將決定，美國將非以太平洋的安全為己任不可。史汀生之主張護航與諾克斯的贊助護航，其着眼均在於近東戰爭。所以，只要伊拉克的戰事能稽延時間，美國將有可能即在近東的戰場上參戰。

希特勒的打算是向西，然而事實將驅使他向東，這不但有關近東戰爭的如何展開，而且有關將來在世界戰場上德的的最後命運。德國或許可以在近東戰場上勝利，但因戰爭自身軌道的繼續吸引，將使希特勒沒有回到西歐調整戰爭主體的機會，以致義大利仍久久不能發揮其威力，法國仍久久保持其不確定的地位，這於德國將是一個戰略上的遺憾。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九日

近東問題的內延與外延

英伊衝突只是近東問題開展的一個序幕，至於整個近東問題的趨向以及其歸結，我們應該從幾方面加以觀察。在目前無論是英國克服了伊拉克，或是伊拉克能夠有力量把這戰爭拖延下去，近東問題之要

求解決，總之是嚴肅的被提了出來了。

現在我們應該加以注意的，其一是回教民族的解放要求。近東一帶在過去大都是舊土耳其帝國的領土，而由以英法帝國主義的東進，遂使回教民族變成支離破碎的狀態，而處於英法的長期宰制之下。這當然不是回教民族所甘心的，是以他們關於解放運動的醞釀，以及獨立回教國的建立，早已在準備之中。而此時法國已失敗，英國在歐洲的戰爭也著著失敗，這當然是英法控制近東力量最微弱的期間，也就是回教民族實現解放的最適當的時機。因此英國將在近東遭遇的，不僅是與德國以武力相搏戰，同時還有應付回教民族解放要求的困難。

其次，目前仍保持中立地位的蘇聯，其對於近東的態度也極可注意。土耳其是今日唯一的回教獨立國，其對於回教民族的解放要求，不僅是同情，而且予以支持的。將來回教民族解放運動成功後，或建立一个新的回教國，甚或竟併入土耳其，均為有利於蘇聯。至於蘇聯，素有以近東為她的勢力範圍的氣概，而認為是一條南進的大路，不願他人在這方面加以染指。假若德國為促使蘇聯參戰的緣故，不惜付以重大代價，舉近東甚至印度以讓蘇聯，則蘇聯態度的如何決定也大可注意。

其三，美國為阻止日本南進，而不惜於一戰，其所要保全的地方。是新嘉坡，荷印，菲律賓，以及澳洲等地，假若近東以及印度落入他人之手，一旦軸心艦隊出地中海，而以近東與印度為基地，更與日本海軍的南進相呼應，則新嘉坡一帶將陷入夾擊之中，在戰爭形勢上大為不利。同時地中海以西為英海軍的警戒地帶，地中海以東為美海軍的警戒地帶，這也是極自然而且是應有的劃分，而近東則在地中海之東，果真美國重視歐洲戰爭，而要選擇適當時機正式參戰，也許近東戰事擴大後，就是美國參戰的時

機了！

其四，德國的態度依據最近的動態，也許要強邀蘇聯共同合作，以解決近東問題，德蘇合作實現，近東問題更將加速的急激化，自在意料中，據最近的傳聞，蘇土固已表示對於近東問題的注意，而德軍且傳已在敘里亞登陸，而向伊拉克進發了。或者希特勒與史太林之間已經有了什麼諒解？

總之，近東問題是有充分的複雜性，也許可以引起更擴大的世界戰爭，這雖不是我們所願見，可是事態的演變，正指明各方面都按自己的希望，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實力，來有利於己的處理近東問題。事態的發展，有可能使回教與阿拉伯族獨立問題，被世界戰爭的兇餓湮沒，而世界各大交戰國也各自淹沒在近東的搏戰中。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三日

德國控制大西洋

印度洋上德國剽襲艦已被英國擊沉，南太平洋上日本船隻有供給德剽襲艦嫌疑的，也被英國列入「黑冊」之中。地中海上最近沒有什麼海戰，傘兵與飛機運輸之外，只有空軍對軍艦作戰。大西洋上德艦俾斯麥號與英艦霍德號之交鋒，算是沉寂已久的海戰中的新紀錄。自德國斯比上將號自沉以來，海戰就老是在地中海中，現在又在大西洋中再行爆發。

霍德號被擊沉一事的重要，並不在於海軍力量之比較，而在於此事出現的時機，正在美國宣佈格陵蘭為其保護地，冰島在英國支持之下宣布脫離丹麥而獨立，美國正在製造決心將軍需品運抵英倫的輿情，甚或更討論護航與擴大美國海軍巡邏範圍的時候。德國海軍司令賴德也宣布如『美國商船隊運軍火往英，德國海軍即將按國際公法採取對付違禁品之措置，倘欲阻止德艦執行上項權利者，即以武力擊退之』的說話，也使這次海戰具有另一種重要性。

我們知道德國海軍在戰前是難與英國比擬的，歐戰開始以來，德在南美與挪威各損大戰艦一艘，英國除一戰艦以外，損失最多的是驅逐艦與巡洋艦。德國有兩隻戰鬥艦，提爾比茲與俾斯馬克下水，英國亦有喬治五世與威爾斯太子號下水，故在實力上比較起來，現在德國海軍仍難與英國比擬。祇是英國軍艦於應付地中海劇戰以外，尙須作大西洋上廣泛的護航與巡邏工作，遂使實力分散，並且自挪威至法國海岸被德佔領以後，德海軍出入之道不能被阻，所以大西洋上還能時有嚴重的剽襲戰與海戰。各國專家意見，英艦霍德號之所以被擊沉，艦齡，速率，構造技術等等方面的原因或居重要成份。德國新銳戰艦之構造精良與戰術巧妙，自此役中為人承認。不過這一戰鬥中，並不能奠定德國海軍的優勢，更不能當作德國海軍優勢的證明，也是世人應予承認的。在另一方面，我們深信這一次戰鬥，並不是德國有計劃的戰鬥，只是一種遭遇戰，不過德國在遭遇戰中佔得勝利，遂使世人忽視其原因而已。

總之，在過去，英商船損失之重大，證明德空軍，剽襲艦，潛艇之可畏，不過，德潛艇三名將之被擊斃與被俘，也證明英國抵抗能力之強韌，現在，德英海軍的比較，依然是德國較劣，德國對於大西洋，在當前還不能談到控制，而只能有剽襲。空軍對海軍，則又是另一問題。

因此，霍德被擊沉一役的重要性，就在此事出現的時機，與自此所能發生的國際局勢！

英人在霍德沉沒之後，立即宣佈交戰地點是在美國海軍巡邏區域，英國的目的，自然是對美國指示德國已侵及美國的海軍巡邏範圍，同時更指示給美國惟一由美至英的海上航線，已有德國戰艦出現，希望美國出面實踐她的諾言，與實現美國的抱負。

美國的輿論與官方對於此事的表現，現在還是冷靜，儘管已有人呼籲應將美戰鬥艦贈與英國，或則積極護航。不過，無論如何，美國之援英而又避免參戰的政策，將不能不有若干變動，是可以斷言的。賴德的警告，我們不相信會對美國發生正面的效力，賴德言詞弦外之音所表示日本實行三國同盟義務一事，也容許還有時間上的疑問。

美國軍事工業之發展，國防編制之擴充，雖已猛進到參戰的程度，輿論雖也離參戰不遠，不過就美國援英佔美國軍事工業生產能力之比重看來，霍德沉沒一役，還只能使美國各方面更向參戰前進，但還未到「立即參戰」的程度，他還要出新的花樣。所以德國希望由日本出來牽制美國一事，在短期中，或者竟不能有什麼機緣。

霍德號之沉沒，證明了德國海軍的若干優點，但是也證明了她依然還不能控制大西洋。德國要想控制大西洋，於空軍以外，她還應有先擊潰英海軍，次擊潰美海軍的實力與準備。可是時間之神，是否能輕易的允許此事出現呢？德國結束歐戰的計劃，現在既不能在地中海中完成，短期中也不能在大西洋中完成。德國成功的機會或許還在於克里特戰爭完成以後，利用其大量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與五萬餘滑翔運輸機，更加上現有的海軍與船運來對英倫登陸作戰。別的戰爭，只能延滯歐戰的結束，而不能

結束牠。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八日

羅斯福總統的演說

昨晨羅斯福總統的演說，平淡無奇，連護航都沒有提出，這是為什麼緣故？

原來羅斯福總統將發表演說的預告，早在好幾天之前，那時候，伊拉克的戰事還未見分曉，克里特島的戰事也使美國一時摸不着頭腦，接着英艦霍特號又被德艦所擊沉，這種種，使美國對於歐戰的現階段戰略的觀察，發生動搖，所以說是要發表演說了。然而幾天之後，戰場上的事情明朗了起來，羅斯福總統以其海軍專家的見識，覺得自相驚擾是多餘的，還是預定的步驟沒有錯，祇因爲已經點了戰，所以沒有什麼可說，也不得不說一說。這就是這次演說等於一張白紙的緣故。

原來美國的預定計劃是要等到英國不能支持的時候纔參戰，因爲要這樣纔能以參戰接收大英帝國的霸權，而不是以參戰去維持大英帝國的霸權。英國要到什麼時候纔不能支持呢？美國是刻刻注視着的。英國至今沒有發出類似萊諾的最後呼籲，美國很知道這一點。可是最近半個多月來，德國進兵敘利亞，並且用空軍參加伊拉克作戰，華盛頓方面的觀察家便突然感到頭腦混亂起來，他們對於戰局的誇大估計，至於擔心紅海會被切斷。因此白宮慌慌忙忙的宣佈紅海爲非戰爭區域，美國可以在這方面採取援英的

自由行動。德法談判，尤其使美國神經過敏，以爲法國將參加軸心軍事同盟了。再過幾天，德軍進攻克里特島，美國對於德國空軍是否可以代替運兵船與運兵火車這個問題，不免惴惴過慮。再過幾天，英艦霍特號被擊沉，更使美國懷疑大西洋上英德的優勢是否已經倒掉了轉來。有此數點，所以羅斯福總統要發表談話。

如果法國參加了軸心國軍事同盟，則美國對於大西洋的法屬達卡島與太平洋的法屬海軍根據地，將表示態度。如果德國的「空中列車」果然能無遺憾的運輸軍隊，則美國對於地理的觀念將隨之修正，行動的步驟也要重新定過，重新表示。又如果德國果然控制了大西洋，則美國將表示其參戰的決心。

可是幾天之後，事情統統明白過來了。伊拉克的戰事，德國終於不能挽救。克里特島的戰事，德國雖佔優勢，但已可以看出德國的空軍在失去其與陸軍的配合的場合，並不能起決定的作用。運兵至克里特島，還是靠希臘的漁船，而且，就是這一點，也只因爲克里特島是希臘陸地的距離很近，纔能辦到。德艦俾斯麥號之被擊沉，更證明德國在大西洋上的地位還只能打打游擊戰。德國沒有遠距離的戰鬥機可以與海軍配合，以至於坐視俾斯麥號之被英機追擊，而不能相救。再加上達朗的演說，聲明法國還沒有加入軸心國軍事同盟，關於敘利亞與德國的諒解，其意義不過如越南之與日本的諒解。

戰爭現已進入第二階段。前一階段是以歐洲大陸爲戰場，德國的多年準備工作都以此爲範圍。因其如此，所以德國的空軍只是與陸軍配合，短距離就夠。海軍的作用，也只限於游擊與剽襲，作爲大陸上戰爭的補助手段而已。現在戰爭越出了歐洲大陸，這種武器的配備與兵力的編製，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上就顯出了弱點。要補救這弱點，須從頭改造過。至少在目前相當長的一個期間內，德國還不能有驚人的

動作，兩洋的現狀還不至於動搖。美國還可以不必慌亂。

如此，羅斯福總統的演說，修正而又修正，等到發表出來，便成爲沒有內容。事實是美國多戰現在還太早，連護航都還太早。

蘇聯的新評價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九日

蘇聯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自開始直至受德羅芬的攻擊止，可以說是一個天之驕子，而處於獨特的優異地位。這種地位的造成，無疑的是由於背離了英法蘇三國對德包圍的陣線，單獨的和德妥協，促成了德意與英法的戰爭，以使德國戰於前，自己則乘於後，這樣遂瓜分了波蘭，佔據了波羅的海各小國，收回了貝薩拉比亞，和布柯維亞。同時在她的希望中，也許還要等待德國苦戰疲弱之後，歐陸失去了支持的中心，再來席捲一切。但是在事實上這種夢想並不能實現，反使德國能在歐陸實施各別擊破的戰略，而在控制北歐，擊平法比，掃蕩巴爾幹之後，再來從容對付蘇聯。大概已滿佔便宜的今日蘇聯，當已深悔未能在德軍酣戰於法比國境的時候，斷然施行夾擊了。

再蘇聯在歐洲所施用的詭謀，同樣也在東方試探過，這就是與日本訂立中立條約，她的用意也無非是想促起日美戰爭，以便再來一次的從中取利。可是這種希望也是未能實現，其所促成者反爲自己對德

的戰爭。

蘇聯所採取的策略，就是自己不戰，而使世界的列強互戰，在別人戰爭中，自己得點小便宜，等到交戰的國家兩敗俱傷的時候，蘇聯更可以舉其全力，以奪取最大的利益。換句話說就是用不戰，以爭取最後的極大勝利。蘇聯懷抱着這樣的詭謀，假若各交戰國彼此酣戰不已，則誰也不敢斷定蘇聯不能實現她的計劃。因此遂不免令人感覺到，列強的拼命奮戰，也許正是爲蘇聯製造機會與地位。大戰結束後的世界制霸者，也許不是德美，而是蘇聯，最低限度蘇聯也必能平分春色。而現在因受德軍進攻，事實上已適得其反。

若以蘇聯國土面積的廣大，以及人口物資而論，在將來當然是一個可以有發展的國家。不過以現狀論，文化程度，工業生產，國民精神，武力設備等，種種的落後，使蘇聯在歐洲仍不能與法國相比，法國戰敗還可一降而爲二三等國家，假若蘇聯突處逆境，其結果必將更較法國爲悲慘。土地廣大，物資豐富，也正如過去的土耳其帝國，適爲焚身之資，也正如中國古語所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且罪必不赦。

現在德蘇戰爭既起，蘇聯已由順境而轉入逆境，將來的結果如何，當極爲可慮。誠然，德國與對蘇戰爭以外，仍有強敵英美的存在，且由於同一對德作戰的關係，將來英美蘇軍事同盟也有形成可能。但是英美的援助，是不是對蘇有若何的幫助，也還是疑問。若以過去的事實來說，英法荷比的聯軍，且不能當德軍的一擊，則蘇聯即有英軍甚至美軍的援助，也未必有戰勝的希望。加以德軍的進攻，一定是很猛烈的閃電式的突擊，美國固在國防工業尚未充分完成以前，不能派遣軍隊，即英軍能參加作戰，也

恐怕是緩不濟急。

當然，蘇聯由於土地廣大的緣故，我們不能夠說可以如法國和巴爾幹一樣，能在極短的期間使戰爭迅速結束，不過其重要的土地均已失去以後，雖能以游擊戰或消耗戰繼續的僵持，那對於前途命運的轉移，也沒有多大的作用。若我們再用悲觀的推測，物資豐富的地方既已失去，前線的軍隊且受了猛烈的打擊，則戰爭延長到了相當時期，蘇聯的內部也可以發生革命的。也許戰爭末一階段的發展，乃是政治而不是軍事，蘇聯也將以四分五裂的瓜分狀態，而使社會主義共和國告最終的結束。

蘇聯的東方，雖因日蘇中立條約的關係，暫時可不至於有變化。可是等到締約的政府也不能存在的時候！這種條約也自然失去了效用，則東方可能化生的變化，也不是我們所能預測的。

總之，蘇聯現在所處的地位，即作有利的推測，也決不能若過去一樣的可重視，至於蘇聯對自己的期待，那更是夢想。蓋現在蘇聯已擔負着對德作戰的艱苦工作，其結果即不至於死，也將不免於傷，換句話說，就是即不至於覆亡，也不能免於殘破。若更作不利的推測，則前途當不堪設想了。

蘇聯原想製造他人的戰爭，以逃避自己的戰爭，並從中取利，而現在戰爭終於跑到自己的頭上來了。這是因為蘇聯在德英美之間原來是一個弱者，戰爭的壓力是極易於加到弱者的身上，其被犧牲乃屬當然，而蘇聯反要投機取巧，豈不是咎由自取。

德蘇戰爭之展開

德蘇戰爭本來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德國已佔領歐洲大陸，但戰爭並不就此完了，這裏的問題就是，德國將如何確立其大陸的主體，以與英美的海洋對抗？在英美則為如何覓取陸上的戰場，以保持與德國之接觸？這個答案便是德蘇戰爭。

就德國現在佔領歐洲的範圍，不足以言建設。歐洲是無可守的，如果是大陸與海洋僵持，則佔優勢者毋寧是英美。在這一點上，德國要求加緊戰爭，乃更甚於英美。在英美，以是可却有一個時期讓海洋與大陸分離，等到後來纔在陸上與德國決戰。如此，我們可以想像這次是德國攻蘇的主動成份，較多於英美嗾使蘇聯抗戰的成份。但德蘇戰爭一經開始，則英美援蘇乃分內事，因蘇聯已成爲英美對德戰爭之惟一陸上軍事據點之故。

由此可知戰爭就是素樸的打仗，封鎖與轟炸都只是補助，而在戰爭中建設，以此使戰爭成爲經常的東西，這種想像到底難於存在。更由此可知德國此次對蘇要求，已非基於補助戰時建設之商務協定之類，而爲戰爭行爲本身之擴大，即要求蘇聯參加軸心作戰。此種要求不施之於對法，而施之於對蘇，是由於法國所能助德者在海上，不在陸上，而德國現在還要保留海上戰爭。德國與殘敗之法國談判尙能寬容，而對强大之蘇聯竟不惜決裂者以此。蘇聯可以讓步，但讓步有一定限度，蘇聯國勢究非羅馬尼亞可

比，牠終於接受挑戰了。牠也不比南斯拉夫或希臘，南斯拉夫與希臘是事前得到英美撐腰纔出之一戰的，而蘇聯與英美的新結合則在對德戰爭開始之後。

德蘇戰爭是如此的開始了，牠將有怎樣的結果呢？又將有怎樣的影響呢？

德國可以戰勝，但將遭遇與波蘭戰爭以來不同之形勢。東線不見得有馬奇諾防線，紅軍的戰鬥力不見得強過英法聯軍，但因已往之經驗，紅軍或將採取迂迴作戰策略，以此避免主力之嚴重損失。蘇聯地域之廣大，於作戰上將仍為一可注意之因素。由此可以想像德蘇戰爭將陷於長期，或竟延長到英美對德以蘇聯為陸上決戰之戰場的時候。

日本此時將如何呢？牠不能進攻蘇聯，因為陸軍在中國境內被牽制着，又因為海上要戒備美國，並且日本進攻蘇聯，無異是日美戰爭的信號，日本不能以對德蘇戰爭中立為緩和對美關係之交換條件，毋甯是日美危機將因德蘇戰爭而更趨於嚴重。美國非通過日本不能援蘇，且此時日本又未能與德義之軍事行動結合，有此二點，美國將以為此乃要求日本決定態度的時候。如果如此，則日美關係在短期間內將有相當的發展。

日本面此危機，只有從中國能够得到援助。我們說過中日兩國軍事外交一致，現在已事到臨頭，我們希望中日雙方，尤其是日本方面，能深刻瞭解這幾句話的意義。德蘇戰爭將增加中日戰爭結束之困難，因為渝共衝突將因英美與蘇俄之雙方勸告而緩和，渝方與蘇聯將結成新關係，更因此新關係而挾英美重新估計渝方在世界戰爭中之地位。但此並不足慮，我們所應考慮者乃為如何強化和平運動。日本對此亟應下絕大決心，將和平運動區域之政治經濟主權完全交還國民政府，並切實協助國民政府建設國防軍

。除與渝方相持前線地帶以外，所有鐵道航運及其他交通事業，一概交還，所有軍管理產業一概交還，所有軍附屬機關之職權一概撤消；因為非如此不能強化國民政府，因為非有健全之國民政府不能結束中日戰爭，不能幫助日本應付世界事變。日本現在不能膠着於中日戰爭，她要應付全世界，此理甚明。中日兩國有識有爲之士，當知此時此際正東亞之轉向關頭，短見與懦怯，貪小利而忘大謀，至此受現實之鞭撻，亟宜反省，亟宜斷然實踐和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六日

日閣改組

日本內閣頃又進行改組，這是爲了適應國際的新局勢；經此改組，對內對外政策將趨於強化。也可以說，這次改組是受了德蘇戰爭的影響。

日本現在對德蘇戰爭是中立，對美國是避免刺激。這是被稱爲獨自邁進的外交政策的。但周遭形勢的進展，已使日方感覺此種獨自邁進的外交政策，怒落到被動的地位。德國對日本有何種要求，不得不而知，但蘇俄已宣佈海參崴口外之日本海爲危險區，引起了日本的不安。南洋方面，美海軍在馬尼刺與蘇聯比沃兩海灣敷設水雷，又引起了日本的不安。日本的靜態的外交，至此乃需要修正，光是自主的外交不够，卻是需要自動的外交。

有人說日本無力北進，又說日本專力南進，無暇北進，此爲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的原因，並且此種中立將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繼續維持，這是膚淺之見。證以已往日本利用德法戰爭向越南邁進，可知日本此次未必不思利用德蘇戰爭重新處置對海參崴一帶的關係。將來美日如果一旦衝突，海參崴一帶即成爲日本的後方，非現在就來安排妥當不可。蘇俄今正節節敗退，日本勢將把握此時機。

雖說日本專力於南進，但同時北進，亦並不發生衝突。這有兩點理由：第一點，日美如果在南太平洋發生衝突，因新嘉坡一帶之港灣紛歧，吃水又淺，不宜於作主力的決戰，而演爲長期的封鎖，潛艇戰與飛機轟炸，這種慢性的戰爭，並非逼在旦夕之間就非傾全力一擲不可，故日本仍有餘裕，並可分出一部份兵力來穩定日本海的後方。第二點，對付海參崴一帶並不需要大規模的陸軍，因而受中日戰爭的牽掣亦不多。解決海參崴一帶之後，日本亦不再進攻，蘇俄亦不擬在這裏構成大規模的東線戰爭，結局是在這一帶的戰線僵化，而日本則利用此僵化以爲守勢，此於日本之專力南進，並不致形成兩面受敵的情形。

以北進來輔佐南進，在南進之前先來穩定後方，這是基於事實的需要。正當一塊鐵燒紅的時候，你就須捶擊，德蘇戰爭的現狀，正是日本捶擊的時候。

松岡洋右的辭職，意味着日蘇中立協定有修正的可能。
對美方面，南太平洋危機之遲遲未發，與其是由於日本的慎重，毋寧是由於日美關係的進展律本身是慢性的。因此，日本的容忍與慎重，只是於美國有利。對於一觸即發的危機，慎重從事，是爲的可以選擇於己有利的爆發時機，但對於慢性的危機，則慎重只是給予對方以準備的充份的餘裕與自由。日本

並不希望日美戰爭爆發，更不希望提早爆發的時機。但現在的慎重在有些地方只是束縛自己的手足，這却是要予以某種修正的。

與此強化對外政策有關的，是同時強化對內政策。近衛內閣任內，兩大黨雖已取消，但大政翼賛會仍未能成爲國民的政治運動，而變爲一種精神運動。經濟方面，亦未能達到強力的國家統制，而交由財閥去自行統制。凡此都有待於強化，此亦爲內閣改組之一原因。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十八日

日本新閣的外交

日本外交，現在是技術的問題，不是方針的問題。近衛新閣登台，方針仍舊，然而要求着活潑的運用，由靜止的觀望走到行動的外交。

近衛公爵說過，德軍不能越過烏拉山，這是說日德義在西伯利亞會師，是不可能的。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亦即根據此事實。雖然如此，可是日本仍須自主的運用德蘇戰爭的形勢。對於蘇俄的濱海省，日本需要辦一個交涉，防止美蘇之間任何有足以威脅日本海的默契，以爲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的代價。現在日本已對蘇俄的宣佈日本海爲危險區域提出抗議，這較之過去兩國間關於漁權問權的交涉，是具有更複雜的內容的，而較之過去日本對法屬越南的交涉，則可以說是有某種類似之點。日本不願意把外交

重心放在日本海，卻是重心仍然在於南太平洋。但日本對蘇俄，總之是也要交涉交涉。豐田就任外相之後，這方面大概可以活潑起來。

南太平洋方面，芳澤在荷印的談判，因德蘇戰爭爆發而不得要領。荷印既非唾手可得，越南在目前便成爲可以積極經營的惟一對象。法國在敘利亞的失敗，使日本認爲在越南可以找出法國的新的弱點。因此，對越南的交涉，在豐田外相手上，將有新的展開。

但這裏存在着一個限制，即前閣定下來的方針不變。日本今後對蘇俄關於濱海省的交涉，不能走得過遠，以至於根本搖動其對德蘇戰爭保持中立的決策。對法屬越南的交涉，也不能走得過遠，以至於違反預定的時機而訴之武力。豐田外相的任務的艱鉅與需要慎重，也就在此。

蘇俄不比法國，一來因爲蘇俄尙未至法國的戰敗程度，二來因爲英美對蘇俄的關係和對法國的關係不同，關於濱海省的交涉，這就比過去關於越南的交涉要困難些。至於越南問題，今後的交涉大概也要比較已往的交涉更複雜些。已往英美之坐視日越交涉，並非因爲對法關係冷淡之故，倒是因爲英美在這方面的形勢準備，尙未成熟之故。現在雖然還是說不上成熟，可是今後英美對於日越交涉，或者會有某種程度的干涉。

前任松岡外相的外交，本來已經是戰爭前夕的外交，正當着着進行之際，卻突然來了德蘇戰爭。日本當時是極力鎮靜，定出的中立政策是對的，然而一般日本國民感覺當局是被環境的變動所懾住了。原來也是，鎮靜並非徒然觀望之謂，大國的中立更非畏禍之謂，日本國民對德蘇戰爭的震驚一過去之後，就要求從消極的中立走到積極的運用中立，不再徒然觀望，而在鎮靜與慎重中重新繼續原來的外交的步

子。這是近衛內閣改組的原因，而改組以後的行動表現，也就此可以想像。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越南問題的發展

日本在南太平洋不能用閃電戰，從這一點，可以推測日本的戰略是步步為營的推進，穩紮穩打，而對方面英美的反應，也是慢性的。把握這一點，再把某些別的因素加入考慮，就可以討論越南問題的發展。

南太平洋之所以不會有閃電戰出現，一來因為陸軍的機械化部隊的新配備，與隨此新配備俱來的新戰術，以此造成與敵方戰鬥力的差度，在海軍方面可是至今沒有這種跡象；二來因為新加坡一帶的自然地理不適宜於大規模的主力決戰，亦即不具備中央突破的條件。故戰爭若在此處發生，自始即呈現其為長期戰；故雙方的戰前準備，都不厭過於完密。

日本之從法國手上經營越南，獨美國之從英國手上經營荷印，雙方都需要時間，羅斯福總統於其解釋過去之外交政策時稱：「倘美國不以油售予日本，則日本必於一年前進犯荷印。」日本也一樣。日本幾次聲明對荷印擬以政治方式解決，不擬訴諸武力，就是因為不願意荷印洋面上的戰爭過早發生。

至今南太平洋的行動程序，仍視雙方的準備程度而定，德蘇戰爭與此尚無直接關係。日本還沒有解

決越泰問題，而美國則雖已從英國取得共同使用荷印之權利，亦尚在充實此權利。越南之價值，在作戰上不在經濟上，日本雖得越南，於衝破英美之遠距離經濟封鎖，意義甚少，而其在作戰上之價值亦限於防衛方面，僅此不足以言荷印即已受到被進攻之威脅。如此，當前英美對越南問題的干涉，似將着重在斷絕對日經濟關係，並運用對法外交，使日本在越南之所得不能圓滿。倘若貿然以戰爭來阻止，則就當前的形勢來說，只有驅使法國在越南復述其在敘利亞之決心，此非英美之利。

倘若太平洋戰爭竟因越南問題而爆發，則這裏的關鍵只有從法國身上的找。法國初未加入軸心，只願抱殘守缺，採取被動的自衛手段，但自停戰以來，在此種被動的自衛手段之下，其在海外的殖民地幾乎已喪失殆盡，海軍亦遭嚴重損折。但法國的此種中立政策，迄今未予放棄。此次法國對日本在越南問題上的妥協，意義亦只等於她的處理敘利亞問題，因為對德停戰協定中，法國固已承認在敘利亞予德國以軍事上的便利，而在越南予日本以軍事上的便利。這裏就要看英美現在對越南和不久以前對敘利亞的策略有什麼不同。

人們可以推測，在今後一段時間內，英美對法外交可能有積極的活動。這原因，一半是在德蘇戰爭的形勢，一半是在越南問題本身。德蘇戰爭已呈現長期戰爭的跡象，德國閃電戰略一面作戰的原則今後恐難繼續如此，對方的新戰略已在逐漸形成，即以多邊作戰來應付一面作戰，以幾個大單位的分散作戰來應付中央突破。蘇俄境內的戰線是一個單位，敘利亞及中東一帶英國已準備好另一個單位，這個單位或者還會包括土耳其在內，此外，在歐陸西面，英國也仍在覓取另一作戰單位。在建立後一作戰單位上，法國的地位有她特殊的價值。當英美如今正在鼓動西班牙與葡萄牙之際，說是放棄了法國，未免不合

情理。大概英美如今正在設法把法國找回來，雖然剛剛因為敘利亞問題破過臉。怎樣把法國找回來？利用特戈爾是一種方式，和貝當政府妥協也不失為另一種方式。如果德國的威脅力量被牽制在東方，不能解脫，而英美給予貝當政府以法殖民帝國的担保，則法國的態度將很值得研究。或者越南問題就是英美對法國作這種活動的開端，也未可知。英國可以佔領敘利亞，可是越南的情形不同，如果法日妥協，英美是不能以戰爭來阻止日本的深入越南的。如果走相反的路，法國和日本衝突起來，則英美將發動戰爭以為呼應。

可是，照已有的資料來看，越南問題現階段的發展最可能是停止於不澈底的解決，僅僅較之上次日越談判的結果更推進一步而已。貝當元首雖有同意日本保衛越南的談話，但同時說明讓步程度不超過停戰協定之義務。這樣，日本的推進還是存在着某種界限。至於另一方面，英義對法國的外交活動，企圖把法國重新拉回來，則在目前時機似乎還太早，至少也要等到兩個月之後如果德國不能佔領莫斯科列寧格勒與烏克蘭，或者佔領之後仍然不能解決東線的戰爭，德國的弱點與困難因此而明白顯露之後。但在如今法國是不敢輕易投機的。這法越南問題可以是英美企圖與法國妥協的開端，但也不過是開端而已，距離結果尚遠。如此，則越南問題還有第三次發生的可能，不至於經過了這一次以後的問題就不再是越南而直截了當的轉入荷印。至於英美方面這次的反響，則將不過是對日禁運；掛在諾克斯的嘴上的對日戰爭不見得就會因此而爆發。

可注意的法國動態

法國的若干報紙近來不斷催促政府表明立場，甚至要求改組內閣，與德國斷然結合，而以此挽救法國的海外殖民地。這種論調反映法國的海外殖民地的繼續喪損，已引起法國內部的深刻不安，但不能視為此種論調可以代表法國的趨向。

法國是在海上，故喪失殖民地的嚴重性，不亞於其在陸上的馬奇諾防線之被突破與巴黎之淪陷，或更過之。當初法國與德國締結停戰協定，是希望剩下來的陸上的半壁國土，加上完整的殖民地，仍然可以保持法國的本然，比較遷都摩洛哥，繼續對德戰爭要合算。這種做法，困難當然有，比方說喪失了工商業中心的北部領土之後，法本國對於其殖民地，作為領袖壘壘的資格即起動搖。但如果沒有英美的壓迫，則這種困難還不至於使法帝國潰散。法國本土的命運是握在德國手中，而其海外殖民地的命運則操在英美手中。法國如果放棄中立，而在英美與軸心國之間作一選擇，不是可以輕率從事的。

現在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一部份已經喪失，另一部份又正在喪失中。如果殖民地離法國而去，則法國將不復存在。這樣子下去，她的中立，是否較之荷蘭為失算呢？可是，法國現在還無須做這樣的比較；她還可以再中立一個時期。

法國的資格是雙重的。德國是看在她的殖民地的份上，怕她的殖民地加入英美，所以和她停戰。英

美則看重她的本土，因為法本土至今不失為歐洲大陸上的一個重要據點。所以法國處在軸心國與英美之間，是以她的殖民地來取證她的本土的存在資格，同時以她的本土來取證她的殖民地的存在資格。然而德國的担保只能給予法本土，能給予法國的殖民地以担保者，則只有英美；越南除外。但法國自停戰之日起，英美即在掠取法國的殖民地，只是避免對法國宣戰而已。避免對法國宣戰，是怕法國會因此被驅入軸心國集團；而以局部問題與地方事件的方式掠取法國的殖民地，則是深知法國也同樣在避免對英美宣戰。英海軍曾局部打擊法海軍，造成法海軍的嚴重損折，又曾在敘利亞互相戰鬥，然而法國至今保持對英美與軸心的戰爭的不介入政策，即如此次法日關於越南的協定，也沒有超出這範圍。

法國的殖民地雖遭英美宰割，但這種宰割，至今還是不確定的。所以不確定的緣故，是因為英美尙在希圖留給法國以重新投奔英美的後路。也因為這種不確定，德國纔至今不敢輕視法國。德國的心目中還有法國的海軍，而英美的心目中則除了法國的海軍外，還有法本土在大陸軍事據點中的地位。這也是法國之所以在英美與軸心國間仍能有徘徊的餘裕。

法國現在有避免與英美決裂，同時也避免加入軸心國的理由。德國的同盟國義大利，處於目前的時機，都在地中海保持沉靜，法國當然需要比義大利還更沉靜，避免與英美決裂。若說法國或將掉轉頭來看看軸心國的弱點，則此種弱點也尙未顯著，何況英美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活動尙未成熟，法國而以其本土供英美再建西戰場之用，現在就來及慮這一着，是未免過早。

如此，法國因為喪失殖民地而引起的嚴重影響，在目前雖有可能釀成闊潮，但不至於走到政變。即使現闊因此而改組，法國的外交方針將不會就此發生根本變動。卻是要到英美蘇對軸心國的戰爭形勢，

勝負的迹象相當顯著之後，纔是法國放棄中立選擇去就的時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卅日

資金凍結後的局勢

近衛三次組閣之初，我們即已指出日本的外交將由觀望到行動，而其對象則為越南與海參崴，但並不就此走到戰爭。現在事實的發展也正是如此。

因越南問題而引起的資金凍結與反凍結，趨向是嚴重的，但仍有其現階段的限界。現在雙方的凍結都還留有空隙，這就值得研究。我們說過，太平洋的戰爭將是慢性的，決勝不在於開戰時的先發制人，而在於開戰後的長期實力較量，因此雙方都在努力於發動戰爭前夕的一段餘裕時間來做準備工作。英美的凍結中日資金，其目前的任務僅為阻撓日本的準備工作程序，使英美自己的準備工作可以趕在前頭而不是驅使日本即刻訴之戰爭，因為日本如果被逼而即刻作戰，則英美進行準備工作的餘裕也就沒有了。所以凍結資金，是備戰的鬥爭，不是備戰的終結。有人因為看到資金凍結而猜測戰爭就要爆發，又有人因為看到資金凍結的留有空隙而猜測戰爭的危機就此可以緩和，都是錯誤的。

凍結資金之舉不能阻止日法關於越南的協定的成立，但對於剛在開始的泰國問題與海參崴問題則有顯著的緩和作用，這在英美看來，可以說是越南問題告一段落後的亡羊補牢之計。日本並非不知道這一

層，但日本仍須珍惜發動戰爭前夕的這千金一刻的餘裕。她對英美資金施行反凍結，是以同樣的謹慎在避免刺激。英美雖然用凍結中日資金來警告日本將加於泰國與海參崴的強烈外交行動，日本也因此不能不稍稍收斂，但日本的去路並不因此就被遮斷，她還是在小心的前進。進得一分算一分。她之所以還在避免刺激英美，就是爲此。不過要明白，她對泰國與海參崴的要求是沉潛下去了，但並非就此撤消了這種要求。

就泰國問題來說，前幾天越南問題尚在積極進展的當時，即已喧傳日本對泰國將有要求，現在卻不大談起了。這不僅是因爲凍結資金纔使她不能不更謹慎，還因爲泰國問題的性質與越南問題的不同。泰國在陸上不能不感覺日本的力量，但同時她在海上不能不感覺英美的力量。這兩種力量現在對於泰國還是平衡的，所以泰國還可以再中立一個時期。

英美對於泰國是勢在必爭，和對越南不同。因爲泰國現在已成爲緬甸與越南之間的惟一隔絕體，而且從泰國可以深入馬來半島，直接危及新加坡。所以日本倘若對泰國行使武力，將等於太平洋戰爭的全面發動，當日本還沒有發動全面戰爭的決心時，她是不會走這一着的；何況對泰國如果行使武力，是要通過越南或以越南爲據點，而日本在越南的現有成就，也還不够。

如此，我們可以想像日泰關係的發展是很慎重的，而日泰之間訂立程度輕於越南的某種友好協定，則有可能。

關於海參崴，合衆社有日本要求以海參崴爲非武裝地域的消息，但這問題也不會有惡性的劇變。日本對德蘇戰爭中立，而要求蘇俄保證不和美國進行任何足以危害日本的軍事合作，這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日本仍願以外交方式來處理這一問題。有人以日本在華北調兵這一類未能證實的消息，和關於日本北進的猜測難湊在一起來觀察日蘇問題，那是太隨便。

至於上海租界，資金凍結的影響在這裏有最尖銳的反應，並且循此趨向發展，將歸結而為取消租界的存在資格。但在目前，上海市場尚能在凍結與反凍結的空隙中保留若干國際貿易的機能，任何方面都不想把租界問題就此作一斷然的解決。大概租界現狀還可以繼續維持到幾個月之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

從何測量日美關係？

因美國之實施禁油輸日，使人不能不重新攷察日美間戰爭危機之進行程序。前幾天英美於凍結中日資金之後，曾表示願望日本與之妥協，其真實意義是企圖藉此緩和日本對泰國之活動。現在實現禁油，證明此種企圖已歸失敗，而日本仍在按照其既定的步驟沉着進行。泰國問題一天比一天緊張，此外還有海參崴問題。

日美間戰爭危機的爆發點，究竟從何去測量呢？有下列兩個假設。

一個假設是，美國在集中注意於德蘇德英戰爭，而日本則在繼續觀望德蘇德英戰爭。倘若德國戰勝，日美戰爭即為不可避免，倘若德國戰敗，日美戰爭可不致發生。如此，則日美戰爭是或然而非必然，

而日美關係的決定關頭的來到，不會在德蘇德英戰爭的勝負局勢顯著化之前。

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因為無論德國戰勝戰敗，日本的東亞共榮圈卻已是無可伸縮的東西。許多人把東亞共榮圈只看做尙屬一種理想，理想是可以伸縮的，卻不知道與東亞共榮圈不可分離的中日問題乃是一個極嚴肅的現實，現實是無可伸縮的；日本如果放棄共榮圈，便等於放棄五年來對華戰爭的結果。又因為日美間戰爭危機本身的發展，有可能不及等待德蘇德英戰爭的勝負局勢顯著化而先已走到了爆發點。

另一個假設，美國雖並不希望於德國戰敗之後不戰而屈日本之兵，但仍在努力於延遲對日戰爭的爆發時機，而以此取得順利的援英援蘇的餘裕。除蘇俄境內的戰線以外，英美正在進行重建第二戰線於西歐，並佈置第三戰線於近東。美國要利用安靜的太平洋以運輸物資。倘若日美開戰，則太平洋日潛艇之活動將較甚於德潛艇在大西洋之活動。美國雖明知終將有這樣的一天，但甚願這一天不至於很快就來到。日本要延緩對美戰爭的爆發，以充實對美戰爭的準備，而美國要延緩對日戰爭的爆發，則除爲了充實在南太平洋的軍事準備，還更爲了顧到在歐洲戰場上的佈置。如此，日美間戰爭危機的爆發點，大概還可以有較長時期的延宕。

這個假設卻是只有一半真理，因爲日美雙方願望延緩戰爭的爆發時機是一件事，而戰爭危機本身的動律則是另一件事。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將仍取決於泰國問題，而非取決於歐洲戰場上的佈置程度。太平洋的危機與歐洲的戰爭是息息相關的，但兩者仍各有其自己的範疇。

泰國問題比較海參崴問題更有決定的意義，理由是，無論泰國或海參崴，日本如果對之行使武力，

都可以構成日美戰爭的導火線，不過海參崴問題現時還不妨保留，而泰國問題則需要先發制人，倘若因泰國問題而促成戰爭，日本再去佔領海參崴，仍屬未遲，但倘若因海參崴問題而促成戰爭，日本再去佔領泰國，那就要困難得多。所以人們可以想像，日本對海參崴雖在進行準備，但現時不過是準備而已，而對於泰國，則已在開始走入行動的階段。這是基於日本爭取共榮圈的決心，也由於技術上的法則如此。

法國政變的動律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四日

法國內閣的改組是意味着政體的變革。這變革雖由於外交形勢而起，但其現有表現，卻是對內的意義多於對外。因為對外尙未能斷然的明朗化，對內的意義也就尙有其界限，所以還不過是政變的開端。為什麼說這次內閣改組是意味着政體的變革呢？從貝當的演詞，及其宣佈的十二項新政，可以看得出來。貝當的演詞指出法國數世紀以來的民主政體，須整個予以摧毀；而其宣佈的十二項新政則為澈底根絕議會之殘餘，強化警察之彈壓權力。這就不是普通的內閣改組，而是政體的變革。

促成這變革的外交形勢，由於最近德國與英美對維希的外交競爭的影響卻是較小，即與其說是由於剛在燃着的達加問題而起，毋寧說是由於維希對敘利亞與越南的措置予國人以失敗的感覺而起。無論是

德國或英美，現在都還沒有直接壓迫維希的力量，維希的中立地位至今未有根本的撼動，卻是國人的壓力使維希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應付。而這所謂國人的壓力，倒不是淪陷區報紙要求改組政府的強化親德運動，乃是非淪陷區法本土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的潛在滋長。

維希目前還沒有放棄中立的必要，但為彈壓親英美派的抬頭，而以此保持與親德派的平衡，原意不過如此，但在對親英美派鬥爭當中，維希而與親德派有其結合，卻是極自然的現象。可是此種結合仍有其限界。貝當的演詞中雖亦採用歐洲新秩序的名詞，並且指出法國對德義關係將求進一步的穩定，同時卻聲稱即使議和亦仍當以停戰協定之精神為依歸，亦即不因此不影響法國的原來中立地位。法國駐美大使亨利海對此有所解釋，謂貝當元首之演詞，自始至終，並無任何語句可以假定法國將以艦隊或殖民地交於德國。這倒是實在的，所以說，這次變革的對內意義是多於對外的意義。

也因為是這樣，所以這次的政變不過是開端。除非法國是斷然的親德或親英美，政變是沒有辦法澈底的。維希的反對派至今仍有其國際形勢的背景，而且此種背景又正在發展中。在法國本土還容易控制，可是問題在於殖民地。魏剛不同意現行對外政策的變動之說是否可靠，這且不說，但倘若英美在海上優勢一經確立，而且影響到陸上戰局的時候，法屬殖民地的動向就只能靠達朗的海軍來監視了。

法國的政變是開端了，既然開了端，一定還要發展下去，尤其是因為反對派並未因此完結，倒因爲英美與軸心的對立之局尚在激盪中而仍有其滋長的機會。爲繼續強化鎮壓反動，維希必繼續強化其與反對派對立的立場，而因此繼續強化與親德勢力的結合。這都是極自然的事。達朗現在既已成爲維希的事實上的代表，即其命運已與維希的鬥爭方向不可分離，雖說現在並無以艦隊與殖民地交與德國之意，

但在達朗統率下的法國海軍，將漸漸偏向德國，是可以想像的。現在法國外來的壓力還是平衡的，所以內政變革的重量對於外交具有某種影響的作用，但在不遠的將來，這外交形勢的平衡起了變化，而至於一面倒，則外交決定內政的作用還是會大於內政影響外交的作用的。那時候將另有一次決絕的政變，或者是確立斷然親德的政權，或者是反對派抬頭，法國海軍離達朗而去。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五日

美國參戰的序幕

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的會晤及其結果，是很可玩味的，歐洲戰局的新開展與太平洋危機的總爆發，都以此為關鍵。

在此以前，英國曾數次聲明其作戰目的，美國曾數次表示其對未來世界的理想。她們都反納粹，都說是為了自由；但有一點不同，即英國所說的是人權的自由，而美國所說的則是國際貿易的自由。英國因為壟斷世界殖民地，所以只要打倒納粹就算，美國卻是苦於缺乏世界殖民地，所以不但要打倒納粹，還要解除英國的壟斷。

可是在這次共同宣言裏，美國的見解被英國接受，而取得一致了。這種一致，是什麼形勢促成的呢？是歐戰的現狀與太平洋危機的現狀。

德俄相持於東方，給予英國以佈置第二戰線的機會。但問題在於，還不能由英國獨力佈置，而且要佈置的也不只是第二戰線。事實卻是，除在近東建立陣地外，還打算在西線登陸，並且進逼挪威方面。這在兵力上，在外交上，都非英國單獨所能勝任。英國的兵力大概可以在近東建立陣地，但光是這一處陣地，還是不能有把握解救蘇俄的潰敗，因為在蘇俄境內與在近東同時對德戰爭，也不能比擬上次大戰時東西兩戰線之堅強，雖然可以比較這次大戰初期英法荷比聯軍之配合為優。過去法國的潰敗，是英國的困難，但並非就是美國的困難，但這次蘇俄如果潰敗，則不僅是英國的困難，而也是美國的困難。羅斯福總統關於共同宣言的談話，說他與邱吉爾所擬定的計劃，是以蘇俄能支持戰爭至來春這一假定為前提，這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到明年春天這一段期間之內，必須實現近東作戰，西線登陸，與進逼挪威這幾個方面的動作。這樣大規模的作戰配備，只有英美合力纔可以辦到；可能是美國的海軍將用於太平洋，而美國的陸軍則將用於歐陸。並且也只有美國表示與英國採取同樣斷然的態度，纔能在外交上以相當的優勢影響土耳其，法國，與波羅的海中立國家的去就。

因為是這樣，所以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先要有一一次的會晤，商量條件，決定戰略。

在太平洋方面，日美危機已在接近尖端。美日如果作戰，即與英德俄德戰爭不可分離，這一形勢，也逼得美國非和英國就世界戰爭的全局作一會商不可。上次威爾遜總統宣佈十四點宣言之後隨即參戰，而這一次的共同宣言之後如果不是隨即參戰，但已更走近參戰則無疑義。羅斯福總統對這一點的否認，不過是外交辭令。

在此以前，美國的租軍法案與凍結資金都不過是臨時的應付，而在共同宣言之後，則將繼租軍法案

而聯合作戰，繼凍結資金而沒收資金。九月是危險的關頭，頂過也不能捱過來春。正義都是假的，戰爭卻是現實。

勵 法 國 人 民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十八日

讀了貝當元首對法國人民的幾次演說，真有無限感慨。法國的處境是十分困難的，但法國決不致就此沒有翻身之日。這就在於法國人民知道如何沉着忍痛，渡過世界戰爭的危險關頭。

法國到此地步，決不能存投機之心。一部份人想重新加入英美，另一部份人又想加入軸心，這都是對世界戰爭的形勢的觀察太過輕率，等於賭徒隨便下注。無論如何，法國此時應當保留最後一張牌。

法國現在要的是保存實力，保持得一分算一分。法國人民，在國際的壓力下，在不自由的環境中，仍舊應當作工，仍舊應當種田，仍舊應當教書，做生意。只要法國人不滅絕，而且法國的文字尙能存在，則雖然遭受層層折磨，法國必有翻身之一日。

法國的人民是英勇的，他們知道戰鬥，但在這種環境則應知道退却。在戰場上，爲了保存實力，軍隊的有計劃的退却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也一樣。法國現在需要對英美退却，也需要對軸心國退却，而法國也正在這樣做。最先是法國兵艦忍受英國的打擊，這打擊是使人憤慨，並且是嚴重的，然而法國忍受

了。因為忍受，所以還能至今保存若干海軍力量。美國乘人之危，掠奪法國在西半球的海軍根據地，英國則更掠奪敘利亞，法國也都忍受了。因為忍受，而不輕易對英美決裂，所以至今法國還能保存其中立地位的運用；至今無論是軸心國，是英美，都還不能不重視法國的去就輕重。對軸心國，法國也一樣的退却。幾次對德國的談判，以及在越南問題上對日本的妥協，法國都讓步。讓步不難，難是難在讓步而不致毀損其中立地位；法國在這些地方都做得很好。

依照法國的處境，假使不是這樣沉着有操守，早已對英美宣戰不止一次了，或者早已對德國又重新打仗了。倘若如此，將不會還有今天的法國。今天的法國的殘破不全，但這殘破不全的法國仍然是法國人民惟一可貴，並且是惟一可愛的對象。法國人民要懂得保存她。最近貝當元首勵行強力政治，又因為對德談判繼續有所讓步的緣故，法國人民，尤其是淪陷區的法國人民，不無反抗的動作，但這種動作如果不是爲的保持中立，而是爲的反德，則應予以改正。法國現在是只能作退卻戰，對無論那一方面都是如此。

世界戰爭的形勢現在並沒有定局，法國現在失去了的東西，有的是給英美搶去，有的是在軸心國手中，都還是不確定的，却是要到世界戰爭的總結算中去找補。法國保持中立，就是保持將來找補的資格。現在雖然困苦，慘痛，但只要留得青山在，法蘭西共和國終有翻身之日的。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念五日

美國的理想與現實

美國人現在似乎是坐在大砲背後講天方夜譚，大討論其戰後的世界。戰後的世界距離現在尚遠，但亦即此可以看出美國人的心事。

這次大戰與上次大戰不同，因而有名的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已不適用於今日。威爾遜總統時代的美國只是想分沾世界霸權，羅斯福總統時代的美國則打算的是接受整個世界霸權。上次大戰是要分割國際自由市場，這次大戰則是要修正國際自由市場。希特勒的一擊，已使美國的政治家與若干資產階級的學者明白毛病是出在資本主義自身，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對國家的界限的搏鬥。

上次大戰，被認為只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搏鬥，所以想出國際聯盟的辦法，這當然無效。但當現在明白了這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的生產力對國家的界限的搏鬥的時候，問題便牽涉到了資本主義的法則的修正。Russell W. Davenport 在八月號「幸運」雜誌上發表「如此這般可以勝利」一文，建議成立一羣國家的集團，比國際聯盟更為緊密而比美利堅合衆國聯邦則為寬鬆的國際組織，說是這樣子可以打破國家的界限所加於經濟與科學的自由發展的束縛。但這其實也只是上次大戰後法國內閣總理白里安的歐洲聯邦計劃的引伸而已。白里安的計劃，當時有托洛斯基的歐洲蘇維埃聯邦的口號與之對抗，就事實來說，是兩者都沒有做到，不過於此可以知道美國人所想像的世界聯邦乃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

這種近似玄學的討論，在於專講現實的美國人應當是不發生興趣的，可是這玄學的討論的背後却有著美國人的素樸的要求，這要求就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英鎊集團國家從英國霸權的支配之下解放出來，而置之於美國霸權的支配之下。這就是美國人的海洋自由的解釋。

這裏有可注意者二點。其一，羅斯福總統已不像威爾遜總統那樣強調民族自決；其二，國際聯盟在威爾遜總統時代對於美國是多餘的東西，但在如今，則美國要求比國際聯盟走得更遠的國際聯邦。美國不但繼承英國，同時還繼承納粹德國。英國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為剝削對象，而以次等先進國家為其經紀人，納粹德國則一切求之於次等先進國家。美國所要做的，就是接收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以國際聯邦或類似國際聯邦的方式加強對次等先進國家的支配，更甚於英國之所為。英國的國際聯盟是政治的支配方式，而美國現在所要求的國際聯邦那樣的東西則是經濟的支配方式。從上次大戰之後到現在，所有應時而起的制度，如同殖民地經濟布洛克，英鎊集團國家經濟布洛克，經濟國家主義，乃至於夷次等先進國為殖民地的種種政策，到了美國手上，並不會取消，却是將加以整理，使之更系統化而已。

這一遠景，在目前並非沒有現實的意義。以這一遠景為依據，羅斯福總統正在製作他的圖案，要把英國，俄國，法國，中國，以至於德義日本，安排在適當的位置。這種安排的設計，在目前就表現在美國與英國合作與俄國合作與渝方合作條件上，而且表現在美國與軸心國敵對的程序上。從這裏去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對於美國參戰的條件與程序的瞭解。

羅斯福演說後的相關事態

羅斯福的演說已於三天前發表了，我們從跟着發生的幾種相關事態來和羅斯福的演詞比看，可以提供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在羅氏演說後半小時，美林白發表極強硬的反參戰演說，謂：「全國現有三種團體正驅使美國參戰，此三團體即英人，猶太人，及羅斯福政府是也。」（見國際社十二日華盛頓電）還有一位吳德將軍，一位參議員華爾，也都在指責羅氏，說這種挑撥美國人民加入戰爭的企圖，將予以摒棄。（見路透社同日紐約電）可見今日美國反對參戰的還大有人在，美國一般人民怕還不大明白他們的大總統為什麼要這樣氣惱，儘管羅斯福把西半球說得如何危險。只有少數銀行家，製造商，尤其是那些軍火製造商心下明白。羅氏演詞中有一句話是老實的：「海洋在納粹控制之下，凡美國或任何美洲共和國之商船，除仰鼻息於此外國專制權力外，不復能由經營任何和平之商業矣」。這就可見支配美國的政策的便是這些資本家，他們現在考慮的只是時機問題。

第二，羅氏宣稱，今後對於軸心國的艦艇如發現其有威脅美船之跡象時，將首先射擊。據傳已有美艦三百艘出動於大西洋面。但在羅氏演說十二小時前，却又有一艘美國貨船「蒙太那號」在赴冰島途中被擊沉。另一方面，德國在北大西洋又把英國護航艦隊四十二艘擊沉二十艘，說是答覆羅斯福總統「首

先射擊」的宣言的。（見國際社十三日柏林電）那末，羅斯福的「首先射擊」宣言以及三日艘軍艦在大西洋搜索，嚇得了希特勒嗎？希特勒不響，先對英護航隊發了一下狠，反給羅斯福一個警告。但這個警告擋得住從紐芬蘭，哈勒法開出去的船隻嗎？羅斯福却已下了決心，要不惜任何犧牲去維護他的海洋自由。從這一事態看，羅斯福此後必更加緊其援英援蘇行動，而希特勒也必更加緊對這一援助路線的打擊。

第三，羅氏指德國潛艇襲擊美船爲欲「以暴力控制海洋之行動」，而美國的軍艦貨船行駛大西洋等海面，以軍火物資輸送交戰國之一方，則謂係海洋自由，而其防衛區域，據赫爾解釋且可擴大範圍至七大海洋。德方則謂羅氏故意捏造事實，以便誘致其人民向軸心國作戰，德國將被迫採取一切必要之步驟。義相喉舌蓋達且撰文明宣稱，軸心國之海軍無他，惟有於察見美國海軍軍艦時予以攻擊而已。我們對這一事作的是非責任，都不想加以判斷。每一國家對別國所採行的手段，只問於其本國是否最有利益，表面上的爭是爭非，不過是騙騙人的。我們只從這事態的本身看，却可以知道從格里埃號事件以後到羅斯福演說發表及德國官方的聲明，已從德美在海面上直接衝突進一步到雙方明白宣佈今後各要爭取先發制人的便宜。雙方敵對態度已越明朗，雙方在海面上的衝突已不能不擴大，但要說這就是戰爭，時間恐還不許說得這樣確切。再我們對於羅氏的海洋自由權，也有點懷疑。羅氏已一再明白宣布要盡量把軍火，借款，及物資援助民主陣線各國以消滅軸心勢力，且早已公開作實際行動，所以一般人的意見都認爲美國事實上已等於參戰。實在，她的舉動，我們也想像不出是一個局外中立國家。美船在海洋上自由航行，裝的却是供給交戰國之一方的軍火及其他違禁品，這與普通商船似乎不同吧。美國自己有一個

中立法案，主要點是禁止美國商船在交戰區域活動。現在羅斯福似乎應得首先把這個中立法案再修改一下，或者索心取銷也好，然後再對敵國潛艇「首先射擊」。

我們摘取了羅氏演說後，所發生的相關事態，來和羅氏演詞參看，不妨下一個斷語：羅氏這次演說，僅止於使德美敵對態度的明朗化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五日

美國的動態與中立法

赫爾要求修改中立法，諾克斯要求廢止中立法，這種要求意味着什麼呢？它的歸趨如何呢？

美國的中立法原來是用以對內，不是用以對外，中立法的特點，是美國和交戰國的買賣仍然要做，而且交戰地帶是可以由美國承認或者否認的。就對外而言，中立法作成美國的地位是中立，不是孤立，她可以寓政治的干預甚至參戰的初期動作於其和交戰國做買賣的當中。可是，對外保持美國干預參戰的自由，不過是中立法的特點之一，其另一特點，是對內保持美國政府決定干預步驟及參戰時機的自由。在現款自進的條件之下許可軍火輸出，可以卸脫美國政府對其人民的責任，使美國軍火商人不能因為對外債權或運輸船被擊沉而要求政府出面，以致混亂政府的原定計劃，而為早熟的干預或參戰。所以，美國的中立法，在其實施的初期是抵擋孤立派的一面盾牌，以中立法對孤立派保證美國不至於參戰，而在

其實施的後期，則成爲抵擋主戰派的一面盾牌，使主戰派沒有法律根據可以壓迫政府提前參戰的時機的決定。

以此而言，諾克斯所稱「吾人與中立法爲戲之時已過去」，與路透社所傳美國國會似已發生廢止中立法之運動，不見得對，因爲美國在決定參戰前一小時，中立法的運用還是於美國政府有益無損的。雖然如此，可是我們可以想像，美國的政情正在醞釀一種變化。以前與政府對立的是孤立派，孤立派曾經大不滿意於中立法，現在孤立派的鬥爭已經過去，倒是主戰派在那裏大不滿意於中立了。廢止中立法的運動是不會得成功，但美國內部如今正在以參戰的時機爲鬥爭的主題，卻是實在的情形。

這一鬥爭，赫爾與諾克斯可以代表兩方面，諾克斯一派主張提早參戰，所以主張廢止中立法，赫爾一派認爲參戰尚有所待，故以修改中立法來保在中立法，以修改中立法，這一折衷方案來打銷廢止中立法運動，這是一面。

在另一面，美國實施護航，是靠美國宣佈護航區域並非交戰地帶，這纔不至於抵觸中立法。但隨戰爭之發展，將使美國的軍火運輸不能不深入真正的交戰地帶，而且由於英國船隻的繼續損折，將使美國不能不動用自己的船隻，這與中立法由貿易對手方自運的規定便不能不有抵觸了。中立法的規定，不但不是「自運」，而且要「現款」，可是英蘇等國事實上拿不出如許現款，美國因此有租賃軍火的辦法，在字義上，租賃與借貸多少有點不同，就靠這一點來勉強解釋與中立法無抵觸。但租軍法案仍有其一定的範圍，過去是以超過年齡的兵艦之類租給英國，而英國則以讓渡其殖民地的某種政治軍事經濟權益以爲酬謝，今後美國租賃的品類將不能不有所改變，而且租賃的報酬辦法亦不能不有所改變，現在正由第一

期租軍到第二期租軍的過渡中，這裏邊又得重新尋求避免與中立法抵觸的解釋。而且今後除租軍以外，美國因為踏入了參戰的準備階段，不能不以自己的手來使用自己的武器，在有等地方進行事前的佈置，這又是需要一種新的法律上的解釋的。

我們看到新租軍案將於兩星期後成立的消息，可以想像在這兩星期當中美國內部正在作一種政治上的準備，以此為中心，廢止中立法與修改中立法的兩說反映出當前美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範疇。照我們的推測，或者是從新的租軍法案本身找到了新的解釋，可以與中立法不發生抵觸，這樣就無須修改中立法，或者是修改中立法以適應新的租軍法案，但也只是修改而不是廢止。中立法是終有一天要廢止的，但決不會是現在。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廿五日

西方戰局的推移

德國進攻蘇俄，預言六星期可以結束戰事，現在已需要訂正，說勝利終將屬於德國，不過是時間問題了。勝利終將誰屬的答案不妨放後，但就是這個時間問題關係重大，已發展而為戰略與戰局的變化。近東方面，非洲西北岸與挪威北部的動態，正是這一發展的說明。

此前德國擊破英法荷比聯軍，靠的是迅速。因為迅速，使敵人來不及自動破壞物資，所以能够就地給養，不待運輸；因為迅速，所以能够遂行一面作戰，各個擊破敵人。這迅速就是閃電戰的特點，其戰

術的配備是機械化部隊，其戰略是中央突破。

德蘇戰爭的情形可是不同。在戰術的配備上，蘇俄是不及德國，但在戰略上蘇俄已有重要的修正，她以單位作戰應付中央突破。因為戰術上的配備不及德國，所以蘇俄不能不敗退，但關鍵却在於，倘然是蘇俄雖不能勝而猶能敗，即足使德國不能確立戰果。前此英法荷比聯軍是不能勝，併不能敗，敗而至於潰不成軍。德國的是運動戰，聯軍卻固執於陣地戰，到了不能支持的時候，也就連撤退的餘裕都沒有了。蘇俄不是這樣子。她也作陣地戰，但無論如何保留着撤退的餘裕，與撤退時處理物資的餘裕。德軍雖仍能突破越過，但沿途分兵包圍，曠日持久，且有數處被反包圍。德軍主力的一路直衝，因此而稍稍減削，且其進軍速度不能不受運輸給養的限制。

如果只是德蘇戰爭，說勝利終將屬於德國，不過是時間問題，這話是對的。可是英美正在利用此時間佈置新戰場，在近東，在非洲西北岸，在挪威北部。

德國不能等待對蘇戰事結束再來爭取近東，有如過去於結束西線戰事之後纔解決巴爾幹。德國在西線掠獲之石油，適足以支付西線之消耗，此次對俄却不能不動用德國自己所儲蓄的石油。石油的來源，在德國是長期戰爭的保證，而近東則是石油的庫藏。英國已控制伊拉克與敘利亞，更在進圖伊朗，德國倘若至此猶無表示，則伊朗且將屈伏於英。所以現在德國對俄軍事已側重南路，北路中路僅希望切斷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間的鐵路以為僵持，而并力爭取近東。但從烏克蘭打倒伊朗，固不如假道土耳其直達伊朗，而德軍的南路攻勢便是與土耳其問題有關，或者土耳其問題的發動已不在遠。

非洲方面德國進兵摩洛哥與爭取達加的消息尙待證實，倘有其事，亦並非德國主動的選擇戰場，而

是被動的應戰。至今對法國與對西班牙葡萄牙的外交活動，德國與英美都還在競爭中，或者到了德軍與英美軍已在達加接觸，展開戰鬥的時候，法西葡三國仍然保持着中立。德國要顧慮因為壓迫這三國而將這三國驅入英美陣營，所以假道的要求不見得堅持，而毋寧通過義大利渡海運兵至摩洛哥，再由摩洛哥前進。合衆社所傳假道西班牙之說，當非事實。德國有假道土耳其的決心，但不見得有假道西班牙的決心。

法國與西班牙，不能答應德軍通過她們的國境，但可答應在摩洛哥與達加給予德國以軍事上的便利，有如在敘利亞與越南之所為，而仍能保持她們的中立地位。就德國來說，目前她亦不能不以此為滿足。

英美同時進窺挪威北部的消息，可能是事實。一個月前，我寫過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央突破與單位作戰」，登在中華日報，指出英美今後將採取多邊作戰，四面起火的戰略，並將進行重建西戰場。現在看來，大致是如此。不過西戰場的重建不會太早，原因在於歐戰局勢一時還沒有發展到使法國放棄中立的地步，德國對法交涉的困難與英美對法交涉的困難是同等的。法國如此，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地位也就不容易確定，所以重建西戰場的條件尚有所待。但近東戰場則不但已經出現，而且在積極展開。大概要等蘇俄境內與近東的戰局僵持到相當時候，在達加與挪威北部英美也站住了腳跟，而美日又都正式參加了戰爭，整個戰局的優劣之勢已有某種顯著的迹象之後，西戰場的重建問題纔能具體化，纔有一個決定。

可是，僅就目前已有的發展來看，人們已經可以知道德國方面英美方面都已改變了戰略。愈到後來，戰爭初期的技術不平衡愈消失，閃電戰愈將讓位給持久戰，而戰爭初期以戰爭決定物資的規律，至此乃為物資決定戰爭。

戰爭與解放

世界大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本來是可以來得及打消的，可是人們不把這問題看作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去處理，而委托資本家當作外交問題與備戰問題去處理，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但歷史是繼承的，不是複演的，第二次大戰是以第一次大戰的終點爲出發點，不是把已經走過的路再走一趟。如此，兩次大戰雖屬於同一性質，而在其發展的程序上則第二次和第一次有顯然的差別。第一次大戰的後果，在第二次大戰將以更嚴重更擴大的程度表現出來。

○第一次大戰削弱了英國，繁榮了美國，第二次大戰則將使英國降爲上次戰後的法國，或更不如，美國的損失將大於她的獲得，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享有上次大戰給予美國的那種幸運。世界的一元霸權經上次大戰而受損傷，第二次大戰則將是世界的一元霸權的毀滅，而不是從英國移到那一國的手上。因爲已往的一元霸權不僅在於英國的支配權威的完整，還在於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的完整，第一次大戰已經指出，在崩壞的場地上不可能有完整的支配威權。第二次大戰則將指出，倘若戰後居然還能有維持世界秩序的中心警察機關，其性質亦必與已往的一元霸權截然不同，而只是如同十九世紀前以期梅特涅的奧國爲中心的神聖同盟。一八四八年曾經是歷史的轉捩點，一百年後的今日，一九四八年，也將是歷史的

另一轉捩點吧。

(二) 第二次大戰較之第一次，在戰爭的機構上是更爲社會化的，或者如流行的術語更爲『全體主義』的，一切都用做戰爭的燃料，使第二次大戰的火燄較之第一次，燃燒得更廣大，更熾烈，也更悠久。戰爭的區域更廣大，時代的抽搐因而成爲更世界規模的，史太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覺可不致再現。戰爭的強度愈熾烈，時代的問題的提出因而成爲更尖銳，更不可假借，攷茨基的第二國際與後來的人民陣線論的錯覺可不致再現。戰爭的時間更悠久，戰爭將更不能依照戰爭者的意志而結束，却是將依照人類的意志而結束。

以戰爭醫治帝國主義的痼疾，人們在第一次大戰時曾經這樣子興奮過，但在第二次大戰，人們却是把戰爭看作帝國主義的痼疾的併發症而忍受着。羅斯福與邱吉爾的聯合宣言至於再三，可是不能像威爾遜總統的演說那樣引起反應。人們的這種冷靜是可驚的，歷史在前進中。

(三) 第一次大戰是在世界工人運動正向上昇之際爆發的，而第二次大戰則爆發於人民陣線斷送了世界工人運動之後，所以直到今天，戰爭尙能安靜進行。但戰爭直接啓發工人運動之由經濟鬥爭走上政治鬥爭，戰爭並且如同作成了普遍的兵役制那樣作成了普遍的工役制，而戰時的嚴密社會機構，又無異替軍事共產主義做了鋪路的工作，這在英美那一邊已經首先漸漸軋出苗頭來了。但仍須承認此次英美較之帝俄要健全得多。美國的戰爭不在本土，因之美國工人運動走到以反對戰爭爲主題尙有一個距離。英國以加緊對殖民地的剝削來緩和對國內工人的剝削，不但使英國工人不致如帝俄工人那樣迅速的與政府對立，而且在若干時期內，英國工人不能就解除對殖民地的錯誤意識，怕失去殖民地不但於英國資本家有損

失，也於英國工人有損失，這種錯誤意識使他們不致如帝俄工人那樣迅速的與戰爭對立。再則，帝俄的農民問題在英美却幾乎可以說是沒有。這裏倘若容許作一假設，則或者可以這樣想像，英國如果革命，將不像俄國一九一八年革命那樣以根本要求停止戰爭為出發，却將如同一八七〇年法國巴黎公社那樣以改變戰爭的性質為出發。當大英帝國瓦解，殖民地解放運動有世界規模的昂揚，而戰爭仍在進行並且威脅及於英本國的生存的時候，這一想像，英國轉入巴黎公社式的鬥爭，以此資格發出和威爾遜總統的宣言有某種類似之點的對全世界的呼籲，而進入新的戰爭，是有可能成為事實的。自然，那時候的情勢運動還要看英國能否擺脫其對美國資本家的依賴。

四、第二次大戰，加拿大・印度・澳洲・南非聯邦・埃及・與南美諸國，工業對農業的比例，重工業對輕工業的比例，都有急劇的改變。這些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現在較之戰前工業生產已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經濟的獨立性的形成，提供了政治獨立的前提。其中最有希望的是印度。印度站在戰爭的邊沿，不像加拿大那樣距離戰爭甚遠，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威因此不可能像她在加拿大的統治權威那樣穩定。同時，印度却又未曾捲入戰爭，而且今後一二年內不至於面對着戰爭，不像伊朗那樣直接處於刺刀的鎮壓之下。再加以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與鬥爭經驗，比較其他殖民地都更豐富。其次是南美諸國，再次是澳洲，民族解放運動將燃燒開來。美國現在彷彿還同情印度，但可以看出她已在準備做英國控制殖民地的支持者。

美國現在已經不能專利用別人去打仗，却是她自己也不能不打成一團了。美國的資本家已在開始苦惱，感到空虛，英國的遺產是黯淡的東西，它只有在歷史上消失，却不能被誰繼承，這使美國的資本家

下意識地感覺魄力不够旺壯，他們從事戰爭，無可奈何的心理多於自信的心理。因之他們在對付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上頭便不能有何種堅決的對策，對印度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美國資本家的這種心理的空隙與疏忽，在今後若干時期內，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毋寧是一種好機緣。但美國的資本家不久將終於明白過來，他們的任務不同於英國之襲取西班牙與尼德蘭的霸權，却是相同於梅特涅的奧國爲神聖同盟而掙扎，那時候，美國在內政上將有一個嚴重的變動到來。研究世界民族運動的發展，不能不把美國的這種動向與前面所說英國可能有的動向，作為重要的因素估計進去。

世界上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現在是被分爲兩邊，但是將在民族運動的發展中打成一片。民族運動並不是資本主義革命專有的部份，二十世紀的民族運動一方面可以說是十八九世紀的民族運動的繼續完成，可是有其不同的附着點。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日

德軍南下與世界戰局

德軍攻佔羅斯托夫後，直趨高加索，於是有人問道：蘇俄將從此崩壞嗎？英美將迫不及待的實現第二戰線嗎？軸心國將作成東西會師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德軍放鬆列寧格勒與莫斯科，甚至可以忍受亞爾干日爾之接濟路線，而集中力量南下，這一事實指

出了德國對俄戰略的改變：由於經驗，知覆滅蘇俄爲不可能，放棄了全面滲透的戰略，而縮小目標，企圖奪取巴庫的煤油做長期戰的本錢。倘能做到這一番，此後對俄戰事就不妨任其膠着，有如日本對重慶之現狀。對於德國發動春季攻勢即已決定的這種戰略上的改變，蘇俄顯然是發覺得太遲。蘇俄所恐懼者，爲亡國，她的機智就爲這種恐懼所蔽。當卡科夫決戰之際，蘇俄還是過於謹慎地不敢調動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防軍。而且對於卡科夫的決戰，蘇俄當時也還不能斷定德國將以此爲北上威脅莫斯科的據點呢，抑爲南下的據點。俄軍於卡科夫決戰之後，不敢移動，就是爲了保全莫斯科第一主義；而德國則於卡科夫決戰之後即活用其軍隊，攻克塞巴斯托波爾港，長驅而入羅斯托夫。蘇俄對塞港沒有派遣大量援軍，羅斯托夫的兵力則更單薄，此種因調動軍隊的滯鈍而失機，可以想像蘇俄之蔽於保全莫斯科第一主義，未能及時斷定德國之放棄北上而集中力量南下的新戰略。有人鑒於羅斯托夫之失守，蘇俄軍力未遭嚴重損傷，以爲這是有計劃的撤退，這是談不到的。

羅斯托夫失守後，德軍的動向終於被蘇俄看出了，於是保衛高加索成爲比保衛莫斯科更重要，莫斯科固然重要，但在今日已非首當其衝，這一形勢明白了之後，於是有一百師的俄軍南下增援。雖然是遲了，然而八十師的援軍仍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力量。卡科夫與塞港之役，雙方兵力的損傷都是很嚴重的，但羅斯托夫的失守，蘇俄兵力的損傷的極微小，這一事實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說，俄國還有可戰之兵。德國在直趨巴庫之前，還須有一決戰，解決史丹林格勒以截斷蘇俄南下援軍。高加索是山地，而且與英國在伊朗與伊拉克經營了兩年的防線相接，這些，都是應當考慮進去的。

英美在叫囂的第二戰線，目前不至於開闢，因爲蘇俄並未瀕於崩壞或屈服，又因爲英美的反攻準備

大概要到明年纔能相當完成。蘇俄尙未至於崩壞，已由德國的戰略的改變可以知道。蘇俄也不至於屈服，因為蘇俄並未遭遇和法國戰敗後同樣的危機，而且比重慶的處境更好。不至於崩壞，就可不至於屈服。史丹林的政權，只有戰下去，倘若停戰就會崩壞，這情形和蔣介石政權却是相同。如此，英美就沒有在準備未完成前冒險開闢第二戰場的必要。

英美將來開闢第二戰場，決不在挪威海面與波羅的海一帶，亦決不在西班牙或法國强行登陸。第二戰場必須與英國在地中海的軍力配合。英國在地中海的軍力是保障世界戰局現狀的最主要陣地，尤其在德軍南下高加索的形勢已明朗化的今日。英國在地中海的優勢倘若不能確保，伊朗·伊拉克·與印度即失却聯絡，絕非遠道好望角所能補償。英國要避免牽動地中海的軍力，她就不能作進襲挪威與波羅的海的打算。就地中海而言，英國的重點現在是在東部，不在西部。法國與西班牙的現狀，是德國在西歐的保障，也是英國在地中海東部的保障。英國決不至於牽動地中海東部的兵力，襲擊法國或西班牙，以自毀其佈置的步驟。英國將來有在土耳其上陸的可能。但在土耳其上陸的意義不是爲了牽制德國的進攻高加索，而是英美對歐洲大陸總反攻的開始。至於牽制德國的進攻高加索，蘇俄自身尙有可戰之軍，英國的援助將只限於伊朗與伊拉克方面與俄軍取得聯絡而已。如此，在英美對歐洲大陸總反攻的準備尙未完成時，至少是在今年年內，尙不至於去觸動土耳其。因爲在此期間，土耳其之爲掩護英國與掩護德國，是同等的。

德國能否佔領高加索，還要打下去看。但德國對巴庫油田志在必得，則無疑義。德國戰時石油消耗年約三千萬噸，其自國之產量，加上羅馬尼亞的合計，年僅一千萬噸左右，而巴庫油田年產即在三千萬

頃左右。只有奪取巴庫油田纔能強化長期戰的基礎。高加索的命運尙須經過大會戰始能決定，這且不說，單說德國倘若佔領了高加索，奪取了巴庫油田，又將如何發展呢？或者是以此爲界而繼續打擊蘇俄，至蘇俄覆滅爲止，或者是以此爲起點而作成軸心國東西會師，現在都還談不到。日本現在正致力於修正南太平洋的守衛線，正致力於充實南太平洋的交通工具，進攻印度洋與波斯灣尙有所待。戰爭是實事求是的，宣傳可以誇大，戰略則避免誇大。

中華民國卅一年八月壹日

文化 的 厄 運

文化已墮落爲二十世紀的神的奴婢，自的科學，藝術，與社會科學都在荒蕪中。

就自然科學而言，它的發展，不但需與產業結合，更需與時代的向上氣象結合。可是，托辣斯所要求的却不是自然科學家，而是技師。他們不但不願意讓自然科學去開拓更廣大的領域，還要把原來已經開拓了的領域收縮，他們對於自然科學已經到達的高度發生不安。他們憎惡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念，因爲它是和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失調的。他們憎惡自然科學創造世界規模的產業技術，因爲它是和市場的壁壘抵觸的。他們要保護唯力論，便得逐愛因斯坦和他的相對論。他們以此種環境去打消自然科學家支援灌溉沙漠與耕種海洋的動機。到處是市場的壁壘的世界是偏狹的。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爲了商品

，便一切窒息於功利主義。自然科學在這局促的世界，在這功利主義的氛圍中，是不可能有創造的喜悅的。

不但在工場中自然科學萎缩而爲只能發明一些另件，即在軍火製造方面也同樣的無生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武器可驚的，但以之與第一次大戰對照，却不過在量上加大加多而已。倘再以之與拿破崙戰爭的武器比較，則在進步的程度上更見得相對的遜色。死光死聲之所以至今沒有出現，便是因爲戰爭不能要求光學與聲學有此飛躍的發展，此種飛躍的發展，却是有待於時代的向上氣象給予自然科學以無拘束的創造力。戰爭並不能推進自然科學，它只是把自然科學的遺產浪費。戰爭者不能瞭解自然科學的進步是綜合的，它在一般工場中的桎梏着，則在武器製造方面雖然以獎勵來刺激，還是不能產生奇蹟的。

於此有一問題：何以在封建社會沒落之際自然科學有劃時代的進步，而在資本社會沒落之際，自然科學却只有萎縮？答案是，資本主義革命的物質世界的基地，和封建社會的是截然不同的，而二十世紀的革命的物質世界的基本則是繼承資本主義的遺產，所以二十世紀的革命沒有它的瓦特。

藝術的遭遇比自然科學更壞，因爲藝術較之自然科學更成爲不需要的，而資本主義末期的功利主義對於自然科學還能寬恕一部份，對於藝術却是絕不寬恕。這一時代的人，在生活上之於藝術，比較在工場中之於自然科學，是更爲失調的。在奢侈與窮苦的兩極端，生活與藝術絕了緣。

自然科學現在是被肢解着，拆散它的體系，剝奪它的創造力，而只剩下了技師的智識，但智識仍然是自然科學的。藝術可是不然，它的體系一被拆散，創造力一被剝奪，剩下的只是廣告匠技巧，藝術便全部被毀滅了。

也因為這個緣故，商品在其製造上所表現的自然科學，較之在其裝璜上所表現的藝術，還是比較的成功。而自然科學之被利用於戰爭的武器，較之藝術之被利用於戰爭的宣傳，後者的效能簡直是等於零。藝術的自我完整性是更難以削足適履的，而藝術之不能揮之使去，喚之使來，也比自然科學還更堅強。

於此，發生了與自然科學同樣的問題，何以在封建社會末期藝術有劃時代的飛揚，而在資本主義末期藝術却只有枯絕？這較之解答自然科學的問題需要更複雜的解釋。藝術較之自然科學被監視得更嚴，是一個可注意的事實，但光是監視是不能毀滅創造力的。還是因為二十世紀的革命前夕根本不可能有新興藝術的緣故。藝術的發展，不但取決於時代的向上氣象，同時取決於時代的文化水準。封建社會文化水準的終點，到資本主義時代文化水準的起點，是經過一個飛躍的，但未來的新時代的文化水準的起點却是以資本主義文化水準的終點為出發。所以資本主義革命有交響曲出現，而未來的新時代則不能有同樣偉大的發明與創造，却是只有重拾交響曲之際緒，接收為末期資本主義所不能保有的文化，而以之為繼續發展的起點。藝術的這一前途，和自然科學的有其共通點。

人們往往有一種錯覺，以為接收前一代的藝術遺產，較之接收前一代的自然科學遺產有更多的問題，因為藝術較之自然科學是更為階級性的。這種錯覺，是由於對文學的誤解而來。倘若拿音樂與建築來說明，就可以簡單些。音樂與建築都是不著言語的，形式的旋律就是一切。藝術通過階級而表達人類的自由與熱情，階級是可以被歷史否定的，但人類的自由與熱情則只能被繼承而發展。不但悲多汶的交響曲與凱旋門的建築不能被資產階級專利，就是更古的金字塔與峨特式的建築，在其表達人類的虔誠與崇

高的意味上，表現人類的創造的喜悅上，也將以新的藝術形式在歷史上再現的。未來的新時代，將如文藝復興時代之從敗子的手上追究到極盛時代的遺產，從接收工作做起。

但在新時代的負荷者還沒有取得接收遺產的身份的今日，藝術自然科學同樣只能眼看其衰退，要想越俎代庖去推動它，簡直是沒有辦法的。以上的說明同時也解答了何以資本主義革命當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而現在則文化運動有待於政治運動來推進。

社會科學的命運是和自然科學同樣的被肢解着。資本家現在已成爲猶太人，他們要的是商業簿記，不是經濟學，要的是行政技術，不是政治學，要的是檔案，不是歷史學，要的是外交情報，不是國際問題的研究。他們只願意處理處理日常事務，而避免檢閱時代的輪軸。他們深惡所謂「預測」，生怕預測會預測出不祥之兆來。舉實例來說，一批所謂國際問題專家對於國際事件的發展，總是不能判斷，也不敢判斷並且嘲笑判斷的。他們說：國際事件的發展是和打牌一樣，偶然的成份太多了，你又怎能判斷？或者這樣說：要判斷國際事件的發展，除非能够收集到一切有關的資料與祕密文件，這需要專門爲此而設的大圖書館，和一大批各式各樣的專家，再加上與國際間諜網的聯絡，否則，你又怎能判斷？還有一種說法是：在英國決定參戰之前的一點鐘，連張伯倫本人都不知道究竟會不會打起來的，你又怎能判斷！

其實，歷史事件的發展是決不可以和賭博相提並論的，要判斷它的方向與時機，雖然沒有看到祕密文件也可以做到，（祕密文件的價值事實上不能看得過高，有許多祕密的決心與協定並沒有發現，）而且這種判斷也無須徵求當事人的同意，有如天文學家對於行星的軌道可以比行星自己知道得更清楚。

自然科學・藝術・與社會科學是如此的在一齊衰退中，因為它們被桎梏着。但今日文化之被桎梏，在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它曾經戰勝桎梏，今後它仍將是戰勝者。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壽顏文樸先生

從朋友處知道，七月二十日是顏文樸先生的五十壽辰，我以這篇文章對顏先生致敬！

前些時在蘇州，遊滄浪亭，眺見近傍一座白石柱廊建築，有一種希臘風的附明快，當時我很驚奇，只聽說裏邊近來被一個什麼團體住着，也就沒有再問。後來和朋友談起，纔知道原來是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的校舍，戰時學校搬到上海，校舍便流落在那裏，剩有斜陽流水話當年了。

這所學校便是顏先生創辦的。據朋友告訴我，校舍的設計建築，連一幅壁面，一枚釘子，都經過顏先生的細心安排。那裏邊陳列的石膏像，收集之廣，在中國為第一。有些壁畫是特地從羅馬與巴黎臨摹來的。這些，都是顏先生以蜜蜂那樣的勤勞與虔誠，積數十年的心血的結晶。

向來我對於繪畫家少接觸，但劉海粟徐悲鴻這一流人的名字却到處可以看見，聽到。也有時看看他們的畫。我覺得繪畫界之有劉海粟徐悲鴻，猶之乎戲劇界之有梅蘭芳，學術界之有胡秋原，葉青，文化界之有七君子，似乎終不是這麼一回事。魯迅的譏笑，人們是認為刻薄的，但我愛他的嚴肅。中國繪畫

界的出息，決不出於沿門畫馬的京派或中西畫拼湊成洋涇浜的海派。中國却是需要着好好的介紹西方的藝術作品，並且刻苦學習。補方的現代藝術，導源於文藝復興期希臘藝術的再生與繼續成長，以中國人的現代生活意識的落後，對於距離，角度，光線，與色彩的感覺與觀念的不準確，要學習西方藝術，當然不比走江湖容易，於是許多人逃走了，畫畫中國山水，加上西洋顏料，用水門汀建造宮殿式的房子，與科學靈乩一樣，成了流行的風尚。這是我何以看了蘇州美專的希臘風的校舍建築，所以特別珍惜，特別感動的緣故。

此後我有機會便看看顏先生的畫，驚嘆於他的歐遊小品（共三十幅）的寫實工力，與其情調的明快，引起我眺望蘇州專校舍時的同樣感動。我不信沒有寫實工力的作品會有什麼靈感，我看過一般蔑視寫實工力的天才們所表現的靈感，其實是淺薄的說理與玩弄新奇，這不能是藝術。這些人在顏先生之前不過是浮沫而已。顏先生所表現的明快的情調，在我是看作這時代最可寶貴的東西。只有摯愛人生，感覺人生的充實者，纔能有此明快的情調。明快，是人生向上情緒的基調。能够明快，則沉鬱而不至於滯悶，悲壯而不至於慘澹；平靜而不至於死寂，閒逸而不至於無聊，浪漫而不至於玩世不恭。

和顏先生，我曾相見過二次。二次都沒談及政治，也沒有談及藝術或繪畫，而只是談些瑣事。他喜歡搜集各種舊時式樣的鐘錶，喜歡坐茶樓，有一時期也常常到跳舞廳去，喜歡旅行。他是人間味的，他摯愛人生的一切，而以極素樸極平凡的言語談到舊時式樣的鐘錶的可愛之處，我不禁感覺到年來我對於世俗的厭倦，我的生命力的漸就枯萎，在顏先生的面前暗自慚愧起來。和顏先生相對，你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英雄，一個超人，或者有古怪脾氣的長髮藝術家，你沒有

感覺一點不安，一點威脅，他只是一個普通的人，一個爲你所能瞭解的可以親近的人。但這正是顏先生的偉大。（註：記得當時我會問他何以喜歡收集舊鐘錶，他說只是因爲舊鐘錶的式樣多，並無古董癖在內。）

一個學術家比一打變馬戲的人更可貴，也比一打政客更可貴，中國現在文化遭了劫運，留有一枝勁草尚且是值得珍惜的，何況一枝大樹！敬祝顏先生健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